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年 第1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3 齐卫平 / 《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认知的建构
- 21 崔雯怡，童珊 / 胸怀天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冷战与苏联解体

- 37 胡德坤，徐广森 / 超越旧金山体制，搁置领土争端，走向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胡德坤教授访谈
- 65 余伟民 / 制度与人：苏联解体过程的演进逻辑

国别与区域研究

- 84 冯绍雷 / 欧洲对抗与亚洲突围——全球转型中的欧亚新博弈
- 92 曾向红，尉锦菠 / 中断还是反复——“颜色革命”中的路径依赖
- 124 沈 陈 / 对冲策略抑或功能合作？——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的议程论析

2021年俄罗斯经济与外交述评

- 143 曲文轶 / 经济增长恢复、刺激模式退出、气候行动开启——2021 俄罗斯经济述评
- 164 万青松 / 2021 年的俄罗斯外交：再平衡中的新调适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 年 2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 年第 1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Ци Вэйп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золюции»: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столетней борьбы КПК..... (3)

Цуй Вэньи, Тун Шань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мир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ути участия Кита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в духе шест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К 19-го созыва (21)

Ху Дэкунь, Сюй Гуанмяо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системы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отложив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споры, на пути к сообществу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Ху Дэкунем (37)

Юй Вэйминь

Институты и люди: эволюционная логика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65)

Фэн Шаолэй

Европейск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и азиатский прорыв: Новая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гра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84)

Цзэн Сянхун, Вэй Цзиньбо

Прерывание или повторение –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пути в «цвет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92)

Шэнь Чэнь

Стратегия хеджирования ил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Анализ повестки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и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124)

Цюй Вэньи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ыход из режима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начало действий по борьбе с изменением климата: Обз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за 2021 год (143)

Вань Цинсу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2021 году: новые адаптац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ребалансировки..... (164)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2 年第 1 期 (双月刊)

Contents

Qi Weiping

The Resol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Struggle over the Past Century..... (3)

Cui Wenyi, Tong Shan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on the Path of China's Engage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 –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1)

Hu Dekun, Xu Guangmiao

Surpassing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Setting aside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Moving towards the Northeast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Dialogue with Prof. Hu Dekun..... (37)

Yu Weimin

The System and the Man: the Logic of the Soviet Disintegration (65)

Feng Shaolei

Confrontation in Europe and Breakthrough in Asia: The New Eurasian Game during Global Transformation (84)

Zeng Xianghong, Wei Jinbo

Disruption or Repetition: Path Dependence during “Color Revolutions”.....(92)

Shen Chen

Hedging Strategy or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nalysis on the Agenda of Russia's Participation in BRICS (124)

Qu Wenyi

Resuming Economic Growth, Exiting from Stimulus Mode and Taking Climate Action: Review of Russian Economy in 2021 (143)

Wan Qingsong

Russian Diplomacy in 2021: New Adaptation for Rebalance..... (164)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认知的建构*

齐卫平**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为正确建构历史认知提供了权威性文献。一部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为我们正确构建历史认知奠定了基础，为全社会形成历史认知的共识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了什么样的大事，中国为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是正确建构历史认知的重要内容，形成了认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知识体系。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历史认知构成历史的集体记忆，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必须百倍珍惜和加强维护。历史认知的建构意义在于筑牢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价值在于为现实的奋斗提供历史解释。历史自信的增强依赖历史认知的正确建构，历史认知的基础越牢固，历史自信的程度就越加深。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以建构正确历史认知为基础，坚定历史自信。

【关键词】历史决议 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 历史认知 历史自信

【中图分类号】D26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003(18)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014）的成果。

**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以丰富的思想含量、知识含量体现了重大的政治性、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价值。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对自身奋斗实践进行全面检视和科学总结，聚焦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呈现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中华民族发展史最恢宏史诗的历史风采，具有建构正确历史认知的重要意义。形成什么样的历史认知以及建构正确的历史认知，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需要深入学习和深刻领会。本文拟从《历史决议》与历史认知建构的关系进行思考和阐述，以期对更好地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所裨益。

一、建构近现代中国历史认知的权威文献

从2020年下半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多个场合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及我们将迎来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这是全党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202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成立文件起草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多次对《历史决议》草案文本进行研究讨论和做出重要指示。7月1日，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做出简练而精辟的概述，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为全面总结历史作了准备。在此基础上，11月8-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历史决议》，这个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正确建构历史认知的权威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

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①这段重要论述，是建构正确历史认知的思想指南。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留存在人们记忆之中而永不磨灭。“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②但是，历史作为凝固的史实又不可能原版复制成为人们的标准认知。历史是过往的记录，是社会记忆的存储。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也形成相应的历史情结。所谓历史认知，就是客观的历史形成人们认识过往的知识构成。因为认识的主观性与历史的客观性存在矛盾，历史认知会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正确建构历史认知以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为前提，凡是错误的历史认知都表现为以主观论断否定和扭曲历史的客观性。正确认知历史给人们以积极进取的奋斗能量，错误认知历史给人们带来瓦解意志的消极后果。

历史认知不能自然建构起来，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历史的困难性。如何认知历史虽然是人为主体的行为，但受很多外在因素的干扰。首先，历史认知建构的决定性因素是认知主体的立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事实描述、价值判断、结论评价出现差异、争议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归根到底是立场不同造成的。第二，思维方法对建构历史认知有重要影响，片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方法建构历史认知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第三，历史认知的建构能力受知识基础的制约，丰富的知识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历史。第四，社会阅历深浅也会影响历史认知的建构，涉世不深的青年尤其容易受错误历史观影响而妨碍正确历史认知的建构。这些干扰因素的存在，凸显出正确建构历史认知的重要性，必须加以严肃对待。

习近平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③中国共产党奋斗百年的时间沉淀，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清楚我们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④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9-80页。

② 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第2版。

③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9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

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比，《历史决议》的特点，是历史延伸的时间维度更长，历史实践的空间维度更宽。一部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为我们正确构建历史认知奠定了基础，为全社会形成历史认知的共识指明了方向。历史认知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历史决议》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发展时期为历史线索，对党的百年奋斗实践做出全景式的历史叙事，揭示出党团结带领人民艰辛探索、付出心血、苦难辉煌、勇毅前行的心路历程。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为正确建构历史认知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作为党中央郑重、全面、权威的科学总结，《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形成全社会历史认知的建构共识。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历史认知建构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华儿女置身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之中，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中华民族的盛衰强弱紧密相关。民族认知在历史认知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建构正确的民族认知是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大民族。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首先就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说起，他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①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623页。

拔的斗争。”^①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②中华民族在世界古代历史上领先发展的水平得到公认，中华文明受到普遍赞誉。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③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民族一下子跌进黑暗深渊，落后挨打的遭遇让中国人民品尝到了耻辱的苦涩。在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年代，中华民族被羞辱为“东亚病夫”，先后有英、法、德、俄、日、葡萄牙、美等十几个国家踏入中国国门，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国家主权丧失，社会凋敝凄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经历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不幸的遭遇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面对苦难，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④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各种反抗侵略的斗争，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各种政治力量试图通过改良和革命的道路改变民族受欺遭难的命运，在蹒跚而行中期盼着光明。虽然这些抗争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则彪炳史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紧紧依靠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伟大成就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以

① 《邓小平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②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1页。

顽强意志和卓越奋斗证明了自己强大的能力，以铸就辉煌和创造奇迹彰显了自己非凡的成就。

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的福祸吉凶在绵延不绝的历史发展中同感受、共担当，齐心协力克时艰，患难与共战风险。国家灾难会降临到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头上，民族兴盛造福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①正确认识自己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是每个中国人筑牢安身立命基础必须具有的历史认知。从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从 180 多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史，从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从 70 多年来的新中国建设史，从 40 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史，从 10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造史，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历史品性，是正确建构历史认知的基础。《历史决议》通过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提供了历史样本。

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的历史认知建构

近代中国社会嬗变的历史逻辑表明，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必须有先进政党强有力的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政党选择史，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各式各样的政党正是在历史检验中接受人民的选择。哪个政党顺应世界大势、体现历史意志、满足人民期待，才具有引领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领导资格。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在它诞生前中国已经产生了 300 多个具有政党性质的团体组织，人民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我们党刚刚诞生时，可能很少有人预想到能够成就今天这样的历史伟业。”^②这种“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现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绝非偶然，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主心骨，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57 页。

②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 年第 1 期，第 8 页。

体现了历史的意志，是时代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给中国人民带来光明的前景。“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这个主题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历史托付。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的历史实践中，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前进步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扭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崇高理想信念，用科学理论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在正确道路上勇往直前。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一次次飞跃。确立毛泽东思想，确立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科学发展观，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国共产党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第一次在历史上创造了政党与人民相结合的实践场景。中国是个大国，人多的数量优势只有在高度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强大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四分五裂的国情，争权夺利的纷争，军阀混战的乱象，使中国长时期处于人心涣散之中。即使一些进步力量的抗争也没有把人民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紧紧依靠人民，以强大的组织力、号召力、领导力，把几亿、十多亿人民凝聚成为一股绳，伟大政党和伟大人民相结合迸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努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诠释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思想精髓，也是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回答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坚守。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①“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逻辑和胜利密码。”^②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正是因为始终贯彻执行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至上，心里有人民，眼中有群众。

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革命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③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伟大建党精神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操、崇高的追求、顽强的意志、坚韧的品质、非凡的毅力、赤诚的衷心、无私的胸怀，聚集着巨大精神能量。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形成，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全部实践过程中，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形象。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弘扬传统，赓续血脉，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以红色基因打造先进政党，注重革命性淬炼，坚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加强管党治党，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实践特征。“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政、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④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②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④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1月19日，第1版。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中国人民对党的拥护，是经过反复比较，经过无数事实和考验形成的。中国人民一旦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曾改变过。”^①怎样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认知正确建构的重要内容。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关键要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历史认知上达成共识。

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了什么样的大事的历史认知建构

人民创造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和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干成了许多被认为不可能办成的大事，创造了令各国惊叹和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实践创造出无比辉煌的成就，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人民见证了100年里中国社会惊天动地的巨变，感受到中华民族蒸蒸日上的腾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②这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大事的总体面相，纵观世界，像中国人民这样从强盛到衰落再重新崛起的事例是独一无二的，像中华民族这样从落后世界到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崛起是举世罕见的。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了很多很多的事，党的历史文献和党中央领导人曾从各个方面做出过全面概括，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概括，就是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这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前党中央对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伟大成就的标识性概括。

^①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22页。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①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围绕三件大事论述“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历史贡献”，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③

《历史决议》以党的百年奋斗全景式检视，对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的大事做出新的概括。第一，以“四个伟大成就”的概括，对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的大事做出叙事，即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1页。

②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3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3页。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第二，以“四个伟大飞跃”的概括，对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的大事做出提炼，即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第三，以“两大奇迹”的概括，对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的大事做出揭示，即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第四，用“两个创造”的概括，对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的大事做出评价，即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新概括体现了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实践形成的新认识，为全面认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了什么样的大事提供了更加宽阔、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历史视角。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干成了什么样的大事的新叙事，传递出非常丰富的内容，从中可以获取许多重要信息。其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干成的大事是紧紧依靠人民而取得的成就，表明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人民立场。其二，中国共产党干成的大事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人民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以及中国的形象和地位因为这些大事的成功干成而发生了根本改变。其三，中国共产党干成的大事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的大事谱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上的恢宏史诗。深刻认识党团结带领人民干成的大事，对于历史认知的正确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五、中国为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的历史认知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①世界是一个整体，各国发展都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4-525页。

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①中国始终秉持大国的世界担当，努力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落后世界到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的世界形象、地位和角色在党团结带领人民百年奋斗实践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遭受外国欺凌的岁月里，中国被阻隔在世界先进潮流之外，帝国主义掠夺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处境使中国被外国瞧不起。尽管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努力追赶世界，力争使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直被外国踩在脚下，衰败凋敝的现实使中国根本不具有为世界做贡献的能力和条件。对于曾经为世界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历史造成的遗憾。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大势而诞生，它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国革命与世界潮流相联系，对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和趋势产生深刻影响。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中国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国家财力物力状况造成能力上的限制，但党中央领导人始终坚持胸怀天下，表达为世界做贡献的愿望。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赶上世界上发达国家，“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②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124、156-157页。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上逐步实现富裕的道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做贡献的世界担当意识日益增强。邓小平指出：“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①1985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成员时说，“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八十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那时“中国就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多一点贡献。如果再花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情。”^②他在会见外宾时反复指出：“我们不仅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把自己的发展看作是对人类贡献的问题，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问题。我们要为人类做贡献要靠自己努力。”^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家和世界、着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当起时代使命”，抱着“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愿望。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做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做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做贡献。^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战略谋划，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在气候变化、减贫、反恐、网络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在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发起全球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② 《邓小平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32-333页。

③ 《邓小平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37、538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5-437页。

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向众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医疗支持、疫苗援助与合作上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经过持续努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①

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是《历史决议》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实践揭示的五个方面历史意义之一。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贡献，使我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是世界的一分子，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在场，中国的发展处于世界场域。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发挥出的积极作用，成为人们历史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正确建构历史认知必须深刻认识中国为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六、以正确的历史认知为基础坚定历史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②这个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历史认知建构的极端重要性。怎样正确建构历史认知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党中央要求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首先要以正确的历史认知为基础，坚定历史自信，从而让历史照亮未来，用历史提振自信。

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全会《决议》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向党内外、国内外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自觉。”^③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1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9日，第1版。

③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第8页。

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又强调：“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①研读和领会《历史决议》，要以正确建构历史认知为基础，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历史认知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要从全面建构上下功夫。《历史决议》从党的百年奋斗实践循序渐进的四个发展时期做出历史叙事，构成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辛探索、付出心血、苦难辉煌、勇毅前行的心路历程。《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突出新时代党中央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展现中国人民创造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非凡奇迹的历史风采。《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成功、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密钥，演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思想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五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彰显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实践的总体价值。这些丰富内容构成了历史认知正确建构的整体架构。

历史认知的建构意义在于筑牢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价值在于为现实的奋斗提供历史解释。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今天是昨天的继续，人们可以从过往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很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②历史认知构成历史的集体记忆，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必须百倍珍惜和加强集体维护。《历史决议》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1月12日，第1版。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1页。

存储了许多重要的记忆信息，存储着党的百年奋斗创造非凡奇迹的信息，存储着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获得成功的信息，存储着中国人民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恢宏史诗、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壮美画卷的信息。这些记忆信息是构成历史认知的单元，为坚定历史自信提供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受各种因素的干扰，正确建构历史认知面临着冲击性的破坏危险。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泛起严重挑战正确历史认知的建构。以肢解式、碎片化、孤立性、夸张法的解读方式，扭曲、否定、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混淆视听，误导人们的历史认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保持着高度警觉，要求全党全社会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进行坚决抵制、批判和斗争。以正确的历史认知为基础坚定历史自信，“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①使历史认知建构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

历史认知之所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因为认识历史构成的知识是人们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历史可以告诉人们自己民族的古往今来，告诉人们在奋斗中遭遇了什么以及是怎样走过来的，告诉人们应如何去规避风险和赢得胜利。怎样对待历史和认知历史，是一个民族理性思维的衡量尺度，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程度的检验标尺。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认知不能为人民提供坚定历史自信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凝聚人心的力量，这个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就失去了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因此，历史自信的增强依赖历史认知的正确建构，历史认知的基础越牢固，历史自信的程度就越加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②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承前启后的传棒接力跑，历史在交接中发展，对历史的自信决定着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信。历史自信是对百年奋斗走过的路充满底气，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第16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9日，第1版。

表现继往开来的志气，彰显勇往直前的勇气。新的赶考之路充满荆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使命艰巨，任重道远。坚定历史自信事关能不能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磅礴力量。14 亿多中国人民形成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奋斗局面，需要以共同的历史认知为思想基础，以正确的历史认知坚定历史自信，巩固和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

【Abstract】 *The Resolution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considered and adopt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CPC) provides authoritative documents for the correct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century struggle of the CPC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us to correctly construct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whole society to form a consensus on historical cognition. What kind of nation is the Chinese nation, what kind of political party is the CPC, what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the CPC united and led the people to accomplish, and what kind of contribution has China made to the world? All of these have constituted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our historical cognition. It is a knowledge system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ty and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 century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people. Historical cogni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historical confidence. Historical cognition constitut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history and is the common wealth of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must be cherished and strengthen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is to consolidate historical memory, the value of which is to provid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struggle in reality. The enhancement of historical confidence depends on the correct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The stronger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the greater the historical confidence will be. Stepping into a new journey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a new era, we must strengthen historical confidence based on correct historical cogni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Res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Century of Struggle, Historical Cognition,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золюции, рассмотренные и принятые шестым пленумом ЦК КПК 19-го созыва, являются авторитетными документами для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Полная история 100-летней борьб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заложила основу для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и указала обществу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консенсуса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познанию. Какой нацией является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ция, ка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ей являетс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к свершению каких великих дел сподвигл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и какой вклад внёс Китай в мир, всё эт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 систему знаний, позволяющую понять единство и лидерств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многовеков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основ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составляет коллектив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амять и является общим достоянием общества, которо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беречь и укреплять. Значение постро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состоит в закреплен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а цен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бъяснении борьб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выш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зависит от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чем прочнее фундамен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тем выше степень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Вступая на новый путь и внося вклад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мы должны опираться на правильн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и укрепля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золю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100-летние борьб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уверенности

(责任编辑 苟利武)

胸怀天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研究 ——基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崔雯怡 童珊**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路径，可以归纳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制度基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入地发展，引领全球热点问题与公共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及扩大全球人道主义行动中的中国参与。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坚持拥护联合国的权威与核心地位，坚持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防止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伪多边主义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中国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引领全球和地区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及扩大在全球人道主义行动中的参与，分别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实现了全球责任担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进一步统筹中国-全球层面的安全和发展关系，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助于破解全球治理的困境，是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 十九届六中全会 历史决议 全球治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60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021(16)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主要成就与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其中，在外交工作中，重点强调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 崔雯怡，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童珊，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实践经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体现。正确理解全会所阐释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路径、行动与意义，不仅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对全球治理做出的贡献，而且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中國方案的实际表达。

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制度基础

冷战后，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频频挑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相关国际法、国际规则。美国主要是以它们与自身利益的契合度为标准，以判断其是否值得遵守。当它们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倾向选择绕开甚至违背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例如美国长期无视《联合国宪章》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准则，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甚至悍然对他国使用武力，损害他国主权安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2003 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

与美国公然蔑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相反，中国一贯倡导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制度基础。联合国一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展开了不懈努力。尽管受到美国重重阻挠，但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终于获得了成功，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自此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为全球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致力于通过联合国的平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發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开始积极支持联合国的改革，主张加强联合国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等，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捍卫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中国自 1988 年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至今，已向近 30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

和人员 5 万余人次。中国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重要出兵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兵最多的国家。^①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资金有限、维和人员数量不足、授权不清晰、救灾防灾物资不足等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不改初心，积极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始终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②，并不触动原有体系和秩序的“内核”。中国始终认为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急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呼吁“应该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对联合国，世界各国都应该秉持尊重的态度，爱护好、守护好这个大家庭，决不能合则利用、不合则弃之，让联合国在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③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中国会继续拥护联合国作为维护当今世界和平、地区安全和全球发展的核心地位，并将始终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动依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等多重挑战，中国也将继续呼吁各国在联合国平台上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把以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制度基础作为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的首要原则。

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多边主义已然成为促进世界发展的主旋律。从普遍意义上看，多边主义为两个以上的国家提供了就某一议题共同交换意见、并以民主的形式找到解决方案的平台，这一原则在国际舞

①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 年 10 月 22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2/content_5644384.htm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0 页。

③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8 页。

台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但是，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世纪疫情叠加的背景下，多边主义面临着各种挑战。

一是多边主义受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挑战，导致多边主义进程受阻，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美国不断阻挠世贸组织功能的履行、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等行为都对多边主义产生严重威胁。二是多边主义的诸多实践往往鱼龙混杂，存在不少伪多边主义和形式多边主义，一些国家常常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实现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目的。一些国家构建的多边主义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还有一些国家并没有真正践行多边主义的理念。这些形形色色的“多边主义”实践阻碍了真正多边主义原则的实施，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隐患。因此，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以及伪多边主义，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中国积极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其与伪多边主义理念有着本质不同。首先，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平等的多边主义。中国坚持的多边主义是多极世界的多边主义，追求不同国家间国际地位的平等。它需要尊重每一个成员的主体地位，其设置的规则应该是公平正义的，不对国家进行等级的区别和划分，不为某些国家的具体利益服务，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内涵。

其次，真正的多边主义应该是和平的多边主义。实施多边主义旨在为世界上的不同国家提供一个化解纠纷、弥合分歧、管控冲突的平台，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而不是将多边主义作为敌视、对抗甚至分裂他国的工具，从而加剧地缘政治冲突，破坏全球社会稳定。

再次，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不会以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作为划分标准，不会一味地拉帮结派、搞小院高墙、平行体系，不会封闭排他、故步自封，而是能够依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和发展，以应对全球社会日益复杂的挑战。

最后，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①只有

^①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页。

共同协商，共同探讨，才可能反映不同成员的利益诉求，寻找出不同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也只有这样，多边主义才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遵守，多边主义的有效性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成果才能为各成员所分享。

中国在全球舞台不断阐释和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国际场合，如第 76 届联大、G20 第 16 次峰会、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等，均反复强调真正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有利于提振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同时，中国敦促和支持国际组织如 G20、欧盟等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言行一致，充分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中国认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必须要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遵守现有国际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因此中国将上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制度基础作为重中之重。除此之外，中国还发起创立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阿合作论坛、金砖国家组织、中拉论坛等多边主义平台，与相关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的问题上共同发声，合作共助。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威胁，中国利用各种多边平台，助力全球抗疫。中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全球抗疫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其发起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成立应急基金，为成员提供紧急融资进行国内抗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中国，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①。

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强调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致力于“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②。中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谋求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会员国，不断加大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以及同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严格遵守世贸规则，

^① “中国堪称‘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 年 7 月 8 日，第 11 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1 页。

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中国也接受许多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享受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有益成果。

虽然经济全球化旨在通过在国际层面降低开展业务的成本，实现各国商品、劳动和资本的国际化，以期使各国资源得到更好流动与有效利用，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的优势，在产业分工中垄断了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在全球体系中收割发展中国家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同时，发展中国家优质的人力资源不断流入发达国家，进一步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世界经济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剧。许多国家的外向型经济也非常脆弱，无法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原有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排他分化的，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惠、平衡和共赢。这些都证明西方国家推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弊端，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颇为讽刺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红利不断下降，美国越来越频繁地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甚至公开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重重设卡。然而，在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困境之时，中国勇于担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中国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导向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一带一路”自建设之初，便充分贯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截至2022年1月，中国已与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许多国家也开始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第三方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还与一些国家签署了经济合作文件，助力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设立“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基金，这些行动均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硬件环境，使得世界各国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自由贸易受阻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停下自

^① “我国已与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年1月19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9/content_5669215.htm

贸区建设的脚步，已经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 个自贸协定。^①中国一直致力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为推动 RCEP 的最终签署贡献力量，并筹划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国对自由贸易的积极参与，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中国同时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当世贸组织面临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使其争端解决功能陷于停滞、个别成员滥用世贸规则中的安全例外条款等困境时，中国坚定支持世贸组织，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希望能够通过改革使世贸组织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还发起一系列金融治理与改革的倡议和实践。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金融治理规则进行创新，更加能够反映全体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全球金融治理与改革提供了新的样本。中国还借助 G20 和金砖机制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②2016 年，G20 杭州峰会开创性地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以及《2016 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等文件，“为充分挖掘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做出了重要贡献”^③。

在国内层面，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创新性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积极引导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协同，加强促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力减少发展鸿沟，推动实现所有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治理行动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心，倡导各国和国际经济金融机构齐心协力，共同抵御全球疫情危机的惊涛骇浪，防范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① “我国已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19 个自贸协定”，2020 年 12 月 31 日，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fgd/202012/44121_1.html

② 李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逻辑”，《当代世界》，2018 年第 6 期，第 25 页。

③ 王毅：“为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20 日，第 7 版。

四、致力于全球和地区公共问题的政治解决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悬而未决的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更加凸显，由此引发的安全问题愈发威胁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全球社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安全问题的外溢性、相互依赖性和复杂性不断加强。因而，更加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①。

中华民族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悠久传统，“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大宝贵历史经验。《决议》指出：“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②这就在理念层面上为全球公共安全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中国历来倡导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对热点问题协调斡旋，以避免热点问题的恶性升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包括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共同体意识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在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非传统安全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实践层面，中国积极推动全球与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国专门派出一批特使、代表，直接参与热点问题的协调和斡旋。进入 21 世纪以来，已经先后派出中东问题特使、非洲事务特别代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亚洲事务特使、阿富汗问题特使、叙利亚问题特使等，在推动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也门危机、利比亚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南北苏丹冲突、南苏丹冲突、朝鲜半岛核问题、缅甸北部问题、罗兴亚人难民问题、阿富汗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的政治解决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③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设立的外交斡旋机制，并努力构建多边对话机制，为各方协调热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541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68 页。

③ 崔小涛：“论中国热点外交的新发展”，《学术探索》，2020 年第 9 期，第 23 页。

点问题提供平台。例如中国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框架下的解决机制为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建言献策。在朝核问题紧张的局面下，中国还创造性地促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一度缓解了朝核问题的恶化。

在维护非传统安全和地区安全方面，中国既是参与者，又是引领者。中国努力落实《巴黎协定》关于碳排放的中国目标，推动绿色丝绸之路的建设，通过精准扶贫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长期致力于参加国际反恐合作和关于地区安全的多边对话机制，为维护全球综合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中国通过创设新的机制与规则，促使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得到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解决，如发起建立了“基础四国”部长级会议、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等多边磋商机制，协调各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出“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提交至联合国，为建立各国在全球信息空间的行为准则提供参考，以期促进各国共同应对信息空间的挑战与威胁；启动澜湄合作进程，推动澜湄合作机制的建设，促进澜湄地区的政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堪称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典范。

五、扩大参与全球人道主义行动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不断扩大参与全球人道主义行动。人道主义的本质是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权利。^①人道主义行动的主要对象是受到伤害威胁的弱势群体，这类弱势群体分布在全球各地特别是不发达地区。近年来，随着全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如极端天气频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新冠疫情暴发等，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最为强烈。根据联合国《2022 年全球人道主义概览》预测，2022 年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的人数高达 2.74 亿，比 2019 年人道主义报告预计的人数翻了一番多。^②人道主义灾难成为威胁全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

① 张贵洪、余姣：“新冠肺炎疫情、人道主义与全球卫生治理”，《理论月刊》，2020 年第 12 期，第 34 页。

② “Global Humanitarian Overview (introduction) 2022”，<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

中国历来就有人道主义援助传统，且不断推进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从2000年起，在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国家中，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规模一直处于前五位。^①2001年以来，中国逐渐加大了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体系的参与度，积极参与联合国机构主导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援助规模逐年扩大。2004年以来，累计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300余次，年均增长率为29.4%。^②2010-2012年间，相继向30多个国家提供了价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援助。^③2018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旨在协调对外援助，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进行对外人道主义援助。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源于西方。然而，冷战后西方国家在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时，却经常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将其当作维护大国“霸权主义”的政治工具。这成了许多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导火索，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动荡。中国以政府为主体对全球人道主义行动的参与，则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参与全球人道主义行动时，中国秉持传统的“仁爱思想”和“贵生（重生）”理念，爱天下人，努力保护和爱惜世人的生命，并始终坚持“中国之义”，“绝不在朋友落难时袖手旁观，绝不在伸出援手时夹杂私利”^④。这种施以援手而不干扰他国的做法，是对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真正践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会屡屡出现互相扯皮、分而治之等现象，严重危害全球抗疫努力，威胁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建议，各国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科学施策、同舟共济、公平合理、标本兼治”等原则。^⑤中国的方案是以人道主义作为抗疫之“心”，以科学合

① “Issue Brief: China’s Humanitarian Aid”, June 30, 2015, https://issuu.com/undp-china/docs/china_s_humanitarian_aid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8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8-12/12/content_5347961.htm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4年7月10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4-07/10/content_2715467.htm

④ “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值得加倍珍视（和音）——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2020年4月7日，第3版。

⑤ “习近平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1年5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21/c_1127476371.htm

作作为抗疫之“器”，以公平合理作为抗疫之“尺”，以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作为抗疫之“根”，以实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抗疫之“魂”，为各国携手抗疫、化解全球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提供良策。

中国充分践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其实施的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一道启动了联合抗疫的大型公益筹款项目，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中国已为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抗疫以及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20 亿美元援助，并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陆续向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 13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①中国还承诺“将在未来 3 年内再提供 30 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②。这些做法与一些国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普遍缩减援助规模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2022 年 1 月，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中国已经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向 49 个国家和地区送去了超过 1.8 亿剂科兴和国药疫苗，占该计划已分发疫苗总量的近 20%，充分肯定了中国疫苗对提高全球免疫力和拯救人类生命的重要作用。^③中国的人道主义行动体现了对世界人民基本健康权利的尊重，是为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幸福贡献的中国力量，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社会层面交出的答卷。

六、结语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全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体现。

（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能

2015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问题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

①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自愿陈述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1 年 6 月，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zfzyc_686343/zw/202107/P020210912807817369012.pdf

② “习近平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1 年 5 月 21 日。

③ “世卫组织：中国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新华网，2022 年 1 月 7 日，http://www.news.cn/2022-01/07/c_1128241287.htm

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①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②

实现中国梦，需要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各国国内安全问题蔓延与升级为地区或国际性问题的可能，以及美国在科技、全球价值链等方面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中国需要更加智慧地统筹多维空间的安全和发展关系，才能保证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利于协调中国-全球层面的安全和发展关系，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断疏通国外循环存在的“梗阻”，促进各国外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防止因经济动荡引起地区和国家安全问题。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制度基础，坚持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引领全球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以保护全球空间的综合安全，预防全球安全对国内安全的干扰，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推动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实现。

实现中国梦，还需要实现民族振兴。民族振兴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增强，中国需要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正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不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慷慨援助，还是改革开放后积极遵守国际经贸规则，再到十八大后不断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审时度势，根据对自身实力的判断，提升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在全球治理中做到言而有信、尽力而为、行之有效，充分确保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信用和效率。为创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正是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始终将世界人民的幸福置于心中，才能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有机融合，彰显了中国梦蕴含的世界含义。

①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2015年10月14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14/c64094-27694665.html>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二）通过破解全球治理困境助力人类进步

目前，全球治理面临原有治理理念的部分失灵、全球公共产品的缺失、全球治理主体的失调等重重困境，导致全球治理生态空间的混乱。冷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进程实际上是将西方的国家治理观推广至全球的过程。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常常通过与经济援助相捆绑的方式推行其民主理念，甚至公然采取干预主义推动其他国家内部的“民主化”进程，并利用所谓的普世性规则和价值观来处理利益纠纷。这种全球治理观并没有尊重各个国家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无法适应各个国家的内部特征和全球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局面进一步明显，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根本目标与原有治理体系之间存在冲突。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和投入不断缩减，削弱了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加剧了国家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分裂，抑制了各国推进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全球治理的步伐。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有利于修复“伤痕累累”的全球治理空间。中国不断对全球治理理念进行创新，基于当今世界发展形势，系统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强调“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理念，并明确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对原有西方强调的所谓“普世价值”进行纠偏，真正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能够激发各国人民参与全球治理的热情，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新范式。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有利于解决现有全球公共产品缺失的难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发起建立的各种多边机制，无不是对全球和区域公共产品的补充，弥补了全球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的缺陷，保障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能够继续享受全球治理的成果。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超越了单纯以民族国家或者以国际组织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各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包括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合作，坚持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和谐统一，不断协调全球治理主体的分歧和纷争，有助于增强全球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性。

（三）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决议》指出，“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①文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于全球社会而言，全人类的进步主要体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文明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冷战结束后，不同国家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诱因，不同文明之间的敌意和分歧弥漫在国际舆论空间，国家之间围绕文明问题的纠葛层出不穷，严重威胁国家和地区安全。其次，从人类文明整体来看。在物质文明层面，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因为保守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大国竞争加剧等因素放缓。新冠疫情又一度使全球经济几近瘫痪。在精神文明层面，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平台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众陷入后真相的迷雾中。在政治目的和利益的裹挟下，全球社会中以具体文明为对象的污名化现象也急剧增加，极大地威胁了人类的尊严和价值。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机制性保障”^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亚洲文明大会上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③，为解决当今不同文明间的紧张关系指明了道路。中国推动各国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交流互鉴的方式促进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交流和对话，在交流和理解中共同发展。中国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以期为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引导各国人民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树立同舟共济、命运与共的意识，并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和合而生的思想注入全球社会，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② “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2日，第9版。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页。

【Abstract】 The *Resolution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dopt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path of China's engage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 It could be summed up as maintaini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core and practicing genuine multilateralism;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uiding the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global hotspots and public issues, in addition to expandin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humanitarian action. In terms of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insists on upholding the authority and core statu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icking to upholding and practicing genuine multilateralism to prevent unilateralism, hegemonism and pseudo-multilateralism from challeng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y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eading the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global and regional issues, and expanding its engagement in global humanitarian action, China has fulfilled its global responsibility a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levels. The path of China's engage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coordinat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dual circulation. It helps to cast off global governance predicaments, providing Chinese solution to realize the common progress of mankind.

【Key Words】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solution*, Global Governanc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Аннота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резолюция, принятая на шестом пленуме ЦК КПК 19-го созыва, подытожила конкретный путь участия Кита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который можно резюмировать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с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Нац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ы, практика подлинной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ние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развит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глобальных горячих точек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блем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участие Кита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Китай настаивает на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авторитета и основ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Наций, а также настаивает на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подлинной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вызов одн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гегемонизма и псевдо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брош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орядку. Содействуя здоров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возглави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ешение глобаль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и расширяя своё участие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итай несёт свою глобальн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и социальном уровнях. Путь участия Кита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дипломатии крупной державы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дальнейше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миром, ускорению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в которой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циклы взаимосоординируются, а также помогают решить дилемму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 это китайское решение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бщего прогресса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Шестое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ЦК КП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ого созы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золюции, глоб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дипломатия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冷战与苏联解体**超越旧金山体制，搁置领土争端，走向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胡德坤教授访谈***

胡德坤 徐广森**

【内容提要】“旧金山和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国关于日本领土处置的改变，造成东北亚出现了一系列的领土争端，成为当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合作的最大障碍。“旧金山和约”是战后美日之间出于反苏反华反共的需要相互利用的产物，被称为“冷战活化石”，其本质就是在东北亚建立冷战化的秩序，使东北亚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冷战结束 30 年来，旧金山体制约束下的东北亚地区依然没有走出冷战的桎梏，尤其是旧金山体制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即日本与中国、韩国、苏联(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端，此伏彼起，使东北亚的和平与合作进程止步不前。目前，东北亚地区亟须构建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地区秩序观，即倡导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以超越旧金山体制，走向合作共赢。

【关键词】旧金山体制 领土争端 东北亚地区秩序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7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037(28)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含中国抗战)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6KZD020)的阶段性成果。

** 胡德坤,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名誉院长; 徐广森,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引言

1951年9月8日，美国在把新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排除在外、苏联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强行与48个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标志着冷战体制在东北亚地区的确立。“旧金山和约”签订后，1951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旧金山和约”签订及“生效”至今已有整整70年。70年间，国际秩序随着大国权力消长几经冲击，当前正在经历冷战结束后30余年来最深刻的调整，而东北亚地区秩序却始终没有摆脱旧金山体制的基本框架。二战时期盟国为惩罚侵略国，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决议对日本领土做出了一系列处置规定，但经由旧金山体制的背离与篡改，造成了日本与东北亚国家间的领土争端。这些争端是美国自冷战开始时在东北亚国家间成功打入的楔子，时至今日，不仅仍未解决，还像反复溃烂的伤口一样横亘在东北亚各国间，成为当今东北亚合作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秩序构建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东北亚领土争端的源起与演进过程在何种意义上重塑了当前的地区秩序？东北亚地区的秩序重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超越旧金山体制的桎梏？《俄罗斯研究》编辑部邀请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胡德坤就东北亚领土争端和地区秩序构建问题进行对话。

二、二战遗留：战后东北亚地区领土争端的缘起

（一）二战与雅尔塔体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新秩序重建

徐广森：历史研究中，不同关键节点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的兴趣与探究。在谈及当前东北亚地区领土争端的缘起时，您将其定义为二战的遗留，而非冷战的遗留，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胡德坤：这是基于对历史事件的全面观察做出的判断。东北亚领土问题的缘起甚至可以追溯到近代日本的对外殖民侵略扩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转折点。这是因为，反法西斯的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在战时发布了一系列共同决定。其中，关于日本领土处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规定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对外扩张的领土全部从日本剥离出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全部归还中国；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日本的协定》（又称雅尔塔协定）规定，“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①这是盟国的共同规定，具有国际法效力。而当前东北亚领土争端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旧金山和约”对盟国战时对日领土处置规定的篡改与背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北亚领土争端属于盟国已有决议应该实施而又未能够实施，因而属于二战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冷战促成的“旧金山和约”改变了盟国的决定，是非法的行为，导致了东北亚领土争端，在这个意义来说，东北亚领土争端又是冷战的产物，是冷战的后遗症。战时盟国协调一致的方案，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结果上，都正是我们在东北亚领土问题上所期待回归的原点——虽然在当前的国际现实中，这一期待的实现障碍重重；但回到二战这一起点的观察，对我们思考如何超越旧金山体制的桎梏去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有重要的启示。

徐广森：近代以来的地区战争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世界战争与地区秩序的建构间都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您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何种意义上重塑了东北亚秩序？

胡德坤：我国著名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先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论述提出的整体世界史观认为，“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②。即是说，人类社会早期的历史，直到资本主义兴起前，大体处于农耕社会时期，世界各国各民族处于闭塞的、孤立的、分散的发展状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自 15、16 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便开始疯狂地向海外扩张。尤其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先导，以商品为武器，将触角伸展到世界各地，开拓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各民族之间闭塞的、孤立的状况，将世界强行纳入殖民统治体系。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世界已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世界进入整体发展时期。此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 页。

^② 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62-63 页。

后，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展开的非正义的争霸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一战后，国际社会强烈要求建立世界秩序，以维护世界和平。于是以英法为主导的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正式形成，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国际秩序的诞生。

但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殖民统治体系基础上的，它未能改变帝国主义时期固有的基本矛盾。在 1929 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法西斯势力先后在德、意、日上台，以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为开端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法西斯国家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发动了一系列侵略弱小国家的战争，直接挑战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英法为避免与法西斯国家直接对抗而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纵容法西斯国家将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世界大战，使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沦为历史的笑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力量的较量，是正义与反动、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以苏、美、英、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社会制度间的障碍，打破了殖民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界限，克服了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之间的差异，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国际大联合，团结战斗，共同打败了法西斯国家，取得了二次大战的最后胜利。这场正义战争不仅摧毁了德、意、日建立的欧亚法西斯秩序，而且也猛烈冲击了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而宣告了帝国主义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秩序的终结，世界各国和人民都迫切希望战后能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平等与合作。于是，在战时，盟国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制定了联合国宪章，确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准则，被称为“雅尔塔体制”，为战后世界范围的革命与变革、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即是说，战后国际秩序的准则是在战时就已制定了的，反映了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共同要求。但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了冷战，使战后国际秩序受到了极大干扰。

尽管如此，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准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仍然反映了反法

西斯战争的基本成果。战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建也是如此：一方面基本保留了二战成果，另一方面也受到冷战的干扰，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之所以说战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建基本保留了二战中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成果，是因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明治维新以后至二次大战时期，东北亚的国际秩序是由日本主导的。二战前，琉球国被日本所吞并，中国的台湾省及其附属岛屿被迫割让给了日本，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苏联远东地区遭受过日本军事入侵，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东北亚一霸。二战时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攻占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继而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占了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了被称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统治秩序。但多行不义必自毙。二战中，在中美英苏盟国和亚洲人民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在中国和亚太战场最终遭到惨败，“大东亚共荣圈”分崩离析，为战后亚太地区包括东北亚地区秩序的重建开辟了道路。于是，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朝鲜半岛，结束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以三八线为界在北方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在南方成立了大韩民国（简称韩国）；苏联更加强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日本则在美军占领之下进行了各种改革，走上了自我发展之路。这是近代以来未有之大变局，东北亚理应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平与发展的新秩序。但冷战的发生，使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主导的建立在旧金山体制基础上的东北亚秩序，是典型的冷战体制，它人为地将东北亚国家分裂为两大对立集团长期对峙，乃至兵戎相见，严重伤害了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制约了东北亚各国的合作与发展。现在，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旧金山体制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例如，冷战思维还存在，还在影响着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又如战争观问题，至今仍然横亘在日本同亚洲国家关系间难以消除。尤其是在对日领土处置问题上，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造成了日本同中、韩、俄（苏）等国的领土争端。如此等等，不仅严重影响了战后以来东北亚国家的合作与发展，而且从长远看也影响着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进程。

（二）惩罚侵略国：战时美英苏中四大盟国对日本领土处置的规定

徐广森：您提到，战时盟国协调一致的对日领土处置方案，其形式和结

果都是我们在东北亚领土问题上所期待回归的原点。可否理解为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违背了盟国大国一致原则，造成了东北亚的领土争端？能否介绍一下盟国大国一致原则的形成及有关对日本领土处置的具体规定？

胡德坤：的确是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违背了盟国大国一致原则，导致了东北亚冷战体制的建立；改变了盟国对日本领土的处置，造成了东北亚的领土争端。

关于盟国大国一致原则。反法西斯盟国在战时就确定了大国一致原则。从反法西斯联盟建立时开始，在盟国战时各次重大会议、协议、公告、宣言等国际法文献中均规定，不与法西斯轴心国单独媾和，不与战败国单独签订和约，这就是“盟国一致”的原则。因为战时盟国的重大决策大多是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决定的，因此，“盟国一致”原则又称“大国一致”原则。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宣言》规定，“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①。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发表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四大国一致的决心是，在打败敌人及处理敌人投降事项方面，“将采取共同行动”。^②于是，盟国一致原则和不单独媾和就成了反法西斯四大国的庄重约定。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的开罗会议宣言决定对日本领土进行处置，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其他国家领土必须归还。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会议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③。《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来都得到苏联的承认，成为四大国的共同宣言，从而成为处置日本领土的国际法依据。1945年12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决定设立远东委员会及盟国管制委员会，规定盟总最高统帅应负责实施远东委员会决定之指令；盟总所有训令均须呈报远东委员会。远东委员会之决议案，每项决议案至少须经全体代表多数之赞成，且赞成之代表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43页。

② 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51页。

③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77-78页。

中须包括下列四强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中华民国。^①这表明盟国远东委员会仍在坚持大国一致原则。1946年1月29日，《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具体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国土是以四个主岛及其邻接之约1000个小岛、对马岛及北纬30度以北之琉球（南西）诸岛（不含口岛）构成”^②。1947年6月19日，盟国远东委员会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在《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中，重申了日本领土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可能决定之附近岛屿”^③。从以上可见，在战时就已形成的大国一致原则，在战后初期，美国尚能遵循。但冷战发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利用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操纵“旧金山和约”，不仅排斥新中国出席会议，而且在苏联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旧金山和约”。即是说，“旧金山和约”是违背了四大国中两个大国的意愿而擅自表决通过的，是对盟国大国一致原则的粗暴破坏，导致了东北亚在两大对立集团基础上的冷战秩序的形成，成为东北亚国家合作与发展的巨大障碍。1951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④。

关于盟国对日本领土的具体处置问题。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召开了开罗会议。2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就对日本领土处置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一）日本获取于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于中国；（二）太平洋上日本所强占之岛屿，应永久予以剥夺；（三）日本溃败以后，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⑤在此基础之上，12月1日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其中规定了剥夺日本侵略扩张所攫取的领土范围，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域；二是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

① 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945-1980）》，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15-17页。

② 《外交部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档案号：419/0004。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43页。

④ 同上，第99页。

⑤ 《开罗会议（二）》，台湾“国史馆”，档案号：002000001245A。

还中华民国；三是日本的殖民地朝鲜获得独立；四是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①这其中的第四点所指的领土，自然就包括日本在 1879 年吞并的琉球群岛和一战期间占领的太平洋岛屿，还包括日本于 1895 年甲午战争时秘密强占的中国钓鱼岛、韩国独岛，以及通过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的台湾等中国领土等等。^②1945 年 7 月，中、美、英三国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当中重申，“开罗会议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③。《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得到了苏联的同意，可视为中、美、英、苏四国的共同决定，因此体现了大国一致原则，具有明确的国际法效力。

根据盟国战时的领土处置安排，1946 年 1 月 29 日，《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 677 号》具体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盟总于同日向日本下达《某些外围地区的政府和管理与日本分离的备忘录》。^④当时的中国驻日代表团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 677 号》和《备忘录》绘制了日本疆域图，收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中。这幅地图再现了盟国规定的日本领土范围，由四个主要岛屿和大约 1000 个较小的邻近岛屿组成，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磺岛等都不是日本的领土，这是盟国的共同规定。

以上我所陈述的史料表明，盟国在战时基于大国一致原则达成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战后盟总发布的相关指令中对日本领土的处理方案，实际上都明确反映了整个雅尔塔体制之下，东北亚秩序重建的地理蓝图：这些规定将日本领土限制在“由北海道、本州、九州和四国四个主要岛屿和大约 1000 个较小的邻近岛屿”，而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磺岛等均不在日本的领土范围内。也就是说，在地缘层面上，这一规定从北、东、南三面限制住了日本的国土范围，能够有力地遏制战后日本再度崛起威胁邻国乃至再度改变地区秩序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反法西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407 页。

② 胡德坤：“‘旧金山和约’与东北亚领土争端”，《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92 页。

③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77-78 页。

④ 《外交部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档案号：012.6/0138。

斯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战胜并严惩法西斯侵略国，使法西斯不再有机会死灰复燃。因此这一领土处置规定是对侵略国应有的惩罚，也是对战胜国和被侵略国公正的赔偿。但是美国单方面主导的“旧金山和约”违背了盟国战时对日领土处置的一系列规定，其后果与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三）冷战产物：“旧金山和约”对盟国对日领土处置的背离是东亚领土争端之源

徐广森：“旧金山和约”从哪些方面改变了盟国在战时对日领土处置的具体安排？

胡德坤：“旧金山和约”得以签订的前提，就是美国在战后对日本政策的重大逆转：从惩罚侵略国日本，转为扶植侵略国日本作为在东北亚冷战格局中制衡苏联与中国的前沿堡垒。美国对日本的政策逆转是导致东北亚冷战格局的直接原因。而美国这一政策逆转也公开违背了战时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及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文件为基础的处置方案，转为迁就日本对已被盟国剥夺的土地要求。

第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改变，就是背离了盟国对待法西斯侵略国的大国一致原则。这一点在前面已经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个重要的改变，是对《开罗宣言》关于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规定的篡改。《开罗宣言》规定了日本必须将近代以来侵占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钓鱼岛、南海诸岛交还给中国。《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这一规定。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于战后收复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西沙、南沙群岛，但“旧金山和约”却在其文本中将日本“归还”改变为日本“放弃”。^①这一篡改不仅是造成当今日本与中国的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根源，同时也是造成中国南沙群岛争端的根源。《开罗宣言》是中、美、英、苏四大盟国的共同规定，具有很强的国际法效力。然而相比之下，“旧金山和约”是将中国排除在外、苏联拒绝投票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其合法性应受到广泛的质疑。

第三个重要改变，是篡改了对琉球群岛等岛屿的规定，后又因美国擅自将钓鱼岛划入琉球管辖，直接造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在《盟军最高司令部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5页。

训令第 677 号》的《备忘录》中明确规定，日本领土不包括北纬 30 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小笠原和硫磺列岛等。对此，旧金山对日和约有两个改变，一是地理范围的扩大：和约中将琉球群岛“北纬 30 度以南”改为“北纬 29 度以南”，以迁就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索求；二是“剩余主权”的规定：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宣布日本对美国托管的岛屿包括琉球群岛“拥有剩余主权”，这就直接改变了《波茨坦公告》关于日本领土范围的规定，是美日之间的政治交易，为此后美国将这些岛屿私相授受给日本埋下了伏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顾历史事实和战时盟国的规定，擅自将钓鱼岛划归琉球地区管辖，后又不顾中国两岸的反对，在向日本私相授受琉球时，擅自将钓鱼岛交给了日本管辖，这直接造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

第四个重要改变是关于与韩国的领土划分，《开罗宣言》中有明确规定，日本必须交还侵占朝鲜的全部领土，使朝鲜获得自由独立。^①《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 677 号》的《备忘录》中明确规定，日本领土不包括“郁陵岛、竹岛（独岛）和济州岛”。^②即规定独岛属于韩国而不属于日本。中国政府据此《备忘录》规定所拟的提案明确表示独岛归属韩国。^③但“旧金山和约”却不提日本“放弃”独岛，造成了当今日本与韩国的独岛争端。

第五个重要改变是违反了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苏联和日本领土划分的规定。1945 年 2 月由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日本的协定》中，关于苏日领土问题规定，“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④然而“旧金山和约”却在文本中将“交还”、“交予”改变为“放弃”，这一篡改同样也是造成当今日本同俄罗斯之间领土争端的根源之一。

简言之，“旧金山和约”的签订违背了大国一致原则与盟国的共同规定，其文本对盟国的共同规定做出了许多篡改，直接导致了日本同中、韩、俄等东北亚国家之间，乃至中国同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使东亚国家长期处于无休止的领土争端中，从而利于美国对东北亚、东亚国际局势的掌控。

徐广森：从您的回答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日本的政策逆转是导致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 3 页。

② 《外交部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档案号：012.6/0138。

③ 同上，“日本领土问题”，档案号：072.4/0001。

④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 3 页。

东北亚冷战格局形成的直接原因，并为东北亚领土争端埋下了火种。既有研究都很重视从美国的视角进行研究。但我阅读您的相关论文时发现，美国对日本领土处置的改变过程中日本仍起了关键的作用。结合您熟知的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看，日本是怎样促使美国对东北亚领土政策发生逆转的？

胡德坤：之前提到，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对日本领土的处置还是能够按战时盟国的规定进行的。而日本方面，虽然日本在战败向盟国投降时多次承诺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如：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①。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向中、美、英、苏等盟国投降的《日本投降书》，再次向盟国承诺“承约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②但自美军进驻日本后，日本政府就违背“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的承诺，就领土问题反复向盟国主要是美国讨价还价，以尽可能多地保留日本殖民扩张的领土。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回忆录当中写道，当时为了应对盟国对日领土处置，日本曾组织专班编写英文资料，试图“从历史、地理、民族和经济等一切观点”，详细叙述冲绳岛、小笠原群岛、库页岛、千岛群岛、齿舞岛和色丹等岛屿“与日本不可分割的关系”。^③事实上，日本政府在签署投降协定后就在策划在领土处置问题上如何突破盟国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力争将盟国已从日本剥夺的一部分领土索要回去。根据这一指导思想，1946年1月26日，外务省政务局起草了《盟国和平条约案与我方希望案之比较研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就日本邻近的诸小岛而言，“努力允许我国保有范围的扩大”；就琉球群岛而言，日本要求交给盟国共同托管或者美国单独托管，反对归属中国；就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而言，日本认为《雅尔塔协定》是密约，因此日本没有必要受其约束，应探讨附加条件，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归属。^④1946年2月1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起草了《关于和平条约内容的原则方针研究及联合国方案与我方所期望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7页。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参见[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6-7页。

④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旧金山和约——对策准备》，2006年，第95-96页。

方案的比较》，预计联合国将实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日本领土的规定，即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开罗会议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按照这一规定，日本本土四个大岛属于日本无疑问，但“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还需要另外指定。于是，日本则在“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上大做文章，希望“确保重要的各小岛，特别是确保在地理、历史、民族、经济等方面与日本有关系的小岛”^①，划归日本。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众、参两院发表咨文，将世界划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将苏联列为“极权主义”国家，宣布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这就是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产生，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将遏制苏联和各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冷战战略列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冷战的发生导致盟国开始走向分裂，日本便积极投靠美国，也企图利用美国主导盟国制定对日和约来达到其索要土地的目的。1947年7月24日，日本外务省制定了与美国国务院驻盟总政治顾问阿奇逊会谈的《日方希望案》，全面提出了日本对媾和的九项要求，如“在媾和条约起草过程中，期望能给予日本政府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等等，在具体确定日本周边小岛归属问题上，“希望能充分考虑这些小岛同日本本土之间的历史、人种、经济、文化方面的紧密关系”^②。但这些不符合战败国身份的过分要求被盟总断然拒绝。7月28日，阿奇逊明确表示，不希望日本在尚未知晓盟国条件的情况下就开始与盟国讨论条件。同日，盟总民政局长惠特尼也回复说：“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看来，日本的立场是企图在和平会议上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对日和约，……很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特别是反对日本的国家，反而对日本不利。……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最明智的做法是一直到媾和会议开始前保持沉默。”^③日本企图通过美国主导盟国对日和约索要土地的计划未能得逞。

①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旧金山和约——对策准备》，2006年，第74-75页。

② 同上，第245-247页。

③ 同上，第262-264页。

美国对日领土态度发生变化的关键节点是在 1949 至 1950 年间。这当中有三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使整个东北亚局势发生了巨变。美国违背了战时盟国的大国一致原则，翻手为云，将战时盟国中、苏变为敌国；覆手为雨，将战时敌国日本变为盟国，造成了美、英、中、苏盟国的对立与分裂，美国对日本领土处理政策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惩罚侵略国日本转变为扶植日本成为亚洲冷战的堡垒。美国对日领土处置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剥夺日本“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转变为尽可能满足日本对已被盟国剥夺的土地要求。

美国这一系列政策的变化，给了日本利用盟国分裂争取单独媾和的机会。所谓的单独媾和就是日本依靠美国，撇开中、苏，与包括英、法在内的一部分国家媾和。日本先是提出允许美国驻军，随后又向美国提出了全然不符合其战败国地位的领土要求。1949 年 12 月 3 日，日本外务省提出，苏联与中国参加媾和的可能性已完全消失，日本为了自身安全，允许缔约国在日本本土以外的诸岛驻军、设立军事基地，但外国驻军的主体是美国军队，可以此为条件换取与美国等签约。^①1950 年 10 月 4 日，日本外务省草拟了《关于对美国对日和条约案构想的对策方针》^②，表示：第一，不同意将千岛群岛交还给苏联。第二，希望不将琉球群岛、小笠原诸岛以及硫磺群岛从日本领土中割离。虽同意美国托管一些地域，但必须限定在最小范围内，而且要求“日本与美国一起作为托管的共同施政者”，“托管结束后由日本国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托管期满后美国将托管施政权转让给日本”。同日，日本外务省又制订了《对美陈述书》，重申不同意将千岛群岛交还给苏联，也不同意美国托管后使包括冲绳在内的西南诸岛、小笠原诸岛以及硫磺群岛与日本本土分离而走向独立，因为这些群岛并非日本“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③但美国仍没有同意日本的全部要求。1950 年 10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在会见记者时确认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对日和约七原则，第三条款关于日本领土的处置原则是：“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同意美国作为施政

①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旧金山和约——对策准备》，2006 年，第 441-442 页。

② 同上，第 18-20 页。

③ 同上。

方的联合国托管琉球群岛及小笠原群岛；承诺接受英、苏、中、美以后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地位的决定，倘若和约生效后一年内尚无决定，将由联合国大会做出决定；日本放弃在中国之特权以及利益。”^①

日本因美国没有明确表述其托管区域的主权归属日本而感到强烈不满。10月25日，日本外务省在《关于美国对日讲和七原则》的文件中多次提及“国民感情难以接受”^②。1951年1月19日，日本外务省在上述文件的修订版中表示，愿“先同美国一国缔结和平条约”^③，“在冲绳、小笠原群岛不得已而托管的情况下，……日本要成为共同施政方，进而在解除托管时，这些岛屿再次归属日本”^④，“日本不管是对于岛屿的归属、岛上的行政以及对岛民统治，都与美国有同等地位”^⑤。日本这一共同托管和在托管后交还的要求，不仅严重违反了盟国规定，还反映出日本对其发动二战的战争罪行缺乏根本反思及认罪态度。日本的以上要求连美国也感到过分。1951年1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与日本首相吉田茂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回绝了日本的要求，表示“希望日方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已经决定的事情来考虑”^⑥。

然而此后美国对日的基本政策发生了进一步转变：将敌国日本视为其冷战体制下的盟友。因此在主导和约的过程中，美国对日本领土处置的立场也有了根本转变：借签订对日和约之名，行结盟战败国遏制盟国之实。这在美国对日和约方案中有两点直接体现：第一，1951年1月29日，杜勒斯访日，在与日本首相吉田茂会谈时表示，“这次我们并不是站在胜者的立场与败者制订和约的，而是作为日本的友邦来考虑整个和约的”^⑦。这一表态给吉田吃了定心丸。第二，美国在和约中送给日本两份大礼。一是将盟总规定的日本南部疆界从北纬30度改为北纬29度，将琉球群岛北部领土划入了日本版图。二是承诺在美国托管的琉球群岛等地“日本拥有剩余主权”。^⑧所谓“剩

①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旧金山和约——对策准备》，2006年，第97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同上，第137页。

④ 同上，第140页。

⑤ 同上，第162-163页。

⑥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旧金山和约——对美交涉》，2007年，第189页。

⑦ 同上，第175页。

⑧ 同上，第611页。

余主权”，实际上是美国不愿在公开条款中明确表达日本对美国托管地区拥有主权，便有意通过模糊措辞来承认日本对托管地区的“剩余主权”，为日后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群岛等地埋下了伏笔。日本对这一决定十分满意。1951年9月7日，吉田茂在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上发表的《对日和平条约受诺演说》中提到：“这（‘旧金山和约’）不是复仇的条约，而是‘和解和信赖’的文书”，“我以日本国民的名义，以极其高兴的心情，表示接受。”^①

由此可见，“旧金山和约”是战后美国出于在东北亚遏制中苏的需要，日本出于摆脱战败国应受惩罚的需要，两国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产物。其本质目的就是将东北亚秩序冷战化：一方面利用盟国对日签署和约这一战后集体行动，另一方面却排斥中国参会，且不顾苏联反对。“旧金山和约”对盟国战时规定的改变造成了东北亚一系列领土争端，其恶果延续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时至今日，冷战已在世界范围内结束30年了，然而旧金山体制约束之下的东北亚地区格局与国际关系却依然没有走出冷战的桎梏。领土争议就是美国在东北亚国家间乃至阵营对抗间打下的楔子。这固然是美国有意为之，但日本作为争议当事国、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若真有正视历史、承认罪行的诚意，就应回到战时盟国共同规定的原点上，反省近代以来对外殖民侵略给邻国造成的领土主权伤害，以实际行动争取得到受害国的谅解。

三、领土争端：影响战后东北亚合作的最大障碍

（一）钓鱼岛争端：中日稳定持续合作的最大障碍

徐广森：在您看来，领土争端在战后东北亚地区秩序与国家关系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胡德坤：“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同中国、俄罗斯（苏联）、韩国的领土争端，贯穿于整个东北亚国家间关系和地区发展的全过程，就像横亘在这些国家间的三座火山，一有机会就会喷发出来。因此，我认为领土争端是影响战后东北亚地区合作的最大障碍。以中日关系为例，在东北亚所有的国家关系中，中日关系与双边合作应该说受领土争端干扰是最大的。

^①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旧金山和约——签字与生效》，2009年，第136页。

战后初期，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向盟总提出要求将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归还中国。但美国出于钓鱼岛在军事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理睬中方的要求，拒不将钓鱼岛交还中国，反而将其编入琉球予以管辖。1971年，在“旧金山和约”签订20周年之际，美国不顾中国两岸的反对，在向日本私相授受琉球时，擅自将钓鱼岛交给日本，这就造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再起。

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时，钓鱼岛争端就是横亘在两国间的巨大障碍，但中国领导人从中日友好的高度出发，向日方提出将钓鱼岛争端搁置起来的建议，得到日方的同意，中日复交才得以实现。1978年中日签订友好条约时，双方再次明确搁置钓鱼岛争端的共识。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少数政府官员开始否认中日两国领导人关于搁置钓鱼岛争端的约定。1988年11月8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齐藤邦彦在日本参议院答疑时甚至认为，“关于日中之间有搁置共识这件事，完全不存在”^①。此后，日本外务省多次否认中日间存在领土争端，从而激起了中国两岸人民的义愤，使中日关系走向低谷。2012年9月10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不与中方协商，突然宣布从私人手里购买钓鱼岛，将钓鱼岛国有化，从而单方面从政策层面改变两国搁置钓鱼岛争端的约定，挑动中日钓鱼岛争端，两国关系迅速下降到复交以来的最低点。

2019年9月，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应邀来武汉大学访问，在演讲过程中谈到中日钓鱼岛争端时，他说：“在1972年，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就达成了对该问题实行搁置的决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当时的中方翻译林丽韞女士证实了这一事实。1979年《读卖新闻》的社论中也写道：‘两国政府同意在各自主张主权、承认存在争议的同时，将这一问题留待将来解决。这虽然没有写入共同声明和条约，但确为政府间的承诺。既然有这一承诺，就应该遵守。’2012年，东京都知事石原在访美期间发表演讲称，东京都政府将从私人手中收购尖阁列岛（钓鱼岛）部分岛屿。以此为开端，野田首相宣布将对尖阁列岛（钓鱼岛）

^① 刘江永：《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44页。

实施国有化，至此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被再次摆上台面。既然日方已将该问题摆到台面上，中方也不得不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并开始派遣公务船进入尖阁列岛（钓鱼岛）周边海域。这是中方表示将不会撤回领土主权主张的一种示威活动，并形成了每月3次、一次12艘船的固定模式。但因为有事告知日本海上安保厅，所以并未因此引起不必要的争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仍处于被搁置的状态，但因为两国间仍然存在发生冲突和情绪激化的可能，我认为两国政府应该将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留待后世解决，并应当通过某种形式将这一问题再次搁置起来。日本政府仍然主张尖阁列岛（钓鱼岛）在主权上不存在争议，我认为必须改变这种顽固的态度。”^① 鸠山由纪夫先生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是日本政治家违反两国政府搁置争议的共识，挑动钓鱼岛争端，恶化了中日关系。

钓鱼岛争端不仅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间的合作关系，更是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重大障碍。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2002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构想，时隔10年，中日韩三国于2012年在北京签署《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并于同年11月正式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由于日方再次挑起钓鱼岛争端，使中日关系短时间内迅速恶化，再加上独岛问题的频频发酵也在不断影响日韩双边合作，这些问题都导致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止，至今仍停滞不前。领土争端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日本如果不能正视侵略的历史，不能主动与中国和解，不能妥善处置旧金山体制造成的领土争端，中日关系将很难走向稳定持续发展。

（二）日俄领土争端：冷战框架约束下的僵局

徐广森：我想从地区权力结构的视角，试着谈一谈日俄领土争端对双边关系和地区秩序发展的不同影响。俄罗斯是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后来者，18世纪沙皇俄国在向欧亚地区东北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拥有了东北亚国家身份。相对于莫斯科公国扩张以前的东北亚文化而言，俄罗斯具有一种“他者”身份。正是因为俄罗斯与中国文化并不同源，俄国自始至终没有融入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文化圈。因此在近代史中，中国是将俄国与英、美等国

^① 2019年9月25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一样，视为来自陆海不同方向的西方殖民势力。事实也是如此，近代以来，俄罗斯的远东扩张，对东北亚秩序造成了最强大的陆上冲击。

俄国进入东北亚之时，日本就将其视为北方的最大威胁。^①日本从明治时期发展陆军，日俄战争后在东北亚分割势力范围，二战时期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再到冷战时期甘为美国在东北亚冷战的“桥头堡”。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在地缘战略和地区秩序构建中，俄国（苏联）都是其重要考量之一。另一方面，俄国（苏联）的存在也是二战后美国长期在东北亚地区驻军的直接原因。日俄领土争端的实质一直都是美俄两个大国在不同时期通过牵制日本来制衡彼此的地缘工具，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日俄领土争端复杂，很难用几句话去概括。从17世纪末期开始，俄国就已占领了堪察加半岛，并迅速南下占领了千岛群岛的德抚岛、择捉岛。此后，日本也北上向库页岛、千岛群岛扩张。1855年2月7日，日俄双方通过外交谈判签订了《日俄通好条约》^②，条约关于千岛群岛的划分，在择捉岛和德抚岛之间划定了两国国界，即择捉岛以南属于日本领土。1875年，日俄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规定库页岛由俄罗斯控制，千岛群岛由日本控制。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同俄罗斯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迫使俄罗斯将南库页岛割让给日本。这种边界状况一直维持到二战后期苏联对日宣战前。1945年2月，在雅尔塔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苏联提出了对日作战的三个条件：一是维持外蒙现状；二是恢复苏联在1904年由于沙俄战败而丧失的旧有权利，其中就包括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需归还苏联；三是将千岛群岛让渡给苏联。为了推动苏联尽早对日作战，美英同意了苏联的条件。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了《关于日本的协定》，关于苏日领土问题规定，“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③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占领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1945年9月2日，盟军《一般命令第一号》

① 参见钟飞腾：“日本国际秩序观”，《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9页。

② 又称“日俄和亲条约”。参考外務省条約局著『舊條約彙纂（第一卷第二部）』、昭和九年四月、521-552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B10070281300）。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3页。

划定了日本的受降区就包括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正如在前面讲过的，1946年1月29日《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对日本的行政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将包括千岛群岛、齿舞岛和色丹岛在内的领土从行政上与日本剥离。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和约”中，这一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称“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由于1905年《朴次茅斯条约》所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①，但却不说明放弃之后这些土地由谁接收。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

在此之后，日苏间的领土问题以“两岛返还”和“四岛返还”间的争议为表象，以美苏两大阵营在东北亚的彼此制衡为内核，彻底转变为美苏分别牵制日本的筹码：1955年，苏联提出以归还齿舞和色丹二岛为前提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美国则明确提出，如果日本在国后、择捉两岛上对俄让步，美国将考虑永久占领冲绳。^②为确保冲绳日后得以返还，日本于1956年与苏联达成密约，只要美国不返还冲绳及小笠原群岛，日本便不再提及国后和择捉两岛问题。因此，1956年10月的《日苏共同宣言》中只提苏联同意归还齿舞与色丹两岛，但这二岛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立即返还。

日苏恢复邦交后，冷战局势的紧张程度却在日益上升，日苏领土问题随即出现僵局：日本重新提出了与苏缔约前的“四岛返还”立场。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签订，苏联随即向日方表示，由于该条约使日本丧失了独立地位，因此导致苏联政府无法归还齿舞和色丹诸岛。^③而美国则于同年发布《美国对日政策公告》，鼓励日本对苏联的千岛群岛及库页岛的主权要求坚决不让步。^④这一僵局至今仍未化解。直到今天，俄罗斯仍坚持，如果美国从冲绳撤军，俄罗斯就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并向日本移交色丹、齿舞二岛。然而，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5页。

② 木村汎編『北方領土を考える』、北海道新聞社、1981年、75頁。转引自李若愚：“领土问题视野下的日苏关系（1917-1956）”，《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5页。

③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七日ソ連政府对日覚書」、北方領土問題調査会編『北方領土問題資料集』、北方領土問題調査会、1972年、188-190頁。转引自李若愚：“领土问题视野下的日苏关系（1917-1956）”，《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7页。

④ 参见李若愚：“领土问题视野下的日苏关系（1917-1956）”，《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7页。

美日同盟的稳固程度也预示了俄罗斯会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维持现状。^①

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处理历史遗留的“北方领土”问题之时，安倍晋三在 2016 年 5 月提出了解决领土问题的“新方法”，即同意优先发展对俄经济合作，通过改善日俄关系，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②2018 年 11 月，安倍在与普京会晤时商定，“以 1956 年《苏日共同宣言》为基础，加快和平条约谈判进程”^③。然而随着安倍的卸任，继任的两任首相对“不把领土问题留给后代解决”的态度逐渐强硬，^④俄罗斯也通过在南千岛群岛的多次军演向日本表明其坚定的主权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旧金山体制内的日俄领土问题将会继续受制于日美同盟和俄美关系框架。^⑤在这个意义上说，领土争端将会继续限制日俄在各方面合作的实质性进展。

胡德坤：日俄领土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历史对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两点：其一，安倍在 2016 年向俄罗斯提出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推进共同的经济活动”为核心思想的新方案至少表明，当代日本政府面对领土争议时，是有“搁置争议”想法的，但却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左右，尤其是在日美同盟十分稳固的形势下，日本很难突破美国主导的东北亚秩序的框架。其二，地区合作的障碍也好，冷战框架约束下的僵局也好，归根结底，日本与东北亚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是旧金山体制造成的，而这些领土争端的僵局状态客观上也在“助推”旧金山体制的延续，进一步约束“旧金山”框架内的东北亚各国间的互动。所以从领土问题单刀直入，或是从地区权力关系的思路来解决领土问题上的僵局，在现有条件下似乎都难以行得通。因此，目前东北亚地区要走向合作与发展，在领土争端问题上需要有高屋建瓴的新思维，才能超越旧金山体制这一“冷战活化石”对东北亚地区人民的长久束缚。

① 参见刘建平：“战后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问题发生及其国际处理规范”，《日本学刊》，2017 年第 6 期，第 76 页。

② 孙承：“安倍解决日俄领土问题‘新方法’的战略考量”，人民网，2017 年 4 月 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405/c1002-29190327.html>

③ “日本新首相盼解决日俄领土问题”，新华网，2020 年 10 月 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0/01/c_1210824751.htm

④ “日本首相重申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问题不能留给后代”，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1 年 12 月 2 日，<https://sputniknews.cn/politics/202112021034895508/>

⑤ 陈梦莉、白如纯：“日俄争议领土交涉中的美国因素”，《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66 页。

四、超越旧金山体制：搁置领土争议， 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地区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胡德坤：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从宏观与整体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能得出这样的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地区命运共同体都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吴于廑先生的整体史观认为，世界历史在向整体发展的演进中，也明显存在地域化即区域化特征。这种区域化发展在相对隔绝的古代主要表现为域内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地区秩序，而在现当代则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历史的区域化发展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历史区域化发展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地区命运共同体也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东北亚地区亦然。

（二）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历史与现实的呼唤

徐广森：从东北亚地区内部的秩序和秩序观演进来看，是否有一些历史性与规律性的特点，预示了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这一秩序观形成的必然性与现实性？

胡德坤：秩序与秩序观念不同，秩序反映的是地区现实，而秩序观反映的是超越秩序现实的理念与地区发展愿景。从地区秩序的发展来讲，东北亚地区大致经历了分别以封建朝贡体系、殖民体系和冷战体系为基础的三个秩序阶段。而要论及秩序观，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古代东北亚的华夷秩序观，这一观念长期深入反映在地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当中。最具破坏力的是日本法西斯在二战时提出的“大东亚新秩序”，日本法西斯为实现这一秩序观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使地区乃至世界深陷世界大战。最具有建设性的是战后“雅尔塔”秩序观，基于大国一致原则构建起的战后新秩序为世界和地区发展带来曙光。还在影响当今东北亚的是建立在“旧金山和约”基础上的冷战秩序观。冷战结束了，但冷战的思维还在继续影响东北亚的合作与发展。对现代及未来最具指导意义的秩序观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18 世纪以前的东北亚地区秩序，可以看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东北亚地区的延伸，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源远流长的地区秩序之一。总体上，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是一种以和平手段推动的非强制性的地区秩序。华夷秩序观的和平性体现在反对擅自用武力改变现状，中国作为华夷秩序的主体，很少会兴兵攻打不臣服的地区。非强制性体现在中国对于周边各国的册封主要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其紧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繁荣度。而这一其非强制性的根源，在于周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臣服。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这一秩序观中的身份认同是由文明认同驱动而生的。离中国越近，其对于中国的关系越紧密，依附性也越强。华夷秩序观中的和平性和非强制性，在如何推动当今的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新秩序、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问题上，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古代东北亚这一由中华文明主导生成的地区秩序，也具有明显的松散性。这表现在，从外部来看，一旦外来文明的冲击使中国陷入衰落或战乱，东北亚各国的联系便会迅速陷于松散、停滞状态。这种现象尤其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渐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西方列强从陆海两路对亚洲的入侵，不仅从武力上给东北亚各国以降维打击，也撼动了华夷秩序，将东北亚地缘格局和地区秩序彻底改变。而从内部来看，正是由于东北亚秩序是由文明驱动的，其内部的国家形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分为文明中心国家及其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周边国家，因此它的文明内部有着比较严格的等级，当文明中心受到外来冲击之时，东北亚地区容易陷入分裂。

近代以来到二战结束之前东北亚地区秩序的裂变，就是从相对和平稳定的华夷秩序转变为西方殖民体系，而这一裂变滋生出了日本试图独占独霸的“大东亚新秩序”观。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东北亚华夷秩序的彻底崩塌，日俄战争的胜利又使日本在与俄国的较量中赢得了东北亚地区秩序的主导权，成了华夷秩序圈中唯一未被西方殖民化的国家。此后，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企图取代西方列强构建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便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1937 年，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 年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宣称要建设以日本为中心、将中国、朝鲜

纳入其中的“东亚新秩序”；1940年又相继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将苏联远东地区、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也纳入其中。从地区外部来看，日本的这一地区秩序构建和扩张行动与德、意一起，摧毁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法西斯盟国为敌，处于盟国包围之中。而从地区内部来看，日本用西方殖民势力武力扩张的方式，企图重构等级形态的地域秩序，受到了来自地区内部各国的激烈反抗，因而最终遭到惨败。日本最终的失败也昭示了东北亚人民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厌恶和对和平、平等、合作新秩序的期待。

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得日本“大东亚新秩序”彻底崩塌，为重建东北亚地区新秩序扫清了障碍。战时盟国对日处置包括领土处置的规定，反映了“雅尔塔”秩序观下东北亚地区在地缘意义上的重塑。“雅尔塔”秩序观是近现代东北亚地区历史发展中具有建设性的秩序观，主要体现在大国一致原则的确立和战败国对战胜国及被侵略国相对公正的包括领土在内的补偿，为战后东北亚地区和平秩序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然而，接踵而至的冷战使“雅尔塔”秩序观在东北亚地区失去了得以实现的前提，并最终被旧金山体制所代替，形成了东北亚以两大阵营对峙为基调的区域秩序。

旧金山体制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仍未消除，主要体现在：一是由意识形态领域引发的激烈对抗仍在延续。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朝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曾为社会主义苏联的俄罗斯的冷战思维仍然严重存在，尤其是防范中国，使得东北亚地区甚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对抗最激烈的地区。二是对二战历史认识的分歧，尤其是日本对二战战争罪行缺乏反省及其种种行径，以及由此频频引发的对教科书的篡改、慰安妇问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已成为横亘在中韩与日本之间的鸿沟。三是领土纠纷频频浮现。在东北亚地区，中、日、俄、朝、韩五国存在的钓鱼岛、南千岛群岛、独岛、朝韩边界等诸多领土纷争，时常影响地区国家关系，甚至多次演变为武装冲突。如此等等，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可见，无论是东北亚的历史还是现实，都在迫切呼唤超越旧金山体制，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东北亚地区秩序及其观念演进的历史有一些规律性的经验，揭示了东北

亚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趋势：

首先，等级形态的秩序和秩序观念已非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等级形态下的地区秩序带来的只能是松散的、表象的凝聚，而不能真正形成稳定持续的地区秩序向心力。而在平等与主权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现当代，试图以武力强制手段和等级观念建立的地区秩序，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定要在吸取日本用武力强制建立“东亚新秩序”教训的基础上，发挥地区秩序构建的内在驱动力，突出地区秩序和平与非强制的特征，要改造其松散性，更要警惕等级形态的产生。

其次，地区历史与现实呼唤东北亚国家形成集体身份，构建新型域内国际关系。松散形态下的地区秩序易导致外部力量的介入。东北亚各国应当努力推动以集体身份在国际社会发声，回应东北亚地区基于历史与地缘的集体利益的需要。与此同时，更要吸取冷战体制下长期阵营对抗的历史教训。地区内的国家交往应继续坚持“竞争但不对抗，结伴但不结盟”。这当中，中俄关系长期秉持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相处原则具有极强的典范作用。而美国发明的所谓印太战略，特别是其延伸出来的美日印澳“四国联盟”恰恰公开结盟，对抗、针对中俄，是地区内的不良示范，也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形容的，是在开历史的倒车，^①侵蚀了亚太地区过去几十年来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的普遍模式，即基于共识原则形成的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一系列多边对话合作机制。

第三，以文明认同、历史摸索经验与区域统合的现实紧迫性为基础，东北亚地区的统合进程具有光明的前景。尽管面临域内外的诸多挑战和遗留问题，但东北亚各国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所取得的初步成效，证明了东北亚地区各国能够以自身的力量推动区域合作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从长远来看，在经济合作并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东北亚地区也应当能够朝着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三）搁置领土争议，努力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徐广森：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旧金山体制留下的诸多“后遗症”仍在地

^① “拉夫罗夫：美国建立澳英美联盟和美日印澳对话，是在开倒车”，2021年10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AIQF4_ohtgluqYvHH6mGQA

区乃至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难以消除的影响。就像您提到的冷战思维的持续存在、战争观的分歧，以及日本与东北亚各国的领土争端，这些问题自旧金山体制形成开始，70多年来始终是东北亚国家走向持续稳定合作的巨大障碍。如何超越旧金山体制，对东北亚各国而言都是紧迫且重要的时代课题。

胡德坤：这的确是一个时代课题。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超越旧金山体制的桎梏，需要东北亚国家有足够的智慧，着眼长远发展，把国家利益建立在人类长远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主动创造推动地区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机遇。在当前形势下，要努力推动地区各方超越领土争端与历史积怨，搁置领土争议，认识到地区发展的紧迫性和合作的必要性，使地区秩序构建朝积极方向转化。具体而言：

第一，推动领土争端各方树立合作共赢的大局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领土争端涉及国家主权，很容易被无限放大而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全局，因此更需要争端双方站在合作共赢的高度来加以处置。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了合作共赢的时代观，合作共赢的完整表述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①。不管国际与地区形势如何变化，合作共赢仍将持续体现世界各国的利益。发展是硬道理，同国家发展利益相比，领土与海洋争端在当今国家关系中只是一个次要的矛盾。尤其是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全球性的诸多严峻挑战，如恐怖主义、气候安全与能源转型、人口增长与粮食危机、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等问题。这些重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关系着全人类的命运与前途。这些共同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难题将各国的利益和命运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各国携手合作应对就显得极其紧迫。在人类共同的命运面前，边界与海洋争端就显得相对次要了，不应成为各国合作共赢的障碍。

第二，在回归“搁置争议”的基础上，促进地区合作，走向地区共赢。二战结束后，世界上领土与边界争端的解决，首要途径都是在包容互信的前提下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如中国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成功地同12个邻国划定了陆地边界就是典型范例。在中国与邻国尚未解决的边界与海洋争端中，主

^①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全文）”，2013年3月24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

要是采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促进争议各方展开合作，走向共赢。对此，东北亚各国应当本着如下三个原则来推动地区合作：（1）为了加速推动地区合作，东北亚各国首先要做到在正视地区矛盾的基础上，本着平等、和平协商的立场解决矛盾。步入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地区历史性地摆脱了对抗性的地区环境，进入了一个地区各国能够平等、和平对话的时代，这也为今后各国逐步解决地区矛盾提供了历史机遇。（2）当下解决不了的领土争议，要明确将合作摆在优先位置，在承认存在争议的基础上搁置领土争议，缓和矛盾，以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优先。（3）东北亚各国应当本着域内自理的原则处理地区事务，即东北亚事务由东北亚国家自己解决。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外部力量的介入是导致东北亚地区长期存在外部结盟与域内对抗的关键因素。因此，应排除域外国家尤其是域外大国，利用东北亚地区内部矛盾操控地区局势、阻碍地区合作与发展的可能。

第三，分阶段布局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世界各国走向合作共赢的新思维，是推动国际合作的创新思路。东北亚秩序观念与现实的演进，预示了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然而从理念的生成再到理念的实现远远不是一蹴而就，而将是极其漫长曲折的过程，需要分阶段布局，并长期付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努力。在理念构建方面，应深入挖掘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内涵、哲学渊源与法理依据，还应汲取华夷秩序观的和平性、非强制性，“雅尔塔”秩序观中的“大国协调”理念，通过“东亚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域内各方最广泛的共识。在实践中，则应重视地区多边机制作为地区治理手段的作用，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朝着合作安全与普遍安全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层面。由于当前东北亚地区在安全与文化层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二元特征，因此，在当前阶段，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从经济合作着力，分阶段实现全方位合作的地区命运共同体：结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进程的经验与反思，先是逐步建立由地区部分国家参与的自贸区。在此基础上，适时推动地区内所有成员国参加的自贸区建设。

最后的目标就是促成安全与经济全方位合作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徐广森:感谢胡老师接受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杂志的访谈,感谢您就东北亚领土争端和地区秩序构建等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分析与思考。

【Abstract】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changed the Anti-Fascism Allies’ territorial disposal of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Northeast Asia, which has become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s the outcome of mutual exploi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or anti-Soviet, anti-China and anti-Communist aims after the war. It is called the “living fossil of the Cold War” and its essence is to establish a Cold War style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and keep the region in a state of Cold War for a long time. Three decades have pass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yet Northeast Asia has not gotten out of the shackles of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particular,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Japan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ich are the remaining issues caused b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have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stalling the progress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t present, concept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that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urgently needed in Northeast Asia, that is, to advoc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rtheast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order to surpass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move towards win-win cooperation.

【Key Words】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Territorial Disputes, Regional Order of Northeast Asia, the Northeast Asi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Аннотация】 «Сан-Францис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изменил порядок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союз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территорией Япо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ряду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споров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ли самым большим препятствием на пути к миру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Сан-Францис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 продукт взаимно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ША и Японии в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антикитайских и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целях после войны. Его называют «живым ископаемым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его су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порядк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го на «холодную войну»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удержании региона в состоян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Спустя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всё ещё не освободилась от оков системы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ремя от времени возникают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споры между Японией и соседними с ней странами,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ставшиеся проблемы, вызванные системой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это тормозит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мир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сроч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стро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е тенденции миров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то есть выступающее за созда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чтобы преодолеть систему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и перейти к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истема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спор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сообщество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制度与人：苏联解体过程的演进逻辑*

余伟民**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过程”包含三方面内容：戈尔巴乔夫的体制改革、苏联东欧集团“类帝国”统治体系的终结和联盟的解体。从制度分析着眼，导致苏联解体的基本问题是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盟国家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和内在张力。戈尔巴乔夫改革显化了这一矛盾，但未能掌控好改革进程，从而陷入双重体制危机。从行为分析着眼，各派政治力量的组合与博弈决定了苏联走向解体的具体路径。虽然苏联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但联盟的解体并非唯一的选择。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俄罗斯联邦的“主权独立”及其对苏联国家权力的攫取，发挥了特殊的杠杆作用，“八一九事件”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改革 苏联政治博弈 “八一九事件” 苏联解体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065(19)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兴起与衰亡，堪称 20 世纪人类社会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从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来，关于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始终是世界历史的基本主题。同时，从传统帝国和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

* 本文是笔者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结项成果（12 卷本《档案文献中的苏联最后岁月》）撰写的“研究报告”中的“导言”和“结语”，发表时文字有修改。作为本文论据的史料均出自 12 卷本档案文献集（未刊本）。

** 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国家的转型也一直是世界历史的另一主题。20 世纪的苏联历史涵盖了上述两大主题，它既是一个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替代性选择”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开创者，又是在“世界革命”目标下建构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联盟”的实践者。苏联的历史开始于 1917-1922 年的社会革命和制度创设，终结于 1985-1991 年的制度变迁和国家重构。其中，苏联历史的终结阶段一般被称作“苏联解体”。至今，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 30 年，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研究也已经具备了摆脱“历史在场者”视野局限的认识条件，能够从历史的沉淀中集聚起反映历史运动本质性因素的史料，并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整理和解读，更为清晰地重现这段苏联最后岁月的历史面相。

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包含着“制度变迁”“帝国终结”和“联盟解体”三重含义，它们共同构成了广义的“苏联解体”。具体而言，“制度变迁”过程显示了列宁时期开创、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制度”，即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派生的计划经济体制，如何深陷危机、而后在激进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被否定，并由此动摇了联盟国家体制的基础。“帝国终结”过程显示了二战后建构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在东欧和亚洲的势力范围及控制区域）和“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苏联行使“类帝国”体系^①权力的主要机制）如何在苏联霸权的衰落和战略思维的转变中，由外而内地逐步收缩并最终消亡；与此同时，苏联主动结束与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冷战，从根本上消解了两个体系对抗的国际战略格局。“联盟解体”则是上述两个历史进程交汇的最后结果，也就是表现在国家体制意义上的狭义的“苏联解体”，主要显示了 1922 年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特殊的联邦制国家（实际上的“类帝国”体系的基础结构——

① 苏联的国家体制和统治体系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具有前现代（继承自沙俄的周边扩张型殖民帝国传统）、现代（联邦制国家形式和雅尔塔体系赋予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及“后现代”（世界革命理念的超国家多民族共同体）的多重属性和特质。因此很难将其归入一般意义的“民族国家”或“帝国”范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因其武力干预东欧国家改革、鼓吹“有限主权论”的行为曾被称作“社会帝国主义”。本文使用“类帝国”概念旨在说明，苏联的统治体系是一个包含“外围”（东欧、蒙古等势力范围控制区）、“边区”（波罗的海、高加索和中亚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加盟共和国）、“核心”（俄罗斯为中心的斯拉夫三国）等多层次治理系统的复杂的政治共同体，其统治形态类似于历史上因统治地域广阔、统治对象多元而实施多层次治理的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如何在 1985 年开始的“制度变迁”和“帝国终结”的过程中，因其基础结构的动摇和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作为联盟主体的斯拉夫三国）独立主权地位的获得而被架空中央权力，继而这些加盟国在俄罗斯联邦的主导下又如何抛弃和分解了已经成为空壳的联盟体制架构。总体上看，广义的“苏联解体”显示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内部逻辑和外部逻辑，这是两条并行、交汇的历史线索。从 1985 年 3 月到 1991 年 8 月，“制度变迁”和“帝国终结”的进程发展到了一个共同推动历史性质变的时间节点。这时，1991 年 8 月 19-21 日发生的“八一九事件”突然加速了已经启动的国家重构进程，并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将其定格为无可逆转的最终的“联盟解体”。

如果说，“制度变迁”和“帝国终结”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统治集团在应对日趋严重的制度危机时主动选择的“反危机”战略路线，其目标是通过体制改革和战略收缩使苏联走出危机困局，那么，“联盟解体”则是在改革过程中因释放了旧制度的张力而不得不应对的国家体制危机及其结果。这并非改革的目标，却是为追求改革目标而被迫支付的“计划外”的代价，而正是这一涉及民族主义和大国地位的沉重代价中止了体制改革的进展，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体制改革的正面效应，使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等国至今蹒跚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中途。

通观苏联解体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博弈的双重效应下，这一过程呈现出历史“合力”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趋势。正是在不同趋势的转换中，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及其演进逻辑得以展示。当我们厘清历史过程的线索，把握其演进的逻辑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成为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其成因和经验教训的切入点。

二

在讨论涉及苏联解体过程及其原因的基本问题时，“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是两个主要的研究视角。

从制度分析着眼，基本问题首先是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

经济体制”与苏联“国家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内在的张力。^①戈尔巴乔夫改革起因于苏联模式的发展性危机，即比较优势的丧失和发展的停滞。当不触动体制本质的改良性措施和试图在经济竞争中扭转局面的“加速战略”不能解决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另辟蹊径，启动了针对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实质性改革，试图重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以释放经济改革的动力，但却由此触发了他们意料之外的“国家体制”危机。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联盟架构，戈尔巴乔夫在联盟体制改革问题上一再向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让步，直至接受主权国家的邦联体制。与此同时，为适应联盟体制改革的需要，他更激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惜修改苏联宪法，放弃苏共独享的领导地位，从“权力归苏维埃”到改行总统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然而，中央权力的弱化和让渡并没有达到维持联盟国家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权势欲和这些国家民众的分离主义情绪，最终由他们合力葬送了联盟。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反映了苏联模式体制变革的一个两难性问题：经济改革需要放松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但垄断性权力松弛后，联盟体制却失去了强力维系的纽带。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联性，作为普遍性问题，已经在苏联模式改革进程中被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证实；那么，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的联动性在苏联模式改革进程中也具有类似国家体制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所证实（两者的区别是“和平分家”与“流血内战”）。**这就提出了另一个基本问题——苏联模式的制度变革对于其原型发生地来说，必须同时解决两个维度的体制重构：**其一，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体制”（俄国革命原创的“苏维埃民主”或西方式的“宪政民主”）的转型；其二，从中央集权的联盟体制（形式上

①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与国家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苏共垄断性权力的垂直控制体系与联盟成员平行宪法权利的张力，通过前者的实际运行使后者转化为单一制国家的地方层级政府，但由此也使两者成为紧密联动的机制，一旦中央控制体系弱化，联盟成员的权利意识就会显化乃至诉诸宪法允许的“退盟”程序。关于这种结构性矛盾的起源，参见余伟民：“‘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国家体制的建构”，《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

的联邦制、实质上的单一制)向主权民族国家自愿联合的联邦制国家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国家体制的重构和原苏联版图内的民族国家获得主权地位,似乎符合制度变迁和现代国家发展的大趋势。但是,苏联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帝国”体系,包含着多层次的体制因素,其转型的路径也因此具有多种可能性。其中,如何协调“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联盟体制”重构、能否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是考验改革领导者思想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关键。如果路径选择恰当,政策举措周全,改革的推进稳妥有序,那么,苏联国家体制的重构未必以联盟的分裂和解体为必要代价,在维持“苏联”国家形态的同时,完成向现代联邦制的过渡也是有可能的(不排除波罗的海三国一类原先被强制入盟的加盟国退出联邦),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追求的初始目标。因此,所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是双重的:它既没有完成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也没有完成国家体制的重构。这场从反危机开始的改革由于目标与手段的悖论,导致运行节奏紊乱,最终陷入了更深重的双重体制危机。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什么无法实现其预定的目标呢?换言之,这场改革的启动既然符合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也顺应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潮流,为什么没有能够像中国和多数东欧国家那样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改革路径呢?对此,可以从制度变迁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略作分析。

就内因而言,苏联模式体制在其发源地的深厚基础及其僵化程度,使其改革的难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科尔奈曾经对作为“经典体制”的苏联模式的生命力做过分析。他认为,虽然面临制度性危机,但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体制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体制的内部结构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可以发挥“维持生存的基本功能”,只要它能够“为公众提供生活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维持着协调社会活动以及人与人共同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秩序”,其“法律和道德体系”还得到部分社会成员的支持,从而使“体制内各个构成要素也都能够相互支撑,融为一体”,那么“它不仅能够在现有水平上复制自身,而且还可以不断扩张、成长和发展”,“尽管整个体制充满了矛盾和内部冲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威胁到它的生存”,“一旦公众的不满不断增加,当权者就采取镇压手段来维护体制的生存”。因此科尔奈指出,即使在不改革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压制住不满,经典体制就

可以生存下去”。^①这种体制结构的特性及其维持生存的能力显然也是改革的难点。由于苏联体制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经济运行呈现“内卷化”的闭环，缺乏中国那样从体制外围先行“增量改革”的突破口，其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与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正面遭遇，并直接触犯控制计划经济的官僚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占据计划经济资源分配优势地位的国防军工利益集团），因而在强大的抵制力量面前难以有所突破。当“完善”型的体制改良无法走出危机的困境时，为了打破阻碍机制，从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出路就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但是，这种路径选择对于戈尔巴乔夫代表的统治集团来说，是一场理念先行的重大冒险，因为它动摇了苏联模式体制的“控制中枢”，在没有准备好稳妥的过渡性体制安排情况下的“突然一跃”，造成了国家控制机制的紊乱和联盟体制的瓦解。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巴乔夫及其执政团队是缺乏政治经验和不谙政治艺术的“新官僚”，而非高瞻远瞩、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们是旧体制官僚科层迭代的产物，只不过不同于那些顽固寄生于旧体制的官僚。戈尔巴乔夫等“二十大一代”已经形成了批判旧体制的“新思维”，并有志于改变旧体制，但囿于自身的知识缺陷和政治水平，他们未能掌握适应苏联国情、在复杂局面下把控改革节奏、将改革引向成功的大国治理“技艺”，最终功亏一篑，成为体制改革和政治博弈的失败者（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自我评价^②）。

就外因而言，苏联的体制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角色和国际地位而无法获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外部支持条件。美国等西方国家将苏联视为冷战的直接对手，他们对东欧国家制度变革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苏冷战战略的需要。其目标是：通过诱导东欧脱离苏联势力范围和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提升中国的相对实力以削弱苏联的战略地位，促成苏联集团的崩溃，消解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威胁。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因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而受到他们的欢

① [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59-360页。

② 2016年12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报》撰文回顾苏联解体的“真相与教训”，承认“我们未能实现（改革和更新苏联）这一目标”。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ев. 25 лет спустя: правда и урок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90(7158). 21 декабря 2016 г.

迎；但同时，苏联的经济危机、国力衰落和联盟解体也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实际上是乐见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地缘政治大变局的，他们唯一担心的是苏联因解体而导致南斯拉夫式的内战和混乱。所以，戈尔巴乔夫改革遭遇的挫折和联盟的解体，只要控制在“和平过渡”的框架内，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无意给予他迫切需要的实质性援助（特别是为缓解财政危机所急需的货币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价值，并不是一个体制更新后变得更强大的苏联，而恰恰是改革导致“类帝国”体系的崩溃和制度转型。就此而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际结果正是西方国家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出手“拯救”这位最后的苏联总统，而是将更多的支持留给了后苏联格局的主持者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以及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三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内外交困、进退维谷的背景下，其他选择性力量（以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为代表）取而代之，主导了最后阶段的政治博弈进程。

从行为分析着眼，参与这场决定苏联历史命运之政治博弈的，主要有三股势力和若干关键人物，这些政治势力和关键人物的分化组合贯穿于苏联解体的全过程。

由于苏共曾经是苏联模式“政治经济体制”和“联盟体制”共同的核心力量，是垄断性权力的代表，因此，政治势力的分化也就是苏共领导集团的分裂。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的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官僚体制新陈代谢进程中接班上位的“新人”，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承袭着旧体制的意识形态传统，是对旧体制进行改良的同路人（利加乔夫是他们的代表）；另一部分是对旧体制持比较深刻的批判立场，并具有某种新思维的“理论家”和政策设计“专家”（雅科夫列夫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是旧体制的离经叛道者，但大部分还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正是这些人与戈尔巴乔夫存在思想上的共鸣，并为他后来决

定从根本上更新体制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政策方案。至于叶利钦，属于第三种类型。作为从基层上来的实务型干部，叶利钦缺乏理论修养，也因此较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基层和地方政府的历练，则使他善于在旧体制中发现问题并寻找机会。所以，就政治取向而言，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更具有机会主义的特质，而更少意识形态的羁绊。但在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机会的掌控上，他比戈尔巴乔夫更具有政治博弈的才干和敢于出击的勇气，而较少瞻前顾后的犹豫和道德原则的约束。如此性格和行事风格的叶利钦在进入戈尔巴乔夫班子后，既可以发挥改革“突击手”的作用，也很容易成为分道扬镳的另类反对派，两人的分合将取决于利益的分配和对形势的把握。上述三种类型的苏共中央领导成员也就是后来进入政治博弈舞台的三股势力的核心人物。其中，利加乔夫代表的“保守派”与雅科夫列夫代表的“改革派”始终是苏共党内斗争的一对矛盾。戈尔巴乔夫基本站在“改革派”的立场，但在改革后期逐渐与趋向“激进改革”的雅科夫列夫等人拉开距离，并提拔了一批“新人”，形成了具有“中间”色彩的“温和改革派”和“维护联盟派”（这股势力的部分成员在维护联盟的立场上接近“保守派”，并与戈尔巴乔夫产生原则分歧）。同时，叶利钦代表的党内另类“激进派”脱离了苏共中央，与“公开性”条件下兴起的党外“民主派”合流，成为事实上与苏共对抗的“反对党”势力。当联盟体制危机爆发后，叶利钦代表的政治势力又同各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势力一起，形成与中央权力对抗的解构性力量，并在苏联解体的最后阶段扮演了主要角色。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性的政治博弈节点发挥了“转折性”的路径定向作用。

第一个具有定向意义的转折是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至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期间完成的，也就是从体制的改良向体制重构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决定将其继承的苏联模式体制作为全面改革的对象，摒弃了“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将自己从旧体制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由外交而内政、从政治到经济”的改革路线。通过“新思维外交”的推行、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倡导批判旧体制历史阴暗面的“公开性”运动，戈尔巴乔夫确立了“改革派”在

党内的主导地位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并通过平反历史冤案、恢复“历史正义”，为在内外政策上“彻底翻修”苏联模式获取了民意支持。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利用旧体制赋予总书记的权力以及党的组织、宣传机制，通过人事调整和舆论掌控，使“保守派”在政策方针的辩论和较量中处于下风，最后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可以说，正是在这一阶段真正开始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历史的发展路径由此脱离“斯大林模式”的旧轨道，发生了方向性的重大转变。

第二个导致苏联国家性质变化的重大转折发生在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前后。按照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确定的政改方案，1989年上半年，通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和人代会的召开，“党对国家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转变为民主选举基础上的“苏维埃体制”。戈尔巴乔夫以民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身份领导国家，“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兼职”。苏共的领导地位虽被弱化，但依然是唯一的执政党。恢复“苏维埃民主”，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理念的体现，也是他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因此这一举措具有主动选择的意义，而且是对依附于旧体制的“保守派”的打击和压制，使其进一步被边缘化。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改革却激励了新崛起的“反对势力”——苏维埃体制中的“民主派”和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分离派”。前者要求彻底终结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在苏联实行多党制民主；后者则要求在摆脱苏共控制后兑现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宪法权利”。面对这两股势力，戈尔巴乔夫改革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为了继续获得民意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得不做出违背初始目标的修正。从1989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到1990年3月的第三次非常人代会，戈尔巴乔夫向“民主派”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实行多党制，并在宪法体制上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由社会主义性质的“苏维埃体制”改为政治中立的“总统制”。随着戈尔巴乔夫以超党派的“总统”身份治国，其主动实施的理想主义改革也就此中止。此后，俄罗斯联邦和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宣言”的发布和分离主义势力的蜂起，构成了对中央权力的主要挑战。叶利钦代表的加盟共和国势力与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联盟中央的权力之争上升为政治博弈的主要矛盾。围绕着联盟体制的存废，昔日苏共党内的“改革派”

分化为“维护联盟派”（也被称为“帝国派”，主要由戈尔巴乔夫提拔的中央权力机构“新人”组成）和“重构联盟派”（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支持者）。前者成为新的“保守派”势力并在维护苏联国家体制上与旧“保守派”合流；后者则试图在联盟架构与共和国主权之间寻求折中妥协方案。如何对待重构联盟谈判的“新奥加廖沃进程”^①和作为谈判结果的“新联盟方案”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政治形势的这一变化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所不及的，改革进程由此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在且战且退的防御战中，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权力机构对政局和社会的掌控能力日益弱化，后续的发展路径选择权相当程度上已经落入叶利钦等反对派势力手中。

在中央权力面临“民主派”和“分离派”两股势力挑战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政府仍然拥有维护既有权力地位和苏联国家体制的“最后手段”，即在必要时对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并动用军队镇压反对势力以控制局面。这种措施在旧体制下“顺理成章”，且无须通过法律程序，只要最高领导人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即可（包括出兵东欧国家和阿富汗）。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为体现改革精神，曾对实施紧急状态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文件，以备不时之需。^②因此，如果需要，用实施紧急状态控制局面是可行而且合法的“总统权力”。1991年1月的立陶宛流血事件^③和3月28日的莫斯

① “新奥加廖沃进程”指1991年4月23日开始的苏联总统与9个加盟共和国（斯拉夫三国、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未参加）领导人关于起草和签订新联盟条约的谈判进程，因谈判地点在莫斯科新奥加廖沃庄园政府别墅而得名。经过多轮谈判，7月23日“新奥加廖沃进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新联盟（“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文本和签约程序。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秘密会晤，确定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

② 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紧急状态法》，当日经戈尔巴乔夫签署后生效。该法案规定，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的权力属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

③ 1991年1月6日，执意走向独立的立陶宛政府因得不到中央政府经济支持而大幅度提高物价，导致民众抗议和大规模示威活动，民族分离主义组织“萨尤基斯”运动和立陶宛共产党的支持者（“救国委员会”）发生冲突。为控制局势，戈尔巴乔夫授意强力部门进行干预，驻当地苏军部队和波罗的海军区部队于11日进入维尔纽斯，伞兵、装甲兵和克格勃特种部队占领了通讯和新闻广播等要害部门，并部署在议会大厦周围。此举是《紧急状态法》制定后应对加盟共和国局势的第一次实际运用，但没有明确宣布。12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吉斯宣称苏军的行动是战争行为，13日立陶宛官方宣布有13人在冲突中死亡，112人受伤。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戈尔巴乔夫要求苏军撤回兵营。事后他和强力部门领导人均否认下达过出兵命令，并把责任推给当地驻军。

科大规模游行集会事件^①，既是反对派势力对中央权力的重大挑战，也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权力机构通过实施《紧急状态法》控制局面的机会。然而，正是在处理这两件事关《紧急状态法》是否实施的决策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最终决定放弃使用“铁腕”手段，从而虚置了《紧急状态法》。此举实际上拆除了维护中央权力和联盟体制的“最后屏障”，由此使事态的后续发展路径直接通向加速联盟解体的快车道。

戈尔巴乔夫的这一选择既向反对派势力亮出了底牌，也使自己与中央政府（总理主持的内阁和克格勃、国防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的其他成员分道扬镳。作为中央权力机制的核心人物和既得利益者，大部分内阁成员和强力部门负责人不愿在联盟重构方案中失去权力和利益。为了维护与自己的地位息息相关的联盟体制，他们开始密谋将戈尔巴乔夫手中的总统权力转移到内阁和强力部门。6月17日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内阁主要成员对戈尔巴乔夫“发难”，提出将部分总统权力转归内阁。当此意图未遂后，他们试图动用强力部门，采取“最后通牒”的手段，用武力胁迫阻止戈尔巴乔夫实施重构联盟体制的计划。7月底，“新奥加廖沃进程”完成了新联盟条约谈判，并定于8月20日签署条约。以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为首的“维护联盟派”认为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刻。于是，他们从8月5日开始具体策划控制国家权力来挫败新联盟条约计划。这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可能重演苏联历史上那种党内宫廷政变式的“非程序性权力交接”模式，即利用非常党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会议来更换党的最高领导人并实施对国家领导权的变更，而只能通过宪法程序挟持总统实施“紧急状态”以令天下。如果总统不予配合，那么只能以某种理由剥夺总统权力，走上违宪的“政变”之路。这就是“八一九事件”的

^① 1991年3月28日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会前俄共党团与支持叶利钦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形成对立阵势。为防范冲突，3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要求莫斯科当局禁止3月28日举行群众性集会游行，25日苏联内阁也发布同样的禁令。次日，戈尔巴乔夫下令将莫斯科的警察机构归属苏联内务部管辖。27日，苏联国家安全会议就28日莫斯科的治安管理做了部署，数百辆军车开入莫斯科市中心布防。苏联当局的行动激起了俄联邦叶利钦势力的对抗。28日，俄联邦人代会开幕后即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撤销苏联内阁的决定和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将军队撤出莫斯科。当日下午，“民主俄罗斯”运动不顾禁令在莫斯科组织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与布防军警形成对峙。当晚，戈尔巴乔夫召集国家安全会议成员开会商讨对策，决定取消预定的紧急状态方案，军队于次日撤出莫斯科。

发生逻辑。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场政治博弈的结果实际取决于“政变”是否成功。已成为历史的“八一九事件”的进程提供了答案，但作为对“政变”失败原因的回溯性分析，仍然需要对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的行为进行考察，以把握“政变三日”事态发展的因果关系和各种变量的相互联系。

首先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分析。主要问题是，在“维护联盟派”采取行动时他为什么拒绝配合，从而迫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走上了“政变”之路？显然，克留奇科夫等人的“逼宫”违背了戈尔巴乔夫的意志，挑战了他的行为底线。如果他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法令，即意味着此前费尽心力达成的“新奥加廖沃协议”的流产，他将被迫充当用“铁腕”镇压反对势力的角色，而且不排除由此将国家推向内战的危险。宁可向民族分离主义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让步，也不使用暴力手段强行维护联盟体制，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廖沃进程”中确定的行为底线。这一行为底线又是同他作为外交“新思维”的倡导者、东欧自主转型的支持者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形象相统一的。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处事圆滑、优柔寡断、缺乏坚定意志和明确方向的政客，因此不敢承担实施“紧急状态”的责任。确实，在领导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经常表现出犹豫不决和妥协退让的行为特征，从而丧失了一些重要的决策机遇，使改革陷入困境。但是，摒弃“斯大林模式”的镇压机制，追求“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则是戈尔巴乔夫从执政伊始就始终坚持的核心理念，也是贯穿其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从这个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拒绝签署“紧急状态”法令是符合其内在行为特征的。至于在应对“逼宫”的策略上，他当然也权衡了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包括对“逼宫”者行为限度及事态发展前景的判断），并且得出了自己的“优选”结论。在确信自己及家人不会因拒绝合作而遭遇生命危险的前提下，他做出了宁可被软禁也不予合作的选择。事实上，此举不仅没有降低他的历史地位，反而提升了他的道义形象。由于他在关键时刻的这一选择，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维护联盟体制的“最后一搏”失去了总统背书的“合法性”，成为违宪的“政变”。这是决定“八一九事件”性质的第一个关键性变量。

其次是对叶利钦的行为分析。作为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叶利钦与“篡

夺”苏联总统权力的“政变”者并非直接的对立关系，但是在“紧急状态”实施后站出来公开对抗的却是叶利钦。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在面对政变行为时，叶利钦选择对抗的原因何在。如果说，夺取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权力，也是叶利钦追逐的目标，那么，他与政变者的关系是否具有合作的可能性？这是“八一九事件”研究中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之“谜”。据政变策划者克留奇科夫在事后举行的调查听证会上所说，在“八一九事件”过程中，他与叶利钦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和信息沟通渠道。而且，作为实施“紧急状态”的最初步骤，虽然部署了克格勃部队监控叶利钦居住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但并没有采取限制叶利钦行动自由的实际措施，更没有逮捕叶利钦，而是放任其离开别墅前往“白宫”，使之得以建立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反政变”司令部。^①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克留奇科夫对待叶利钦的举措似乎可以看出，必要时利用叶利钦“替代”戈尔巴乔夫也许是一个“备用方案”。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在于，当戈尔巴乔夫拒绝合作时，现有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中，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都是缺乏总统必备素质的临时过渡人物，军方和强力部门负责人出面则会使事态涂上“军事政变”的色彩，如果从苏共中央书记中选人又将被看作是旧体制复辟，因此，已经具备领袖声望的俄联邦总统叶利钦不失为一个后“紧急状态”下主持大局的人选。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这一方案需要叶利钦认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维护联盟体制的目标，也就是叶利钦愿意通过“紧急状态”将自己的俄联邦总统权力扩大到整个苏联范围，替代戈尔巴乔夫掌握“中央”权力，结束俄罗斯联邦与苏联的分立状态，同时也终止重构联盟的“新奥加廖沃进程”。目前尚无材料反映克留奇科夫与叶利钦是否在电话联系中就上述可能性进行过讨论或谈判，政变方案中拟议的亚佐夫与叶利钦的“机场谈判”也没有举行，但克留奇科夫等人持有这种意图则是可以设想的，否则很难解释他们在

^① 据事后俄联邦议会听证会提供的调查报告，希望与叶利钦合作是被纳入政变行动预案的。原准备由亚佐夫同8月18日从阿拉木图返回莫斯科的叶利钦在奇卡洛夫斯基军用机场会晤，劝说其合作，如拒绝则加以逮捕。但叶利钦的飞机并未降落在军用机场，因此这一方案没有实施。至于军方为什么没有迫降叶利钦的飞机，目前没有材料予以说明。叶利钦回到莫斯科后，对其别墅实施监控或将其逮捕是预设的第二方案。但负责监控叶利钦别墅的克格勃“阿尔法”小分队因没有接到正式命令而未实施逮捕方案，并在8月19日上午放任叶利钦前往俄联邦议会大厦“白宫”。

事件进程中始终没有对叶利钦采取强硬手段、并一直保持沟通渠道的理由。当然，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政变者所愿，叶利钦没有同政变者合作，而是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反对政变的立场，并采取针锋相对的举措与之对抗。叶利钦的选择就其个人的利益得失而言，被事实证明是合理的。他通过反政变行动使自己获得了维护宪法的“合法性”，并进一步提升了俄联邦的主权地位，在政变失败后他顺理成章地从戈尔巴乔夫手里接管了“中央”的权力，并通过解散联盟达到了俄联邦替代苏联成为国际法主体的目的。显然，叶利钦这样做，要比同克留奇科夫合作更为有利，而且无须承担“合谋政变”的恶名。决定叶利钦如此选择的主要因素，在于他对当时形势和民意以及国际舆论的分析判断，其中一个直接的因素是他对苏联军队动向的把握。当8月19日早晨他从执行“紧急状态”任务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口中获知军队将领的真实立场，并随后得到列别德部队的“保护”时，军队效忠的对象由“苏联”向“俄罗斯”转移的动向已经清楚了。这无疑是一颗“定心丸”。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选择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其后续行为也自然更为主动，而且步步得势。政变者一方在失去与叶利钦合作的可能性后也就失去了赖以扭转局面的政治交易机会，不得不陷于或者孤注一掷强硬镇压（势必发生流血冲突并面临军队倒戈风险），或者退缩认输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叶利钦的选择是决定“八一九事件”胜负的一个关键性变量。

第三是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为分析。“八一九事件”的发动者，是一批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随着旧体制的“保守派”退出而递补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官僚。其中有副总统和政府总理、军队和强力部门首脑、军工集团及农业管理部门的代表，还包括未出现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名单上但实际参与策划政变的苏共中央书记舍宁，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并参与政变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这批人大多在1990年3月苏联实行总统制以后被提拔。戈尔巴乔夫选择他们，是为了强化“总统班子”，以对冲叶利钦的挑战。作为中央权力的替代版，不再依靠苏共中央的戈尔巴乔夫总统仍然需要相对保守的、具有集中倾向的管理团队，以应对正在分解的国家体制。由此也就决定了这批“新官僚”的双重特质：他们对旧体制已经离心离德，不再忠诚；他们对中央权力十分重视，反对联盟体制的虚化。因此，他

们的“保守性”主要体现在维护联盟统一意义上的“中央权力体制”，而不是回归“斯大林模式”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体制”。戈尔巴乔夫与这批人的关系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要利用他们维持正在被加盟共和国侵蚀的中央权力；另一方面，他所奉行的向叶利钦妥协、试图通过“新奥加廖沃进程”重构联盟的方针，势必与他们发生理念和利益上的冲突。尤其是，当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的谈判即将告成，这批“新官僚”的利用价值也即将告终（1991年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的秘密会晤中已涉及这批人的解职安排，秘密谈话是否被克格勃窃听尚是疑案，即使未被窃听，这一趋势也是可以预料的，因为6月17日这批人对总统的发难已经表达了他们对新联盟方案将重组中央机构的疑虑和担心）的背景下，两者的矛盾就激化了。于是，作为阻止新联盟条约签署的“最后一搏”，“八一九”大戏由此上演。问题在于，事件的策划者已经不是旧体制下能够冷酷无情地实施“铁腕”手段以达到目的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作为“二十大一代”改革派的同路人，经历了苏联的历次改革，也知晓世界历史的大势，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念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因此谁都不愿意背负“武力镇压”的罪责。尽管他们作为军队和强力部门负责人能够动用武力，但谁也不敢下命令使用武力。在与叶利钦势力的三天较量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始终迟疑不决，行动缓慢，也没有真正控制军队，而是幻想着对手的退让以及与对手的政治交易。这就决定了所谓的“紧急状态”只是吓唬人的纸老虎，从而丧失了扭转局面的最后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政变者行为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而做出的选择也是合理的。可以说，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变量契合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行为变量，三方行为的“合力”共同塑造了“八一九事件”的定格画面，也决定了其后事态演进的路径以及最后的结局。

四

综观苏联解体的演进过程，通过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两个视角，可以揭示其本质性的深层因素。简而言之，广义的苏联解体（制度变迁和“帝国终

结”），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陷入发展性危机后进入变革时期和“类帝国”统治体系向民族国家联邦转型的大趋势。但是，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路径具有多种可能性，作为狭义的苏联解体（联盟体制的解构和重组），并非只有目前成为现实的一种样式。如果各种社会力量的行为组合形成另一种“合力”，那么具体的历史过程就会呈现出另一种路径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考察的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解体过程并不是必然出现的。构成这一过程的诸多历史因素的组合概率存在偶然性，其中包括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国家体制重构的良性互动、以及保持“苏联”国家形态条件下联盟更新的可能性。之所以苏联解体以1991年12月的形态记载于历史，是因为在时间、空间和主要行为体的实际运动组合中，其他的偶然性没有成为现实，于是其他可能的历史发展道路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狭义的苏联解体而言，叶利钦主导的俄罗斯联邦“主权独立”及其对苏联国家权力的攫取，发挥了特殊的杠杆作用。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国家实体的基本结构，两者本是融为一体的。苏联的中央权力机制等同于俄罗斯联邦的权力机制，因而在苏联时期俄罗斯联邦无须单设国家机构。相对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类似于帝国结构中的“宗主国”，因此，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其说是针对苏联，毋宁说是针对俄罗斯。作为超国家机构，苏联没有同构的民族实体，民族分离主义实际上是少数民族要从俄罗斯民族主导的国家共同体中分离出去。所以，当俄罗斯兴起“主权独立”运动，要同苏联国家结构“分立”，也就意味着它要抛弃苏联国家形态，以俄罗斯联邦形态攫取和行使苏联所代表的“中央权力”。此举无疑是对苏联国家体制的致命打击。没有了俄罗斯联邦这一实体支撑的苏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勉强维持联盟的外壳，也只能是一个中央权力被架空的主权国家的“邦联”。所以，当叶利钦在“八一九事件”后实际掌控苏联的中央权力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沦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傀儡。无论怎样掩饰这一国家体制的变局，俄罗斯联邦已经实际取代了苏联的国家功能，最后几个月的政治活动只是为这个变局提供法律依据并完成中央权力的移交程序而已。

当然，我们在考察苏联解体过程的演进逻辑时还需要纳入更多的社会层

面的变量因素，诸如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等，这些变量都需要在制度分析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分析中加以考察。例如，苏联末期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分裂显然是加速旧体制崩溃和改革中止的重要因素。但是就政权的维持或更迭而言，经济危机和社会分裂既可能是负面的推力，也可能是正面的助力，其实际发挥的功能往往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组织的理念和能力（控制力和行动力）。在苏联解体的最后阶段，这方面的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八一九事件”发动者的失败和叶利钦的胜利，正是体现了这种政治博弈的逻辑，而叶利钦一派（及各加盟共和国领导集团）政治势力的胜出，也就意味着苏联解体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结局。这并非社会力量普遍意志的选择（这一选择恰恰违背了1991年3月全民公投的意志），但确实是那些谋求国家权力的政治集团及其领导人的选择。他们利用了社会力量对旧体制及其权力机制的不满和抗议，也利用了改革派势力的弱点和错误，最终借助“八一九事件”创造的机会和条件，实现了自己的权力欲望——从名不见经传的加盟共和国层级的地方领导干部变身为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导人。

苏联解体作为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地缘政治后果似乎代价沉重，也对人们评价当时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认识上的困难。其实，只要摒弃那种传统的“王朝兴替”史观，我们从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表象中看到是僵化的苏联模式被历史潮流淘汰的客观趋势，也看到了俄罗斯等原苏联地域的各国人民在历经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后对发展道路做出的新选择。即使在地缘政治层面，作为苏联后继者的俄罗斯固然降低了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但对于中国等原苏联的邻国来说，则因此改善了周边环境，消解了来自那个“超级大国”的压力，提升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进程中的历史教训具有重要镜鉴意义。它提醒我们，即使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改革，也需要改革事业领导核心的团结、推进改革的坚定政治意志和控制改革进程的高超政治艺术。其中，把握历史趋势的正确方向，顺应社会主流的民心所向，凝聚各界共识的改革“路线图”，以及循序渐进的适时步骤和平衡各方利益的恰当政策，是取得改革成功的基本要素。

【Abstract】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cludes three aspects, namely, Gorbachev’s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end of the “quasi-empire” ruling system of the Soviet Union for the Eastern European bloc,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lliance. According to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e basic problem that led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and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the alliance state system and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established during the Stalin era. Gorbachev’s reform manifested this contradiction, but he failed to control the reform process, and thus the Soviet Union fell into a dual system crisis. According to behavior analysis, the combination and game of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determined the specific path to the Soviet Union’s disintegration. Although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re trends that conform to the histor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lliance is not the only option. Dur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overeign independen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its seizure of state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 played a special leverage role, and the “August 19th Incident” accelerated this process.

【Key Words】 Gorbachev’s Reform, the Soviet Political Game, the “August 19th Inciden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оцесс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три аспект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реформу Горбачёва, конец «квазиимпер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правления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бло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распад союз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основ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приведшей к распаду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было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и внутреннее напряжение между высоко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сложившейся в сталинские времена, и системой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формы Горбачёва проявили эт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но процесс реформ не был хорошо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чался двухсистемный кризис.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веден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и игры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л определили конкретный путь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Хот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являютс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истории тенденциями развития, однако распад союз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вариантом. При распад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собую рычаговую роль сыграла «суверенна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захват е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а «Августовский путч» ускорил да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еформы Горбачёва, совет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гры, «Августовский путч»,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国别与区域研究

欧洲对抗与亚洲突围 ——全球转型中的欧亚新博弈*

冯绍雷**

【内容提要】“全球转型”是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界为探究当代世界变迁所提出的一个概念。21世纪初以来，全球转型经历了从“中心化”到“非中心化”的转折。在经历冷战后的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时期。在此时期，国际竞争将更加残酷无情。与欧洲呈现出胶着对抗的状态形成对比，亚洲的成长与发展有望成为长期趋势。亚洲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西方危机对于亚洲的扰动，而且可以积极有为地影响西方，为亚洲以及全球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看待当代危机局势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全球转型 欧洲对抗 欧亚博弈 亚洲发展 俄乌局势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084(8)

岁末年初，伴随着各大国际组织与智库关于世界经济预测结果的发布，伴随着有关欧洲战端重启的危险舆论之下美俄、北约、欧安组织峰会的落幕，也伴随着人们普遍期待的疫情转缓非但没有出现、反而突然又四处频频告急的状况，国际局势转入了一个更加扑朔迷离、充满着不确定前景的进程。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的中国定位与战略选择”（项目批准号：19JJD810001）的阶段性成果。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这样的格局下，从怎样的全球视角来把握国际发展的脉络？从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俄、欧的大国博弈呈现着一个怎样的新局面？亚洲地区是追随欧洲的脚步，也同样落入拉帮结派、纷争对抗的火坑，还是另辟蹊径，走向一条稳健克制、尽可能避免冲突、和平发展的共存之路？这是人们所必须找到答案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全球转型：理解当前国际格局走向的重要范畴

“全球转型”是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界为探究当代世界变迁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看似平常，但含有新意。其基本思想之一是，19世纪形成的全球转型，深刻、持续而全面地改变了国际关系。起初，以工业化、观念与制度重构为背景的全球转型，造成了一个高度不平等、中心与边缘分化的国际秩序。随着全球层面现代性的不断加强，中心与边缘的差距逐渐地且越来越快地缩小。变化的趋向，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有中心的全球化”逐步转向今天的“去中心或者多中心的全球化过程”。18世纪末到1945年“西方殖民式”的全球转型是其第一阶段。1945年到21世纪头十年“西方全球化”的全球转型是其第二阶段。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左右“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全球转型，则是其第三个阶段。提出这一理论的学者倾向于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从“中心化”转向“非中心化”的全球转型的转折点。

全球转型的基本思想之二，是指全球转型是一个涵盖了三个向度主要内容的宏大进程。其一，是指关键国家（主要是指世界大国，也包括若干起重要作用的地区国家）的国内转型；其二，是指同步发生的世界秩序的改革与演进；其三，是指在国内转型与世界秩序重构这两大过程之间的各国的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这三个组成部分互相影响，互相激荡，又互相紧密关联，使全球转型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过程。

全球转型的基本思想之三，是指若干长时段因素浮出水面，这些因素势将深刻作用于全球转型发展走向。其一，文明、地理、气候、人口等因素的回归。比如，文明因素的重现，不光成为新兴国家成长的强劲支柱，也显现

出当前东西方博弈并非仅仅是制度之争，其甚至涉及文明的兴衰。因此，既要自主自信，又要互学互鉴，避免文明冲突，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又比如地理因素，地缘政治的激化与抬升，重新参与了大国间的博弈。如何运筹帷幄，发挥地缘空间的优势；如何因势利导，加强周边合作团结的凝聚力，都成为战略运筹的重大内容。其二，冷战后的全球经济高速增长过去之后，一个相对低增长的长周期将会长期延续。这一背景之下的国际竞争，毫无疑问将变得残酷无情和十分严峻。其三，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之下，西方不亮东方亮，亚洲的成长与发展有望成为长期趋势。想当年，西方列强是通过在东方的扩张与掠夺，以此作为在西方博弈的资源与基础；但是今天，不断强劲发展的东方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不光需要避免西方危机对于东方的扰动，而且如何积极有为地影响西方，为东方以及全球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看待当代危机局势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峰会落幕：欧洲僵持对抗势将延续

刚刚结束的俄美峰会、俄-北约峰会、欧安组织峰会，不出人们所预料，在没有任何重大突破与进展的情况下落幕。

俄方立场表达得很清晰：其一，以法律文本保障北约不东扩及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其二，不在其邻国部署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的进攻性武器，不进行携带核武器及其他进攻性武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其三，恢复 1997 年欧洲安全架构的原则性计划——当时俄与北约签署了《俄联邦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后来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这是普京总统所坚持的立场。这是三个关键的要求。其余的建议取决于这三项要求被处理的情况而定。与此相对应，美方的立场也相当强硬：不允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放弃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力度；不会接受北约不东扩；不会表态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虽然美方表示可以讨论有关中程导弹协议、在俄罗斯邻国举行军事演习的规模等问题，但在关键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决然对立的立场表明：它们之间的紧张抗衡状态将会继续延展。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在当前局面下的一系列新表现：首先，俄罗斯从事关国际关系发展的原则底线提出要求、开启谈判，而非在枝节问题上与对手周旋。显然，俄罗斯也非常明白，美国不可能从北约东扩的立场后退，因此，目前的事态表明，俄罗斯已经准备经历一个长时间讨价还价、从底线发起绝地反击的艰难过程。其次，俄罗斯是以积极主动备战的态度来推动与西方之间的对话。无论俄罗斯是以国内军事部署和部队调动的方式进行威慑，还是真的发起军事行动，都是为了迫使美西方坐到谈判桌前。诚如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所言，就是要让美国明白，俄罗斯对此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再次，俄罗斯也通过哈萨克斯坦爆发危机期间迅速派遣集安维和部队进入的果断行动，显示俄罗斯有选择地维护原苏联空间的强硬立场和决心。^①

相形之下，美国虽依然坚持其一贯立场，通过加强军事联盟与进行意识形态动员，来与俄罗斯对抗。但是，其一，拜登早早表示美国不会派军队与乌克兰一起作战；其二，谈判过程中美方还是表达出在中程导弹等问题上可以有协商余地的态度。与俄罗斯毫不退让的强硬立场相比，这表明，美国尽管态度强硬，在主要方面不可能有任何松动，而且的确有可能继续加大制裁压力——甚至如同美国国会议员所提出的对普京本人进行制裁，然而美方也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在次要领域尚有妥协的可能，以备给过于紧张的形势降温。至于欧盟的立场，更是耐人寻味。年初美俄之间三场会谈所释放的一个重要信息，便是双方已经抛开欧洲直接进行面对面对话。而欧洲主导的新老明斯克协议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这一形势，表明欧盟自身迄今为止已没有能力直面危机，也无法摆脱欧洲左右摇摆的传统立场。因此，在美国和欧洲难以卸除传统意识形态包袱、难以扭转国内严重分裂、也难以不把树立外敌作为凝聚国内政治的杠杆手段的背景之下，俄与美欧抗衡难有出路。

俄罗斯与西方的对峙将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还取决于存在着若干关键的结构背景。

其一，欧洲面临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套环式的国际结构。首先是整个欧洲面临的总体安全架构问题。冷战后一系列协议并没有能够真正保障欧洲安

^① [俄]季莫费·博尔达切夫：“最后的帝国及其邻居——俄罗斯周边安全与地区秩序”，《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第106-120页。

全。而所建立的机构，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虽然有最广泛的美、俄、欧等各方参加，但是面对着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些协议与机制形同虚设。俄罗斯人非常清楚，只有欧洲总体格局有了安排，才有俄罗斯的安全可言。其次，乌克兰问题的出路。明斯克协议之无法落实，就如同欧盟所主导的科索沃危机同样无法解决，表明了欧洲无力担当重任。所以，俄罗斯才干脆直接与美国对话。至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美国虽然表示无意派军队到乌克兰前线直接参战，但是美国通过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乌克兰政府，表明美国决意要让乌克兰前线始终保持一定的冲突状态，以利于美方在原苏联空间的介入，来调处对欧、对俄关系。这三个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环环相连。其中的一个解决不了，其余的问题也难以找到出路。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长期才能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一个“后事实、无真相”的世界，俄罗斯任何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都会被西方夸大渲染，从而为其打压对手、动员盟友、转移国内问题的视线寻找借口。与此相关，一个与当下的纷争有着密切关系的北约东扩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依然成为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发酵剂，受到全世界舆论的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信誓旦旦地辩解：美国从未承诺北约不进行东扩。但是，就在近期，美国国内媒体连续登载了 2017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所公布的档案：不光是前国务卿贝克说过，美国“一英寸也不东扩”，而且说了三遍；甚至，包括美国与欧洲诸多国家元首与高官在内的一大批人都明明白白地承诺北约不再东扩。只不过是当年虚弱而无能的苏联领导人无法使这些承诺成为一纸文书，从而酿成今天的祸患。这样一种“后事实、无真相”的局面，将会极大地干扰与影响国际政治交往的正常化，成为制造敌意、引发冲突的长期诱因。

三、西线抗衡下的东线突围

在欧洲方向俄罗斯与西方的长期抗衡已成定势的格局下，人们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亚洲。亚洲能不能为当今局势稳定与发展有所贡献呢？

20 世纪末，法国经济学家吉普鲁曾经提出“亚洲地中海”的概念。他

认为，西太平洋地区——指的是从日本海至马六甲的广大沿海国家与地区，可以像欧洲地中海一样，通过长期经济繁荣发展推动各国合作，而且可以在政治、社会、文明构建等各个领域为人类做出贡献。

面临美国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奥库斯、印太四国、五眼联盟、包括北约非常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作为主要威胁等等的战略新动向）的巨大压力，中国不怕对抗，决心以实力捍卫尊严与自身的利益。但同时，必须发挥地缘经济的巨大优势，以合作抵御对抗，以共赢争得民心。在此背景下，借助“亚洲地中海”的构想，可以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一轮新的合作高潮，作为迎战强敌的基本战略铺垫。

推动“亚洲地中海”这一构想的客观背景在于：第一，当今世界格局除了中美紧张对峙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包括俄罗斯、韩国（朝鲜）、东盟等方面。如果运筹得当，也许还能推动日本、澳新的正面反应；从长远看，把欧洲对亚太事务的介入，转化成经济合作；而且，有理由在全方位的长远经济合作的背景下，最终把美国对华的挑战与遏制转化成互利共赢。“化敌为友”是当前对美应对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化敌为友”的最重要和最可能的抓手，就是类似于“亚洲地中海”的战略选择。

第二，今后国际大循环的内容构成，显然将会从以往 30 年欧美市场为绝对主导，逐渐地演变成为在继续以欧美市场为重点发展目标的同时，在大陆欧亚地区寻找战略支点，配合欧美方向的运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初衷，就是希望在欧亚大陆西向运筹，从而找到战略突破口。多年来，“带路”推进在许多方面都有斩获，而与俄罗斯的对接，也在不断磨合之中。在这样背景下，从一个更为广谱的合作路径，去寻找中俄——并通过中俄进一步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发展——的合作路径。换言之，“亚洲地中海”概念的提出，是当下我们重新估量对俄合作战略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抓手。

第三，新时期俄罗斯的东向政策，更多的是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以多边方式介入合作进程。俄已与日本在远东建立投资合作关系。普京也明确承诺了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投资税收优惠。韩国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能源、交通管道、农业等方面，都有长期对俄合作的经验积累。俄与东盟的合作也在推进。因此，“亚洲地中海”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俄罗斯所期待

的多边方式的合作。

第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最新进展，将是推进“亚洲地中海”构想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不仅可以尽可能地避免俄罗斯发展与亚太进程的脱节，同时，RCEP与“亚洲地中海”构想并行推进，也将使得这两者之间能够找到更多合作机遇。比如，远东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甚至一些沿海港口已经开始坍塌。俄罗斯专家开始构想重新设计航线，采用多种联运方式。比如，日本与越南已经对使用扎鲁比诺港运输农产品表现出兴趣。日韩正在考虑实施远东港口与铁路的联运，马士基公司也表达了有兴趣参与。此外，从太平洋上的东方港至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集装箱列车，装载着来自中、韩、日的货物，开往土耳其和其他地中海东部国家。俄罗斯运输部已经提出了在“滨海-2”号项目框架内建立无人运输走廊的构想。为此，该部门正在设计一条30公里的新公路，供机器人卡车使用。这条新公路将把中国港口与俄罗斯海上码头（目前尚无，可以通过中俄合作建造）相连接，以提供高速自动化的物流货物处理。俄方得知，上海、青岛已经开发出相关技术。俄方非常期待中国东部与南部港口（希望至少有10个）能够积极参与远东的港口海运合作。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作为国际海运中心的上海，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Abstract】 “Global transformation” is a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to explor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hang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as experienced a twist from “centralization” to “decentralization”. After high-speed growth after the Cold War, the global econom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elatively low-speed growth.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as more ruthless. In contrast to the continuing confrontation in Europ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sia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long-term trend. Asia needs to avoid the disturbance of the West’s crisis through its own efforts. Furthermore, Asia could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West, creating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Asia and the world. This is an important issue when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Global Transformation, Confrontation in Europe, Europe-Asia Game, Asian Development, Russia-Ukraine Escal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Глоб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 это концепция, выдвинут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м сообществом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С начала 21 века глоб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ережила переход от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к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После периода быстрого роста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ступила в период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медленного роста,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тенден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была более безжалостной,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патов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в Европе, ожидается, что рост и развитие Азии станет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тенденцией. Азия долж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усилия, чтобы избежать влияния кризиса Запада в Азии, и може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повлиять на Запад и создать благоприятн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среду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Азии и мира. Это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ризисных ситуаци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Глоб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игра Европы и Азии, развитие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责任编辑 崔 珩)

中断还是反复——“颜色革命”中的路径依赖*

曾向红 尉锦菠**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为代表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抗议、游行示威、骚乱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社会运动不仅影响着各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也深刻牵动着世界政治形势的演变。社会运动对于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何一国会反复发生社会运动并导致政权更迭。本文尝试运用路径依赖机制及相关观点，通过比较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应对“颜色革命”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初步得出一国因社会运动反复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本文认为，不同国家应对“颜色革命”的不同策略，将形成存在明显差异的社会运动动员类型，这种差异经由路径依赖机制而得到固化，最终在特定国家形成导致“颜色革命”或中断或反复的不同互动模式。

【关键词】“颜色革命” 路径依赖 社会运动 欧亚国家 政权更迭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092(32)

21世纪以来，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骚乱等具有抗争政治特征的社会运动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来自社会运动的挑战。不过，社会运动对于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存在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颜色革命’的发生、扩散与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BGJ051）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211zujbkjyd002）的资助。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显差异。在社会运动带来的众多后果之中，影响最大，同时也最受研究者重视的，是社会运动所导致的政权更迭。如果某国因社会运动多次出现非正常的政权更迭，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的研究就具有重要价值。而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究国家反复出现因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本文选取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在 2005 年、2010 年、2020 年三次出现大规模抗议并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作为主要案例进行研究。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尝试选择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机制切入，并引入乌兹别克斯坦作为比较案例，探索一国为何反复因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

本文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颜色革命”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所发生的三次非正常政权更迭；第二部分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评述及对案例选择的解释；第三部分是运用路径依赖机制，尝试提出分析政权与社会运动互动的框架；第四部分是分析吉、乌两国应对社会运动时采取不同策略的原因；第五部分是不同应对策略所形成的“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如何得以固化；最后是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背景：“颜色革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三次政权更迭

“颜色革命”是指 21 世纪初发生在欧亚地区的以颜色或花朵命名、以“街头政治”的方式导致政权变更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后来随着中东变局（西方称作“阿拉伯之春”）等运动的爆发，“颜色革命”的内涵发生了扩展，泛指西方国家通过操纵某国内部抗议势力，结合非军事手段，建立符合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亲西方政权的行为。^①

从 2003 年开始，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出现了以“街头政治”为代表的非正常政权更迭。2003 年 11 月，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发动一系列示威活动，促使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成功夺取政权。由于萨卡什维利在抗议示威活动中总是拿着一枝玫瑰花抛头露面，

^① Ieva Bērziņa, “Weaponization of ‘Colour Revol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2019, Vol.18, No.4, pp.330-343.

该运动也被西方人称为“玫瑰革命”。“玫瑰革命”成为掀起欧亚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各国反对派望风而动，伺机夺取政权。在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中，尤先科的支持者聚集在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进行示威，抗议亚努科维奇选举舞弊。迫于压力，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进行重新选举。尤先科以52%的优势胜选。由于尤先科在大选中使用橙色作为其标志，这些抗议示威活动也被西方国家称为“橙色革命”。

2005年2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议会选举。以巴基耶夫为首的反对派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指责时任总统阿卡耶夫所属的政党在选举过程中存在舞弊行为，并在吉南部地区动员大批抗议者游行示威。3月24日，抗议者在比什凯克市中心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总统下台。傍晚，抗议者攻占了总统府，阿卡耶夫流亡海外。由于部分示威者手持黄色手帕或郁金香花束，此次事件也被称为“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政权的崩溃标志着“颜色革命”在欧亚地区的发展达到高潮。受“郁金香革命”影响，2005年5月12日，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爆发骚乱，一群武装分子袭击了警察哨所和部队营房，并释放了500余名在押犯。^①同时，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安集延的中心广场，要求卡里莫夫下台。此次骚乱很快便被乌政府镇压下去，武装分子与部分抗议者被捕，其余抗议者或被驱散或外逃至吉尔吉斯斯坦。

5年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二次革命”。通过“郁金香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也由同样的方式被赶下总统宝座。2010年4月7日，因“祖国党”领导人被警方逮捕，反对派支持者在比什凯克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总统巴基耶夫辞职。数千名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4月15日，反对派成立的临时政府称巴基耶夫已经签署辞职声明。25日，巴基耶夫流亡白俄罗斯。2020年10月4日，反对派指责议会选举过程中存在贿选行为并于次日在比什凯克组织抗议示威。示威者攻占总统府和议会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①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安集延事件”的定性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该事件不在选举周期内爆发且手段具有暴力性，因此不属于“颜色革命”而是“恐怖主义”。但无论是俄美双方，还是国际社会，均倾向于从“颜色革命”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解读，认为“安集延事件”同样是抗议者通过体制外方式挑战政府权威，是“颜色革命”的延续。参见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48页。

时任总统热恩别科夫在 10 月 9 日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迫于压力，热恩别科夫于 15 日辞职。

本文选取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由如下：第一，所选择案例应满足出现两次及以上因为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的现象，否则不能被称为“反复”。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于 2005 年、2010 年、2020 年爆发“郁金香革命”“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①似乎通过抗议示威来推翻政权已经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固定”的权力交接模式。第二，该国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是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而非结果。因此，埃及与缅甸分别于 2013 年、2021 年因军事政变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可以被认为不属此列。委内瑞拉、泰国等国家虽然反复爆发社会运动，但没有因此而导致政权更迭，也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畴。

二、文献回顾与案例选择

（一）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对于一国反复因为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这一问题，学术界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成果。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当前学术界对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吉历次“革命”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历次“革命”爆发原因的探讨；二是将在吉发生的“革命”作为案例，纳入 21 世纪初波及欧亚大陆的“颜色革命”浪潮中进行研究，将“郁金香革命”^②与“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进行比较，

① 致使巴基耶夫和热恩别科夫政权垮台的两次事件至今没有形成广泛认可的称呼，例如，对 2010 年巴基耶夫政权垮台就存在“二次革命”“血色革命”“无色革命”三种命名方式，参见周明、李嘉伟：“21 世纪初两次国际抗议浪潮的关联与比较——兼论作为中介的吉尔吉斯斯坦‘革命’”，《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94 页。本文按照政权更迭次序将 2010 年与 2020 年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两次非正常政权更迭称为“二次革命”与“三次革命”。

② 2003-2006 年发生在欧亚地区包括“郁金香革命”在内的受到境外西方势力干预的非正常政权更迭，通常被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而发生在 2010 年的“二次革命”则因受到俄罗斯而非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背后的干预，通常不被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发生在 2020 年的“三次革命”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受到了境外势力的干预，通常也不被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

以探讨“颜色革命”爆发的一般性原因及其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三次革命的分析大致相同，认为其爆发“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1. 经济问题。德隆·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 和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 认为，高度的不平等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①自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其处于贫困线及以下的民众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始终在 30% 以上，南部人口密度较大而且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比北部更多。巨大的贫富悬殊加剧了底层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 (Relative Deprivation)，进而导致了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但该解释的缺陷在于：为什么不满无处不在，但抗议不是无时不有？单一的经济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何吉尔吉斯斯坦反复爆发“革命”。

2. 部族问题。事实上，吉尔吉斯斯坦自转型以来始终处在“部族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中。吉政权更迭体现出南北精英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权力交接的特征。在“郁金香革命”中，出身于北方部族的总统阿卡耶夫被来自南方部族的反对派推翻；而在“二次革命”过程中，出身于南方部族的总统巴基耶夫被来自北方的反对派推翻。但值得注意的是，部族因素无法有效解释发生于 2020 年的“三次革命”。王林兵和雷琳指出，热恩别科夫延续了“二次革命”后在政府人事任命中的“去部族化”的做法，在既没有谋求“家族专制”复辟，也没有鼓动“南北对立”的前提下，热恩别科夫政权却被推翻了。“在过去的政权更迭中，要么是‘北方反对南方’，要么是‘南方反对北方’，但为何此次变局却形成了‘南方反对南方’的格局？”^②

3. 腐败。在吉尔吉斯斯坦，无论是寻求商业机会还是政府机构中的领导职位，都需要金钱，并与有权势的人建立关系。^③在 2021 年透明国际发布

① 参见 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quoted from Steve Hess,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Regional Protest Waves: The Post-Communist Colour Revolutions and 2011 Arab Uprising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6, Vol.51, No.1, pp.1-29.

② 王林兵、雷琳：“从议会选举到政治变局——吉尔吉斯斯坦西式民主的危机”，《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68 页。

③ Jaimie Bleck, Igor Logvinenko, “Weak States and Uneven Pluralism: Lessons from Mali and Kyrgyzstan”, *Democratization*, 2018, Vol.25, No.5, pp.804-823.

的腐败感知指数中，吉尔吉斯斯坦在 180 个国家中排第 124 名。^①2004-2011 年间，吉腐败感知指数从未超过 2.3 分（满分为 10 分），2012-2021 年间，吉腐败感知指数从未超过 31 分（满分为 100 分）。^②国外势力与本国反对派揭露这些腐败行为直接成了“革命”的导火索。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三次“革命”过程中，反对派或者境外势力所控制的媒体均通过“揭露”现任领导人的腐败行为而煽动民众进行抗议示威。

4. 外部势力干预。杨心宇指出，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实施的政府更迭计划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③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积极向吉反对派提供资金、技术、方法援助，并通过其所掌握的媒体机构对现政权进行“丑化”，煽动社会舆论，进而实现政权更迭。

将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革命”作为案例纳入“颜色革命”浪潮进行研究的成果，在承认以上因素对于“革命”爆发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替代性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关注政府与反对派的互动。大卫·雷恩（David Lane）认为，“颜色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一个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派，以及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政策。^④而政府对反对派力量大小的估计与是否采取镇压措施，也极大地影响了“颜色革命”成功的概率。^⑤也有国内学者进而认为，“颜色革命”的成败“不是反对派或者政府一方的原因，而是受到两者之间互动的影响”。^⑥第二种解释是“颜色革命”的示范效应。既有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性在推动政治转型中发挥了强大的因果作用。^⑦“颜色

①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ugust 10, 2021,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ountries/kyrgyzstan>

②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August 10, 202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贪污感知指数>

③ 杨心宇：“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的若干问题”，《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45-56 页。

④ David Lane, “‘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09, Vol.25, No.2, pp.113-135.

⑤ Charles Sullivan, “Misruling the Ma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Cracking Down in Kyrgyzstan”,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9, Vol.47, No.4, pp.628-646.

⑥ 曾向红、连小倩：“从反对派与政府互动差异看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63-84 页。

⑦ Steve Hess,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Regional Protest Waves: The Post-Communist Colour Revolutions and 2011 Arab Uprisings”, pp.1-29.

革命”具有明显的扩散性。一旦一个国家的抗议活动获得成功，抗议策略就会通过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s）转移到区域内的相似国家，导致邻近国家也突然出现类似的抗议模式。^①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小国很少受到学界关注，以上研究成果的出现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但以上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上述大部分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结构化的特征，往往将政权更迭这种重大的结果归于宏观层面的原因，强调是特定的政治或者社会结构塑造出的特定结果，而忽视了类似的条件导致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上述因素在爆发或者没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其他欧亚国家或多或少也存在，但其他国家并没有反复爆发“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乌、吉两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实矛盾、潜在的政治风险类似，且两国分别在 2005 年遭遇了“安集延事件”与“郁金香革命”的冲击，但两国日后的政治发展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与西方学者的预测相反，“颜色革命”浪潮衰退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政治局势保持着稳定，并于 2016 年卡里莫夫总统去世后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大众动员数据库（Mass Mobilization Data）^②所采集的数据显示，2005 年“安集延事件”至今，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未爆发过大规模抗议示威。^③但抗议示威反复爆发作为吉尔吉斯斯坦跨越 15 年之久的动态变化过程，仅仅用结构性的

① 释启鹏、韩冬临：“当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权崩溃——‘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 年第 1 期，第 130-155 页。

② 大众动员数据库（Mass Mobilization Data）是由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教授大卫·克拉克与圣母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里根采集编制的抗争政治数据库。旨在了解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抗争事件（包括抗议者的诉求以及政府的回应方式）。该数据库涵盖超过 1 万起发生在 1990 年至今的 162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人以上规模的抗议事件。

③ 包括爆发“郁金香革命”的 2005 年在内，吉尔吉斯斯坦共发生 500 人以上规模的社会运动 46 起，其中暴力抗议 15 起，抗议诉求则“五花八门”：抗议警察执法不公或者暴力执法 2 起，抗议物价上涨 2 起，土地权纠纷抗议 1 起，劳资纠纷抗议 1 起，抗议官员腐败 5 起，抗议本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或者追求民主 41 起。乌兹别克斯坦包括 2005 年“安集延事件”在内共发生 500 人以上抗议示威 6 起，其中暴力抗议 2 起，和平抗议 4 起。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2 起，抗议物价上涨 1 起，抗议官员贪腐 1 起，抗议政治进程（本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或者追求民主转型）2 起。由此可见，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示威活动更加“常态化”，并且充斥着明显的“破坏性”。而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的次数极少而且很少附带有实现“民主化”等政治目的。

静态因素而忽视时间因素加以解释，常常会陷入“用常量解释变量”的谬误之中。因此，上述成果虽然指出了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革命”的诸多背景因素，但却难以对一国为何反复因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这一问题给出准确解释。



图1 吉、乌爆发500人以上规模社会运动频次对比(2005-2020年)(次数)

(二) 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将乌、吉两国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因在于，两国都位于中亚地区且长期处于一个主权国家的框架内。在独立初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且两国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故具有较高的可比性。^①而同样发生过“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并实现了政治稳定的格鲁吉亚，则在地缘位置、国家身份、道路选择等方面均与吉尔吉斯斯坦存在巨大差异，不太具有可比性。其次，本文旨在回答，为什么一国会反复因为社会运动而导致政权更迭，故重点在于解释“反复”这一长时段的行为，即在发生过“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吉尔吉斯斯坦反复爆发，

^① 曾向红：“比较区域研究视域下的中亚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第9-37页。

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类似的情形。同样，在历史上同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且同为中亚国家、但没有发生过“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的土库曼斯坦等国也不在比较的范围之内。在西方学者看来，乌兹别克斯坦长期限制市场经济发展并实行广泛的政治与宗教“压制”，这些在既有的理论解释中可以促成政权更迭甚至是内战爆发的因素，在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发生作用，^①因此乌兹别克斯坦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反常”案例。探析乌、吉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助于解释这一问题，即为什么两国都遭遇过“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的冲击，但乌兹别克斯坦后续实现了政治稳定，而吉尔吉斯斯坦却掉入反复爆发“革命”的泥淖？

与现有解释不同，本文认为，一国会反复由社会运动导致政权更迭的原因在于：在一国的抗议历史上，当政权采取妥协的方式应对抗议示威，将会扩大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而这种政治机会会进一步增强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这种影响经过“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的过程逐步得以固化，最终导致该国政权与社会运动之间形成了一种一旦民众对政治现状产生不满，就诉诸社会运动推翻政权的互动模式。

三、理解“反复”：路径依赖机制中的关键节点与正反馈

路径依赖机制最早出现于经济学领域。保罗·大卫（Paul A. David）和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分别以 QWERTY 作为字母排序的通用式键盘与 VHS 制式录像机取代 BETA 制式录像机作为案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反常现象——一项并没有显示出更高效率的科技发明，在初始阶段的比较优势会使该成果比其他效率可能更高的后期竞争产品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且随着收益递增强化获得重要的优势地位，最终占有整个市场。^②这种被理解为涉及“正向反馈”的自我强化过程，就是路径依赖。

^① 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Democratization*, 2012, Vol.19, No.1, pp.78-97.

^② 参见 Paul A.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Vol.75, No.2, pp.332-337; Brian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1989, Vol.99, No.394, pp.116-131.

将路径依赖这一机制引入政治学领域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者认为，行动者偏好、权力关系和资源配置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和外部给定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并得到强化。^①当既有结构产生了收益递增，并对嵌入其中的政治行为体产生正向反馈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或偏离既有路径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认为，一旦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开始步入某一条轨道，那么逆转这种轨道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与此同时，尽管其他的选择始终存在，但若干制度安排的确立阻碍了最初选择的轻易逆转。^②换言之，事态发展的时机和次序至关重要，早期事件产生的因果作用将明显强于后续事件。

路径依赖分别涉及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与正反馈两个阶段，其中关键节点构成路径依赖过程的起点。关键节点的概念界定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科利尔夫妇（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认为，关键节点是“一个显著变化的时期”，它通常会在不同的国家（或其他分析单元）中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它被假设为会产生独特的制度遗产。^③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则在有关中美洲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将关键节点定义为在两个或更多选项中选择某一特定选项时的选择点（Choice Point），而这个选择点是由先前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马洪尼强调了关键节点^④与路径依赖过程之间的关联，“一旦特定的选项在关键节点处被选择，即使还存在其他选择，但要回到起始点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⑤乔瓦尼·卡波恰（Giovanni

① 奥菲欧·菲奥雷托斯、图利亚·费勒提、亚当·谢因盖特：“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2期，第112-126页。

② Margaret Levi,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L.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9-41.

③ 参见 Ruth Berins Collier,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④ 需要指出的是，马洪尼并不认为所有的选择点都是关键节点，关键节点仅仅是指对未来能够产生重要结果的选择点。但如何衡量所谓“重要结果”的重要程度，马洪尼则没有做出相应的说明。参见 James Mahoney,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1, Vol.36, No.1, pp.111-141.

⑤ James Mahoney, “Path-Dependent Explanations of Regime Change: Central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111-141.

Capoccia)与丹尼尔·凯勒曼(Daniel Kelemen)在此基础上将关键节点定义为：“核心行为体对结果影响的可能性发生实质性提升的一个较短时间段”^①，强调“节点”是一个行为体面临广泛选择的短暂时期，节点相比于所触发的路径依赖过程，其时间要短。而“关键”指的是行为体在节点处做出的选择，可能会比节点前、后做出的选择更能对后续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的30年内经历了6位总统。其中，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执政15年，而在2005年阿卡耶夫政权垮台以后，陆续更换了5位总统，平均每位总统的执政时间为3年，远未达到宪法所规定的任期。而且，其中两位领导人是因为大规模游行示威而被迫下台。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0年来只经历了两任领导人的轮替，且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简要回顾吉、乌两国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历程，可以发现，2005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在2005年，两国自独立以来长达15年的政治稳定局面被打破，由此开启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稳定发展，而吉尔吉斯斯坦则陷入反复的国内冲突当中并遭遇多次非正常政权更迭。

本文选择2005年作为关键节点有以下原因：首先，在持续时间长短方面，“郁金香革命”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安集延事件”更是只持续了三天，两者的持续时间相比于后续长达15年的政治动荡或政治稳定而言，可以被视为一个“节点”。其次，吉、乌两国政权在应对“颜色革命”时，同时存在“镇压”与“妥协”两种选择，且两种不同的选择都是由先前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三，在2005年之前或之后，吉、乌在任政府对于社会运动的不同应对，均未能逆转两国特定的政治发展“模式”，没有对两国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产生决定性影响。就此而言，2005年足够“关键”。

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的选择，将会通过正反馈锁定于特定的发展轨道。因此，对于“为什么一国会反复因为社会运动而发生政权更迭”这一研究问题，可以拆分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1）面对社会运动的威胁，特定政权在关键节点上采取的应对策略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采取这种应对策略？

（2）关键节点上不同政权采取不同应对策略形成了何种“政权-社会运动”

^① Giovanni Capoccia, Daniel Keleme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2007, Vol.59, No.3, pp. 341-369.

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这种互动模式如何通过“正反馈”得以固化？

在某些情况下，政权崩溃取决于关键行为体在关键节点上所做出的决策和所采取的行动，这些决策和行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显著增加或者减少该政权走入特殊发展轨道的可能性。在竞争性威权（Competitive Regime）体制中，以领导人为代表的政权所做出的选择，往往是这些国家政治发展走向的关键。^①在面对“颜色革命”浪潮的冲击时，以吉、乌两国为代表的欧亚国家在多种应对方式中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继而导致两国在应对社会运动方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权-社会运动”间的互动模式，进而对两国政治发展轨迹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根据路径依赖机制的相关假定，可以发现，当行为体在关键节点上做出选择后，沿着所选择的这条路径而产生的结果一般会增加该路径的吸引力。这种累积效应开始以后，就启动了自我强化活动的强大周期，^②而自我强化的过程即为正反馈形成的过程。

综上所述，本文假设：在 2005 年面对“颜色革命”浪潮冲击的关键节点，吉、乌两国应对抗议的不同策略选择对社会运动所造成的影响，经过正反馈过程，被固定为两国民众与政权的互动模式，从而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反复发生“革命”而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稳定。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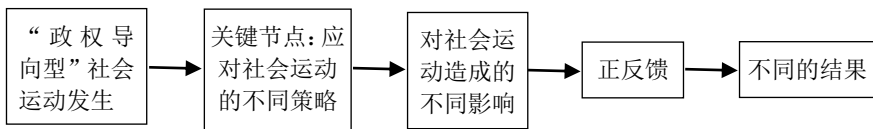


图 2 本文的分析框架示意图（笔者自制）

① 这是西方学者对于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贬损性称谓，意思是，中亚国家表面追求民主，但实际上属于威权国家。参见 Vanessa Ruget, Burul Usmanalieva, “The Impact of State Weakness on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Kyrgyzsta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7, Vol.40, No.4, pp.441-458; Vitali Silitski,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Authoritarian Reac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Following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0, Vol.43, No.4, pp.339-350; Thomas Ambrosio,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Concepts, Dynamics,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0, Vol.11, No.4, pp.375-392.

② [美]保罗·皮尔逊著：《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黎汉基、黄佩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四、关键节点：2005年吉、乌两国对“颜色革命”的应对

当社会运动发生后，政权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这种来自体制外部的挑战。政权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不仅会影响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能够影响运动的结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政权对于社会运动所做出的镇压与妥协两种行为，都是此类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国家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划分为压制和促进两类，通过对两类手段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进而将抗议者的行为分为指令型活动、容忍型活动、禁止型活动三种类型。^①叶夫根尼·芬克尔（Evgeny Finkel）进一步将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细化为孤立、边缘化、分配、镇压和说服五种类型。^②蒂娜·比沙拉（Dina Bishara）在镇压和妥协之外引入第三种政府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漠视（Ignore），即政府面对抗议毫无反应或者对抗议者持嘲弄、轻蔑的态度。^③然而“镇压”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并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冲突研究中，“镇压”指的是政权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使用某种形式的强制性控制，而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对镇压行为做了限制公民自由和暴力侵犯人身安全的划分。^④在本文看来，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一致的，即使用暴力手段压制甚至消灭反对势力，并威慑其他潜在的可能被动员起来反对政权的行为体。

在“郁金香革命”与“安集延事件”中，吉、乌两国政权与抗议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如表1、表2所示。从2005年3月18日吉南部城市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之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阿卡耶夫政权不断选择对抗议者进行妥协：承认反对派的地位、与抗议者谈判、拒绝实施紧急状态、将政权拱手“送给”反对派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安集延事件”爆发的2005年

① [美]查尔斯·蒂利著：《政权与斗争剧目》，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0页。

② Evgeny Finkel, Yitzhak M. Brudny, “No More Colour!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Colour Revolutions in Eurasia”, *Democratization*, 2012, Vol.19, No.1, pp.1-14.

③ Dina Bishara, “The Politics of Ignoring: Protest Dynamics in Late Mubarak Egyp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5, Vol.13, No.4, pp.958-975.

④ 参见 Christian Davenport, “State Repression and the Tyrannical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7, Vol.44, No.4, pp.485-504.

5月12日，乌政权即已完全放弃向抗议者做出妥协，总统卡里莫夫直接选择了镇压，至5月14日，乌政府已经完全控制了安集延市中心并开始追捕逃散的武装分子。

表1 2005年“郁金香革命”过程中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与抗议者的互动过程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	抗议者
2005年3月18日	安全部队驱散抗议者；阿卡耶夫总统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承认反对派是吉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贾拉拉巴德州、奥什州抗议者手持棍棒、燃烧瓶，冲击政府办公建筑，要求阿卡耶夫总统下台
2005年3月20日	塔纳耶夫总理号召抗议者与政府进行谈判	抗议者攻占塔拉斯州州长和市长办公室
2005年3月21日	阿卡耶夫总统召见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与最高法院院长，要求回应抗议者诉求，调查“选举舞弊”	抗议者攻占南部城市几乎所有市政机构，并开始向比什凯克“进军”
2005年3月22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承认选举结果有效，要求总统阿卡耶夫实行全国紧急状态，但遭到阿卡耶夫拒绝	
2005年3月23日	总统阿卡耶夫更换强力部门负责人	抗议者在比什凯克中心广场示威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
2005年3月24日	内务部长久舍巴耶夫呼吁抗议者停止暴力活动，同时保证警察绝对不会开枪；阿卡耶夫流亡国外；吉尔吉斯斯坦最高法院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抗议者不理睬政府呼吁，继续洗劫商铺并攻占包括总统府在内的主要政府办公建筑，并将前副总统库洛夫从狱中释放
2005年3月25日		反对派领导人巴基耶夫出任临时政府总统
2005年4月4日	阿卡耶夫签署辞职声明	

资料来源：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0-142页；孙壮志主编：《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171页。

表 2 2005 年“安集延事件”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与抗议者的互动过程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	抗议者
2004 年 6-8 月	乌安全部门逮捕了 23 名安集延市的年轻企业家	
2005 年 2 月	安集延地方法院认定被捕的企业家参加了宗教极端主义和反政府活动，并予以关押	被捕企业家亲友有组织地在法庭外进行抗议示威，抗议规模不断扩大
2005 年 3 月 24 日	受到“郁金香革命”影响，法庭宣布对被捕企业家延期审判	
2005 年 5 月 12 日		武装分子袭击了安集延的警察岗哨和部队营房，抢夺了大量武器弹药，并释放了 500 余名在押囚犯
2005 年 5 月 13 日	乌政府拒绝了抗议者要求；总统卡里莫夫亲自飞赴安集延指挥武力镇压	武装分子攻占安集延州政府与安全局大楼，要求释放被捕人员；骚乱演变为几千名民众参加的要求总统卡里莫夫“下台”的抗议
2005 年 5 月 14 日	总统卡里莫夫召开记者会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乌兹别克斯坦军警完全控制了安集延市中心；乌、吉边境城市（卡拉苏）市长下令摧毁一座通往吉尔吉斯坦的桥梁	包括企业家亲友在内的 541 名抗议者逃往吉尔吉斯坦；民众攻占卡拉苏市长办公大楼，焚烧了当地警察局和税务局，并修缮被摧毁的桥梁
2005 年 5 月 17 日	总统卡里莫夫召开记者会拒绝国际调查	
2005 年 5 月 19 日	乌政府逮捕了卡拉苏事件的组织者	

资料来源：孙壮志主编：《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21-223 页；Jennifer Murta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Democratization*, 2012, Vol.19, No. 1, pp.78-97.

那么，政权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镇压的方式来应对社会运动呢？与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相似，早期研究政治镇压的学者认为，领导人诉诸镇压的形式

来应对社会运动，源于领导人个人的偏执与不受约束，是一种“非理性”行为。^①而如今大多数研究则认为，镇压绝非因为某些领导人的“残暴”特质，而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当镇压收益超出镇压成本，或没有其他替代性选项且镇压成功率较高时，镇压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②考虑到镇压的政治合法性、镇压所需要的物质力量、可选择的替代方案等因素，国家在采取妥协还是镇压方式来应对社会运动时，不仅取决于国家能力，还要考虑到政权的镇压意愿。

当政权既没有足够的镇压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镇压意愿，或者有足够的镇压能力但是缺乏意愿，抑或有强烈的镇压意愿但缺乏足够的镇压能力时，都会导致政权更倾向于采取妥协或者漠视的方式来应对社会运动；而当镇压意愿与镇压能力两者兼具的情况下，政权更倾向于采取镇压的方式来应对社会运动。吉尔吉斯斯坦属于第一种情况：政权既缺乏镇压能力又缺乏镇压意愿；而乌兹别克斯坦属于最后一种情况：政权的镇压能力充足且镇压意愿强烈。

（一）“郁金香革命”：为何阿卡耶夫政权选择妥协？

阿卡耶夫政权垮台之迅速，超乎吉民众甚至国际社会的预料。在“郁金香革命”发展过程中，阿卡耶夫政权瓦解的重要原因在于，吉强力部门的软弱与阿卡耶夫对反对派力量的低估。事后，阿卡耶夫也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没有重视巩固权力体系，特别是加强护法机构；二是在政权旁落的重要关头没有实施紧急状态。^③

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开启了自身的民族国家构建，立国之初期期待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禀赋、经验、意志及其世界观。^④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是一位物理学家而非政治精英，也是中亚地区唯一一个非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出身的领导人。故“他在苏联

① Mauricio Rivera,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State Repression: The Divergent Effects of Legislatures and Opposition Parties on Personal Integrity Righ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Vol.61, No.10, pp.2183-2207.

② Christian Davenport, “State Repression and the Tyrannical Peace”, pp.485-504.

③ 孙壮志主编：《中亚五国政治社会发展 30 年：走势与评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66 页。

④ 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66 页。

走向解体的民主化浪潮中却不乏追求民主的积极热情与主动性”。^①阿卡耶夫政权在经济层面实行全面且彻底的“私有化”，并且积极吸纳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在政治层面将追求“民主”作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目标。

首先，武力镇压将威胁阿卡耶夫政权本就不甚稳固的执政合法性。政治心理、政治文化或者意识形态一经确立之后，一般都具有持久性且易形成路径依赖。阿卡耶夫致力于构建西式民主制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沉淀为该国民众的政治心理，令部分民众认为本国具有相对于其他中亚国家更高的民主水平。相对于妥协而言，镇压无疑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但镇压还可能刺激其他行动者走向街头，使得反对者从涓涓细流演变成滚滚洪流。^②2016年一项覆盖吉尔吉斯斯坦7个地区2个城市1004名民众的民意调查，衡量了吉民众对推翻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政权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的民众认为“郁金香革命”与“二次革命”是合法的。同样，超过1/3受访民众认为两次运动都不应该受到政府的武力镇压。相比于阿卡耶夫政权，接近半数的受访民众对巴基耶夫政权的评价更负面，因为巴基耶夫在2010年4月试图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③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采取武力手段镇压社会运动的合法性低且结果难料。

其次，镇压能力取决于强力部门的能力以及文官政府是否能够掌控强力部门。中亚各国的军警系统继承自苏联。苏联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军警部门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吉军事力量是中亚五国中最弱的，其规模也是最小的。在“郁金香革命”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军队仅有1万人，国家经济的困难大大制约了对军队建设的投入，造成军人薪饷很低，士气低落，逃兵现象严重。^④吉军内部腐败严重。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对男性公民实行义务兵役制，但大多数人会使用各种手段逃避兵役。在2007年春季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中，所有受访者都承认，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少有人会真正履行其军事义

① 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第45页。

②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230页。

③ Charles Sullivan, “Misruling the Ma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Cracking Down in Kyrgyzstan”, pp.628-646.

④ 杨恕：《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务。^①与军队相似，吉警察数量也严重不足，工资很低而且充斥腐败行为。

2002 年，吉政府担心议员阿奇姆贝克·贝克纳扎罗夫（Azimbek Beknazarov）煽动反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对其进行了逮捕并提起诉讼。此举在其家乡阿克西地区（Aksy）引发了支持者组织的大规模抗议。2002 年 3 月 17 日，警察在阻止示威的过程中开枪击毙了数名抗议者。阿卡耶夫政权起初对此次事件不闻不问，既没有与受害者亲属进行会面也没有出面道歉。政府的冷漠引发了抗议者的强烈不满，抗议活动迅速失控，阿克西地区要求为遇难者伸张正义的示威活动持续了数月之久。^②阿克西事件对阿卡耶夫政权与警察的关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阿卡耶夫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内务部长，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件的原因。该事件的调查结果将阿克西事件的责任完全推给强力部门，警察事实上被阿卡耶夫政权“出卖”了。一些警察发起了抗议并进行罢工，警察也在怀疑，如果继续发生此类事件，当警察对示威者使用武力后，会不会被作为政权向示威者妥协的“替罪羊”而被送进监狱。而此次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则是时任总理巴基耶夫被迫辞职，并在日后的“郁金香革命”中成为反对派领袖。阿克西事件的前车之鉴，加上抗议者利用亲友和部族的人际网络来影响警察的行为，成功换取了强力部门的“中立”。^③吉强力部门力量弱小、腐败不堪且强力部门与政权“分裂”，共同导致了政权没有足够的能力对社会运动进行镇压。既缺乏镇压能力又缺乏镇压意愿，导致阿卡耶夫政权选择了对抗议者进行妥协。

① Vanessa Ruget, Burul Usmanaliev, “The Impact of State Weakness on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Kyrgyzsta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7, Vol.40, No.4, pp.441-458.

② Donnacha Ó Beacháin and Abel Polese, eds., *The Colour Revoluti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0, pp.47-48.

③ 在 2010 年的“二次革命”过程中，强力部门则直接倒戈，向反对派效忠。据对政治人物卡西姆·伊萨耶夫（Kasym Isaev）的采访，吉安全部队将军米罗斯拉夫·尼亚佐夫（Miroslav Niazov）曾建议反对派领导人，应该从纳伦州和塔拉斯州开始动员。首先，当局需要时间将比什凯克的部队转移到这些地区。第二，在封锁了道路之后，就有可能将远离比什凯克的部队锁定在这两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国家都会被卷入到反政府的洪流之中。参见 Kasym Isaev: Tret'a Qshibka-Katastrofa Dlia Suverenogo Kyrgystana, Tolgonai Osmongazieva, May 21, 2010, <http://24.kg/community/74579-kasym-isaev-tretya-oshibka-ndash-katastrofa-dlya.html>, quoted from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010, Vol.38, No.5, pp.589-600.

（二）“安集延事件”：为何卡里莫夫政权选择镇压？

反观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执政伊始就把“政治稳定优先”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发展的目标，并极力主张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切制度和政策的立足点都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自独立以来，卡里莫夫发表了数次演讲，详细阐述“稳定”作为民主和发展之保障的重要性。

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实施重大的经济或政治自由化。对卡里莫夫而言，如果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是不可能的。卡里莫夫拒绝了经济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范式，而是优先考虑自给自足，且认为经济现代化应优先于民主转型。卡里莫夫认为，“在建造新房子之前不要摧毁老房子”，“我们的人民应该吃饱肚子，穿戴整齐”。^①政府保留了对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管制，追求工资的自给自足，只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②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改革同样稳健。卡里莫夫拒绝允许竞争性选举或有意义的政治反对派。^③卡里莫夫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道路，谁也无法阻止民主的客观进程和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但民主的发展需要符合自身国情，反对派的民主理想与国家历史、传统文化与民族身份不匹配。

在卡里莫夫政权看来，所谓的“民主运动”也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所驱动的。2003年“玫瑰革命”掀起欧亚地区“颜色革命”浪潮之后，卡里莫夫政权将西方国家所谓“促进民主”的组织及其资助方定义为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威胁”。随后发生的“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也成了外国势力构成威胁的“证据”。^④阿卡耶夫下台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也加入了对西方进行批评的行列。例如，《乌兹别克民族新闻报》的一篇头条文章指责美国煽动了中亚地区的不稳定。^⑤抗议示威被乌政

① 参见 Assylzat Karabayeva, “Leaders, Ideas, and Norm Diffusion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2021, Vol.6, No.1, p.30.

② 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pp.78-97.

③ Nick Megoran, “Framing Andij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slam Karimov’s Account of the Events of 13 May 2005”,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1, pp.15-31.

④ “Islam Karimov Excludes Possibility of ‘Colour’ Revolution”, op cit, Ref 38, quoted from Jone Heathershaw, “Worlds Apart: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1, pp.123-140.

⑤ Jone Heathershaw, “Worlds Apart: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 pp.123-140.

府视为扰乱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威胁，政权具有强烈的镇压意愿。卡里莫夫将“安集延事件”描绘为“恐怖主义暴行”——政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是对恐怖分子“挑衅”行为的慎重反应，维护了法律和秩序，保护民众的生命免受伤害。^①此举强化了镇压的合法性，同时也使得抗议者无法从中立的旁观者中获得支持。

另外，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重视军队建设，将军队视作维护国家独立的重要力量，军队的数量和质量均居中亚五国首位。^②卡里莫夫同时建立了庞大的安全机构，以对潜在的“威胁”进行威慑和消除。乌兹别克斯坦被认为拥有中亚规模最大的警察和内务部队，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掌握着管理国民警卫队和特种部队的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③凭借强力部门的控制，乌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

在应对“颜色革命”浪潮冲击的过程中，乌强力部门始终被牢牢掌握在卡里莫夫手中。镇压“安集延事件”，几乎没有引起乌政治精英，尤其是强力部门的反对。乌强力部门直接参与到国家资源提取与寻租活动中，将寻租利益置于行政部门之下，实现了政治精英与政权的“绑定”。卡里莫夫执政早期，向乌地方政治精英开放寻租渠道，通过允许寻租行为，来将地方政治精英与政权联系起来。1997年，乌政府出台法律，赋予了检察官、安全部门、警察、税务员监督和执行经济法律的权力。^④这些措施将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与寻租结合起来，使得强力部门深深地嵌入到政权中。政权对于强力部门和地方精英寻租行为的默许，使得强力部门与地方精英“背叛”现政权不仅无利可图，反而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某一政治精英的“背叛”行为会招致寻租利益链条上各方势力的反对。因此，在面对社会运动对于政权的冲击时，以强力部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展现出了高度的“团结”。既有镇压能力又有镇压意愿，这使得卡里莫夫政权能够对“安集延事件”进行镇压。

① Nick Megoran, “Framing Andij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slam Karimov’s Account of the Events of 13 May 2005”, pp.15-31.

② 孙壮志主编：《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第219页。

③ Sarah Kendzior, “Recognize the Spies: Transparen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Uzbek Cyberspace”, *Social Analysis*, 2015, Vol.59, No.4, pp.50-65.

④ Lawrence P. Markowitz, “Beyond Kompromat: Coercion, Corruption, and Deterred Defection in Uzbekist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7, Vol.50, No.1, pp.103-121.

五、正反馈：“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的形成与固化

（一）吉、乌两国应对“颜色革命”的不同方式所造成的影响

在从事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政治过程与资源动员论者看来，如果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出于理性选择而参与社会运动，那么可被动员的资源多寡与政治机会的大小被视为左右社会运动兴衰的重要因素。与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所定义的政治机会结构^①不同，本文认为，政治机会不一定是那些能够影响政治参与、较为宏大的、稳定且不易改变的结构条件。因此，“政治机会”这一概念的结构化取向，可能会导致此概念的僵化。在以往的“颜色革命”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政治机会”这一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任何可能影响到“颜色革命”成败的结构条件均被列入其中，故削弱了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事实上，许多政治机会既不是先于社会运动存在的，也不是较为稳定的，而是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通过运动与政治权威以及外部干预势力的互动过程逐步产生的。

一般而言，国家面对社会运动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会创造出不同的政治机会，也会在短期内取得不同的效果。如果国家对社会运动做出妥协，一般会降低参与社会运动的成本，导致政治机会扩大，从而使得社会抗议者走上街头，激发社会动员；而采取镇压政策则会极大地增加参与社会运动的成本。相比于妥协为社会运动带来政治机会而言，镇压带给社会运动的更多是政治威胁，而非机会。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进一步认为，“相对剥夺感”等情感性因素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但这种“不满”需要转化为行动。任何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一般都需要两个动员过程：一是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ation），二是行动动员（Action Mobiliation）。前者意在凝聚共识，让外界接受和支持运动所持的观点；后者意在形成行动，即推动人们实际参与。^②

① 参见[美]西德尼·塔罗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② Bert Klandermans,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Vol.49, No.5, pp.583-600.

吉、乌两国均存在家族统治、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等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且这些矛盾没有得到执政当局的妥善处理。当民众认为自身诉求通过常规的政治途径没有办法得以解决时，就有可能选择发起或参与社会运动作为改善自身不利处境的一种方式。为了实现民众的集体诉求以及动员民众参与社会运动，运动的组织者及其支持者首先需要建构出一套针对现实不满的替代性方案。回顾前文罗列的吉、乌两国政府与抗议者互动的过程可以看出，在共识动员层面，吉、乌两国的抗议者将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归因，认为各自国家和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分别源自阿卡耶夫与卡里莫夫的统治，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两位领导人的下台得到解决。这种主要框架^①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社会运动的潜在参与者能否获得“框架共鸣”（Frame Resonance），即社会运动的领导人或者支持者针对某个社会问题所做出的诊断以及解决方法，能否得到其他潜在参与者的认可与支持。^②在动员的过程中，少数坚定的政权支持者被动员起来反对政权或坚定的反对派被动员起来支持政权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动员的关键，是没有十分强烈政治动机的普通民众。能否动员居于多数的普通民众参与社会运动，往往会影响社会运动的成败。吉民众中“民主”观念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采取抗议示威手段表达政治诉求是合理的。而在乌兹别克斯坦，用抗议示威手段表达政治诉求很可能被描绘为“恐怖主义”。就将普通民众转变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而言，在乌兹别克斯坦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大得多，故其动员难度也要高得多。

在“安集延事件”的性质、政府进行武力镇压的理由、抗议者身份、死亡人数等问题上，乌官方的说法与西方媒体的说法大相径庭。与西方媒体所宣传的“安集延事件是一场大屠杀”相反，卡里莫夫对于这起事件经过的描述是这样的：2005年5月12日晚，武装的宗教极端分子闯入了安集延的一

① 框架视角最初于1974年由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由戴维·斯诺和罗伯特·本福德等人引入社会运动研究领域。框架视角强调的是抗议组织者或支持者为了赋予抗议合法性而建构起来的话语框架，这些话语框架因为与抗议者所处的文化背景或者生活体验产生共鸣，能够极大地扩大社会运动的影响，甚至能够左右社会运动的成败。参见 David A. Snow, E. Burke Rochford,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Vol.51, No.4, pp.464-481.

② Robert D. Benfor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Vol.26, No.1, pp.611-639.

所监狱，并释放了被看押的伊斯兰恐怖组织成员。5月13日黎明，武装分子开始劫持人质，卡里莫夫召集军队前往现场平叛。在随后的对峙和冲突中，共有187人死亡。^①面对西方媒体的诘难，卡里莫夫进一步将抗议者的行为定义为对宪法的颠覆，并指责媒体故意将所谓“和平示威者被枪杀”的错误信息传递到西方世界。卡里莫夫将自己的武力平叛行动与抗议者的行为进行对比，进一步凸显出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同时也针锋相对地构建出一套反框架，以对社会运动进行“反动员”（Demobilize）。

首先，卡里莫夫强调抗议者是“恐怖分子”，故总统动用军队进行平叛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是为了保护无辜民众免受“恐怖分子”的伤害。其次，卡里莫夫指责抗议者的行为是不“民主”的——抗议者试图获取政权，但不是通过选举这种符合宪法的形式，而是采用暴力手段攻占政府大楼等并不“民主”的行为。最后，卡里莫夫强调自己是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抗议者的行为未经人民的合法授权，也违背相应的国际惯例。^②卡里莫夫在“安集延事件”中建构出一种“反恐”和“平叛”叙事，以反击西方制造的抗议者行为的“民主”叙事，从而将抗议者的框架边缘化。而在行动动员层面，特定人群的集体行动形式主要是习得的，在数量和范围上也是有限的，是变化缓慢的，是适应了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的。

抗议者倾向于从本国的抗议历史中进行学习，^③而当局最初应对抗议示威的对策将会极大地塑造抗议者的学习行为。面对镇压“杀一儆百”的效果，“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得抗议者更不愿意直接参与社会运动，转而使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卡里莫夫政权的高度压迫性也解释了该国社会运动的高度破碎化。^④如果当局有过妥协的历史，抗议者参加社会运动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要更低，在不会招致镇压的情况下，抗议者往往会继续参加社会

① Sarah Kendzior, “Poetry of Witness: Uzbek Identity and the Response to Andijo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3, pp.317-334.

② Nick Megoran, “Framing Andijon, Narrating the Nation: Islam Karimov’s Account of the Events of 13 May 2005”, pp.15-31.

③ Alex Braithwaite, Jessica Maves Braithwaite and Jeffrey Kucik, “The Conditioning Effect of Protest History on the Emulation of Nonviolent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2, Vol.52, No.6, pp.697-711.

④ 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pp.78-97.

运动，最终形成一旦对政治现状不满，动辄参与社会运动的“怪圈”。

综上所述，吉、乌两国政权针对社会运动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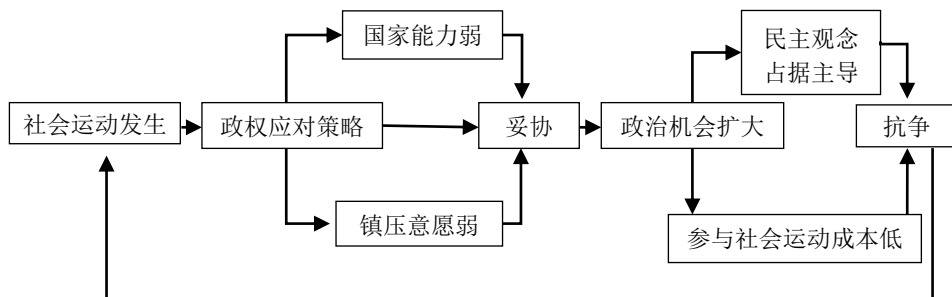


图3 吉尔吉斯斯坦抗议者与政权互动模式示意图（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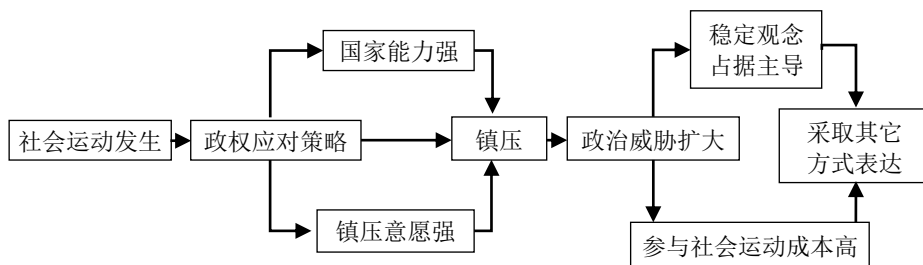


图4 乌兹别克斯坦抗议者与政权互动模式示意图（笔者自制）

（二）不同“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的固化

政权对社会运动进行妥协或者镇压所形成的互动模式，是如何得到固化并沉淀为一种政治心理的？在新的互动模式出现之后，既可能被固化也可能被消减。如果这种新的互动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接受并且得到内化，那么新的模式也将进入到“正反馈”的过程。在政治领域，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运用政治权威增加权力不对称的可能性等相互关联的特征，将影响到行为体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的选择能否进入“正反馈”过程，进而形成路径依赖。^①

^① [美]保罗·皮尔逊著：《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第36-48页。

首先，参与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人们在决定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会仔细权衡收益与成本，唯有经过一番艰苦的动员，社会运动才能招揽到足够多的参与者。同时，基于“理性人”假设，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每个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都会有搭便车的欲望，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①大多数试图影响政治议程的社会运动均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努力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还要面临遭到镇压的巨大压力，这将导致参与者一旦做出错误选择，将承担高额风险，所以参与者往往倾向于根据对他人行动的预期来不断调整自身的行动策略。

回顾吉、乌两国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可以发现集体行动所发挥的作用。“郁金香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动员过程截然不同。“郁金香革命”的动员模式是各种政治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协调行动，在“庇护”网络和部族的支持下，通过为潜在的参与者提供物质和精神激励，从而较好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郁金香革命”开始时，反对派集中精力动员政党、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然而，这些资源不足以有效和全面地动员地方民众。之后，反对派通过地方各级的人际关系网络和部族力量来推进动员。2005年的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些对选举组织方式不满的领导人及议会候选人。这些不满的领导人开始积极动员他们的支持者，其中大多数是亲戚、朋友和老乡。然而，“二次革命”不是反对派精心动员的结果，而是民众自发的集体行动。与持续一个多月的“郁金香革命”相比，“二次革命”短短两天就结束了。反对派并没有进行诸如架设扬声器、公开发表演说、散发反政府传单等传统的动员手段，而新闻媒体对于警察枪杀抗议者的新闻激起了民众的义愤。对巴基耶夫政权心怀不满的人群自发手持棍棒、石头，甚至是从警察手中夺取的枪支加入到抗议示威中来，要求巴基耶夫辞职。后续的过程和“郁金香革命”相似，抗议者再次攻占了总统府。巴基耶夫逃亡到南部的贾拉拉巴德州，后出逃至白俄罗斯寻求庇护。^②

① 参见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② Kathleen Collins, “Kyrgyzstan’s Latest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1, Vol.22, No.3, pp.150-164.

回顾吉尔吉斯斯坦两次“革命”的动员过程可以发现，在“郁金香革命”的演变过程中，政权在面对反对派的压力时毫无作为，参加抗议示威的成本较低，相反在一些地区不参加抗议示威反而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遭到当地社会排斥、失去部族长老或者地方政治精英的庇护）。事后来看，当时的吉政府好比一座破烂的房子，只要轻轻踹上一脚，整个建筑就会轰然倒塌。以至于在 5 年后的“二次革命”过程中，不需要反对派精心动员民众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不少民众也会自发加入到推翻现政权的抗议示威队伍中来。与“郁金香革命”时期“追求民主”相比，“二次革命”与“三次革命”中抗议者的诉求更加碎片化——抗议物价上涨、反对腐败、抗议执法不公、反对特定的部族或者政治人物等等，而这些碎片化的要求最后都汇聚成一个诉求——政权更迭。相反，“安集延事件”很快就遭到镇压。卡里莫夫政权通过镇压的方式传递了一个信号——政府无法容忍类似的行为，更不用说是一场“革命”了。在经验层面也是如此，“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极大增加了发起或参与反政府活动的成本，故乌兹别克斯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政权导向型”的社会运动。

其次，广泛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以及可能获取的资源。既有的政治制度往往由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进行支撑，且清晰地释放了行动者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信号。这种影响所产生的规训效应显然是持久的。^①“郁金香革命”中以反对派为首的抗议者，至少通过组织起来展现出似乎具有比被推翻的阿卡耶夫政权更大的“权力”。长期的体制薄弱伴随着强大且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往往构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由外国资助者扶持的非政府组织在 20 世纪 90 年代蓬勃发展，形成了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与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其他欧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拥有欧亚地区最活跃的“民间社会”。当民间社会团体利用抗议和抵制来表明自身的政策偏好时，国家不但无力镇压，而且其维护“民主”形象的动机也使公民能够对其提出要求。而经过“革命”成为执政者的原反对派，由于执政合法性不足，故会以鼓励

^① Richard Rose, “Inheritance before Choice i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1, Vol.2, No.3, pp.263-291.

“民主”来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例如，通过“郁金香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曾表示，“革命”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及其追求自由、真正的生活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吉前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也表示，2005年3月24日发生的“郁金香革命”是一场“人民革命”。^①

与吉尔吉斯斯坦“发达的公民社会”相比，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20世纪90年代，随着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来自西方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与此同时，乌本国非政府组织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安集延事件”结束后，乌政府于2005年6月成立了新的非政府组织协会，要求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隶属于该协会。仅在2005年8月，大约有200个非政府组织因不被允许重新注册而停止活动。^②与非政府组织的萎缩相比，国家的渗透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卡里莫夫政权选择与“玛哈拉”（Mahallas）^③等传统的社会机构进行合作，逐步完善国家管理体制。“玛哈拉”的存在，使得乌政府能够实施更加严格的社会控制措施，也使国家能够对民众的诉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④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无法负担全民福利，“玛哈拉”给政府提供了更多关于个人福利需求的信息，政府根据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再分配，合力化解了大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此同时，潜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或那些可能从事颠覆政权活动的人都会被“玛哈拉”的工作人员及时通报给强力部门，凡此种种，极大增强了乌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

第三，政治权力的不对等。当若干行为体处于可以对其他行为体施加压力的位置时，权力的运行可能是自我强化的。政治权威往往会被用来强化和巩固已有的政治优势。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能力低下的主要表现是缺乏法治、

① 焦一强：《从“民主岛”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第137页。

② Donnacha Ó Beacháin and Abel Polese, eds., *The Colour Revoluti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pp.169-172.

③ “玛哈拉”是乌兹别克斯坦地方自治管理的最小机构。“玛哈拉”在乌兹别克语中有单元、社区之意，指一个社区、街道、楼层群体的居民交互关系的整套系统。“玛哈拉”的中心是民选产生的、由德高望重者领导的“玛哈拉”委员会。参见孙壮志主编：《中亚五国政治社会发展30年：走势与评估》，第223-226页。

④ 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pp.78-97.

无效的税收制度和普遍的腐败等。^①吉政府很难对政治精英、官僚和其他政府雇员进行有效监管。尽管政府进行了各种改革，但治理能力没有得到系统地提升。外部援助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创造其他类型收入的能力有限，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导致吉政策“更容易受到援助者对民主化要求的影响”。一旦使用武力镇压社会运动，显而易见就会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进而面临援助停止的风险。由于西方援助者往往只满足于竞争性选举的进行和所谓的“言论自由”原则，^②吉历任领导人通常只需要营造社会多元化的假象即可，从而确保外部援助源源不断从西方流入。

与过分依赖国际社会的吉尔吉斯斯坦相比，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实施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较好。“安集延事件”发生后，乌兹别克斯坦拒绝了美国与欧盟关于对该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要求。欧盟以乌当局血腥镇压平民为由，先后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武器禁运与政府官员旅行禁令。美国则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对乌进行制裁，包括逐步停止经济援助，在援助项目中附加保障人权、实现政治自由化等要求，冻结乌相关官员的海外资产等措施。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卡里莫夫政权采取终止合作的方式进行反抗。乌政府关闭了汉纳巴德军事基地，同时取缔了索罗斯基金会等一批西方在乌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终止了与美国的“准盟友”关系。

卡里莫夫在采取雷霆手段平息“安集延事件”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社会的管控。自“安集延事件”以来，相关的乌兹别克语网站的数量激增。事件本身“骇人听闻”，加上相当多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在事件发生后流亡海外，只能通过互联网手段发泄不满并对当局进行抨击。^③2007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要求所有网站和博客都必须向当局登记，以加强互联网管制。与此同时，卡里莫夫政权也在全社会加强舆论宣传，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对于“安集延事件”的界定凸显了以

① Jaimie Bleck, Igor Logvinenko, “Weak States and Uneven Pluralism: Lessons from Mali and Kyrgyzstan”, pp.804-823.

② Vanessa Ruget, Burul Usmanalieva, “The Impact of State Weakness on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Kyrgyzsta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7, Vol.40, No.4, pp.441-458.

③ Donnacha Ó Beacháin and Abel Polese, eds., *The Colour Revoluti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pp.157-158.

下几点：（1）就如在吉尔吉斯斯坦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和武装分子”主要是为了利用此次机会推翻政府；（2）年轻人的思想“中毒”了；（3）武装分子受到其他国家的指使；（4）抗议者错误地认为安集延民众会支持他们；（5）抗议者的总目标是推翻宪法秩序，试图建立“哈里发国”。^①相较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多元化程度较低，大多数民众接受卡里莫夫所提倡的国家主义观念。卡里莫夫为乌民众提供了稳定与秩序，因此在历次总统大选中，总能获得极高的支持率。

如下图所示，吉、乌两国在关键节点，即应对 2005 年“颜色革命”之类的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对后续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不同的影响经由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运用政治权威增加权力不对称等路径，导致两国政权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的选择进入正反馈过程，从而形成路径依赖，继而使得“政权-社会运动”互动模式被锁定在特定的轨道上，即吉尔吉斯斯坦反复爆发“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而乌兹别克斯坦不再爆发“政权导向型”社会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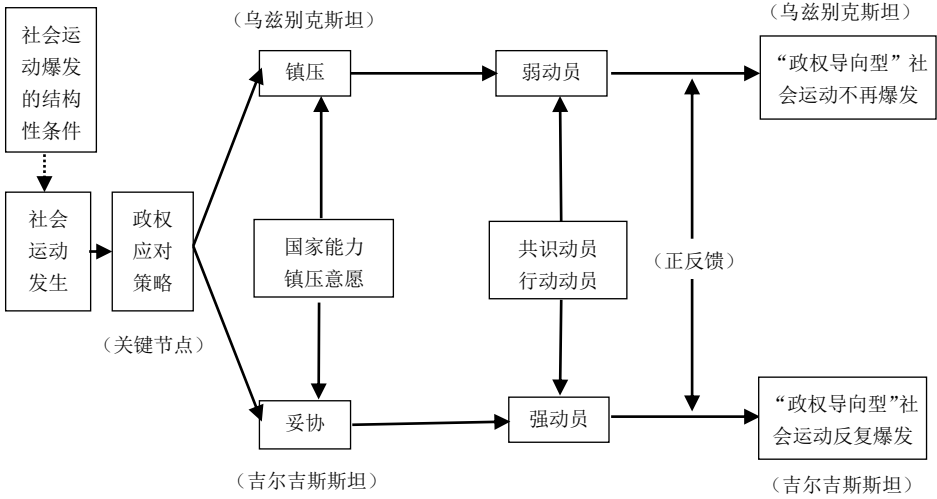


图 5 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不同路径示意图（笔者自制）

① Sarah Kendzior, "Poetry of Witness: Uzbek Identity and The Response to Andijon", pp. 317-334.

六、总结与反思

本文尝试通过运用路径依赖机制的相关观点,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颜色革命”及之后的政权与社会运动互动结果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在应对“颜色革命”的关键节点上,由于国家能力与镇压意愿的不同,两个国家分别采取了妥协与镇压的不同策略。这两种不同的策略扩大或缩小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使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产生了差异明显的政治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两种差异通过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密度性、运用政治权威增加权力不对称等路径,产生了“正反馈”效应,最终导致路径依赖。这或许可以解释,2005年以来,为何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三次政权非正常更迭,而乌兹别克斯坦却有效地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依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所进行的案例选择有可改进之处。本文选择了位于中亚地区的吉、乌两国作为案例,没有选择位于其他地区的案例进行比较,也没有选择某一国家政权更迭频繁与实现政治稳定的不同时期进行比较。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选择偏差。事实上,无论是在“颜色革命”还是其他抗议浪潮中,我们都很难找到这样的案例。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局限于分析吉、乌这两个特定的国家,学界可以在本文的基础上选取其他案例进行进一步验证。其次,本文在界定政权对社会运动的应对策略时采取了简单的“镇压”和“妥协”二分法,并没有对其他策略进行分析,也没有考虑这两种策略的交叉组合运用。事实上,如果考察两种方式的组合运用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本文分析的是政权所采取的策略对社会运动动员过程的影响,不意味着本文认为来自政权的镇压或妥协就是决定社会运动发生与否及其带来何种结果的唯一因素。结合其他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或许可以收获更多的启示。最后,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研究资料相对匮乏,以及笔者没有掌握吉、乌两国的民族语言与通用语言,因而本文对两国的研究仅限于尽可能多地参考业已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这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对相关问题的把握。期待未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针对本文的问题和观点进行修订或完善。

【 Abstract 】 Since the 21st century, large-scale social movements represented by “color revolutions” have emerg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the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protests, demonstrations and riots have also appeared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Social movements not only affect domestic politics in various countries, 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impacts of social movements o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question which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plore is why a country repeatedly experiences social movements which lead to regime changes. Based on the path-dependence mechanism and related viewpoints, and by comparing different ways of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in dealing with “color revolutions” and related influences, this article preliminarily concludes the reasons why regime changes repeatedly occurred in a country due to social movemen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o deal with “color revolutions” will form distinctly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Such differences are solidified through the path-dependence mechanism, and eventually lead to different interaction modes either disruption or repetition of “color revolutions” in a specific country.

【Key Words】 “Color Revolution”, Path Dependence, Social Movement, Eurasian Countries, Regime Change

【Аннотация】 С 21 века во многих стран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возникл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цветными революциями». С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андемией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протесты,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и беспорядки также наблюдались во многих стран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не только влияют на развитие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транах, но и оказывают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эволюцию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воздейств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на разные страны. Вопрос, который поднимаетс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почему в не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ах происходят повторяющиес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приводящие к смене режима. Авторы статьи делают попытку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механизм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ути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ним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сравнивая различные способы и меры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 борьбу с «цветными революциям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ют причины, по которым режим страны меняется из-за повторяющихс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что раз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личных стран по борьбе с «цветными революциями» формируют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азные типы мобилизаци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закрепляются через механизм, зависящий от пути,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риводят к прерыванию или повторению «цвет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конкретной стран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Цвет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пут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движения, страны Евразии, смена режим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对冲策略抑或功能合作？ ——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的议程论析*

沈 陈**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不那么像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俄罗斯却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发起者，此后对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评价也存在两极分化。对此，作者认为，由于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包含了多项议程，其对不同议程的侧重和排序导致了上述争议的产生。通过对对冲策略和功能合作整合为统一框架，可以追踪俄罗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克里米亚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局势升级等不同条件下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变化。在初始阶段，俄罗斯将外交对冲作为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并在此过程中维护了自身的大国地位。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原有的外交对冲空间基本消失，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2022年俄乌局势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总体来看，金砖国家合作有利于缓解俄罗斯面临的外交孤立，但在功能合作上尚未达到后者预期的水平。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 俄罗斯对冲 金砖国家 克里米亚事件 俄乌局势

【中图分类号】D814**【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124(1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新进展与中国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20CGJ0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第二届全国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青年教师及博士生论坛上宣读。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欧阳向英老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费海汀老师、《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 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金砖国家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俄罗斯是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发起国。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便开始提出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构想。2002 年 9 月，中俄印三国外长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共进工作午餐，标志着中俄印外长联大会晤机制正式建立。在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提出“金砖国家”（BRICS）概念以后，^①俄罗斯有意识地借此对新兴经济体合作加以整合。^②2005 年，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国首脑出席新兴经济体与八国集团（G8）对话会。在此次会议期间，新兴经济体首脑还自行组织集体会晤。2006 年 9 月联大会议期间，经俄罗斯总统普京倡议，巴西加入中俄印外长会晤机制，中俄印外长联大会晤机制开始扩展为金砖国家外长联大会晤机制。2008 年 5 月，金砖国家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会议，这是金砖国家官员首次在联合国以外举行集体会晤。2009 年 6 月，中、俄、印、巴首脑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难看出，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够从投资概念向战略力量转变，^③俄罗斯的外交艺术在其中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关于“俄罗斯是否属于金砖国家”的质疑却从未停止。一种质疑观点认为，俄罗斯属于发达国家，而非新兴经济体。尼尔·麦克法兰（Neil Macfarlane）指出，俄罗斯推动的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外交政策，旨在扭转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以来的外交颓势，最终恢复自身在原苏联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与其说是“新兴”，不如说是“复兴”。^④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学者也指

① 奥尼尔将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等新兴经济体的英文首字母放在一起，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参见 Jim O'Neil,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2003. 2010 年，金砖国家接纳南非为新成员，“金砖四国”由此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本文除特别指出外，统一使用“金砖国家”来表述。

② Marina Larionova, Mark Rakhmangulov, Andrey Shelepov, “BRICS in the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March 27, 2012, <http://www.hse.ru/org/hse/iori/news/50107827.html>

③ 樊勇明、沈陈：“改变全球格局的战略力量——金砖国家的内部粘合机制与发展方向前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第 18 期，第 14-25 页。

④ Neil Macfarlane, “The ‘R’ in BRICS: Is Russia an Emerging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Vol.82, No.1, pp.41-57.

出，俄罗斯是一个“福利的、民主的发达国家”，与其他金砖国家有着明显差异。^①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声称俄罗斯不但不属于发达国家，甚至连新兴经济体的资格也不具备。斯蒂芬·赫德兰（Stefan Hedlund）强调，俄罗斯虽然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冷战结束初期窘迫的财政状况，但其经济对能源的高度依赖并未改变，也没有实现投资和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增长。^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震荡，此后已无法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相提并论。^③

随着金砖国家合作议程的推进，关于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绩效评价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④持正面评价的观点认为，在俄罗斯的努力推动下，金砖国家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力量，凸显了全球权力转移的趋势。例如，俄罗斯官方高度评价金砖国家机制的意义，提出金砖国家体现出“一种新的全球关系模式，超越东方和西方、南北之间的旧分界线”，为此，俄罗斯将继续推动金砖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战略合作机制”。^⑤持负面评价的观点认为，金砖国家只是一个浮华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无法给俄罗斯带来实际收益。^⑥这类观点强调金砖国家的组织和议程尚不成熟，成员国之间的地缘竞争时常会影响合作进程。随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出现放缓趋势，作为这些国家共同点的经济增长因素正在消失，更使金砖国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⑦尽管如此，普京在出席2021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仍表示：“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实质性和富有成果的。我想再次指出，俄罗斯准备继续与所有金砖国家成员在所有的领域

① 肖辉忠：“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4期，第21-42页。

② 斯蒂芬·赫德兰：“金融危机之后的俄罗斯”，《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第71-87页。

③ Ben Judah, Jana Kobzova, Nicu Popescu, “Dealing With A Post-Bric Russia”, ECFR, November 2011, https://www.ecfr.eu/page/-/ECFR44_RUSSIA_REPORT_AW.pdf

④ Bobo LO, “The Illusion of Convergence-Russia, China, and the BRICS”, *Russie.Nei. Visions*, No.92, March 2016,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notes-de-lifri/russieneivision/s/illusion-convergence-russia-china-and-brics>

⑤ Концепция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ъединении БРИКС. <http://news.kremlin.ru/media/events/files/41d452a8a232b2f6f8a5.pdf>

⑥ “波将金村”原意为虚假的村庄，后引申为虚假、浮华的建设。

⑦ Sadanand Dhume, “This Group of Nations Is a Few Brics Short of a Loa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8, 2020.

保持密切合作。”^①

本文不试图批驳上述两种质疑，而是在承认这些质疑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疑问：如果说金砖国家是“新型南南合作”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象征，那么，为什么是由“不那么像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合作发起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对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评价的两极分化是否源于选择偏误，即仅选择了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合作中的部分议程作为评价对象？笔者认为，作为多向量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包含了多种议程，而正是对不同议程的侧重和排序导致了上述争议和本文问题的产生。鉴于此，本文试图将俄罗斯的金砖国家合作议程整合为统一框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议程侧重和排序，进而讨论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走向与前景。

二、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与排序

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可以按照动机和侧重划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外部议程，关注金砖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及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强调金砖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以及其他全球事务过程中的沟通与协作；二是内部议程，关注金砖国家在经济、政治、人文三个方面的务实合作，强调五国合作的内生动力塑造。按照这一划分，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也可分成两个层面：从外部看，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并借助金砖国家机制缓和西方国家对自身的战略压力，其议程表现为对冲策略；从内部看，俄罗斯在经济、政治、人文三个方面强化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联系，其议程表现为功能合作。

（一）对冲策略

“对冲”是源自金融学的术语，原意是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同时进行两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相抵的交易。在国际关系中，对冲策略又被称为“两面下注”，具体表现为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

^① “Ready To Continue Cooperation With BRICS Countries In All Fields: Russia”, September 9, 2021,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ready-to-continue-cooperation-with-brics-countries-in-all-fields-russia-2535681>

一国通过采取多种相反、相抵的手段来消解风险，以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保障自身的长远利益。^①

对冲策略包括外交对冲、经济对冲或混合对冲等不同类型。外交对冲表现为同时与两个具有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或同时参与两个具有某种竞争关系的国际组织，或在某个国际问题上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立场，以提升自身战略地位。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一面加入同盟国集团，一面又与英国主导的协约国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从而获得“两面要价”的有利地位。经济对冲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防范因过度依赖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而造成的经济风险。例如，英国退出欧盟后，为了降低对欧洲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积极与美国、日本等欧洲以外的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混合对冲是指在外交和经济上分别选择一边的情形，这一点在亚太地区颇为明显。例如，尽管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后者却经常在战略上倒向美国，采取制衡中国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主要基于外交对冲和经济对冲两种议程。一方面，俄罗斯试图借助金砖国家改革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丧失超级大国地位，陷入“地位恐慌”。^②尽管俄罗斯曾是 G8 成员，^③但在该机制中，俄罗斯仅被允许参加安全议题的讨论，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的退让换来的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北约东扩等一系列威胁俄罗斯安全的地缘事件，进而刺激俄罗斯在 21 世纪初积极寻找非西方战略伙伴。俄罗斯渴望改变冷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这一点与其他金砖国家构建多极化世界的愿景不谋而合，^④使金砖国家成为俄罗斯在 G8 之外

① Cheng-Chwee Kuik, “Smaller States’ Alignment Choi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Hedging Behavior in the Face of a Rising China”, Ph.D Dissert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une 2010.

② Sergey Karaganov, Dmitry Suslov, “A New World Order: A View from Russia”, *Horizons*, 2019, No.13, pp.72-93.

③ 1991 年，立国不久的俄罗斯受邀参加七国集团（G7）的安全会议。1997 年，俄罗斯获准“转正”，G7 随之变为 G8。2014 年 3 月，美国和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决定，暂停俄罗斯的 G8 成员国地位。

④ Georgy Toloraya, “Why Does Russia Need BRIC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5, No.1.

推进外交对冲议程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对冲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即寻找替代性的合作伙伴，降低对美欧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从2008年至2014年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之间，欧美经济遭遇重创并且长期未能摆脱增长低迷的状态。2011年，美国主权债务问题日益显性化，民主与共和两党在“财政悬崖”问题上展开激烈博弈，压缩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空间。由于欧洲南部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欧盟内部的财政赤字问题积重难返。受此影响，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了欧盟及欧洲大国的增长预期。与之相反，受石油价格保持高位等因素影响，2012年俄罗斯经济增长4%，经济基本恢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增长迅速，金砖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趋势明显的情况下，俄罗斯利用自身横跨欧亚大陆的优势，有条件在东西两个方向推进经济对冲议程。

（二）功能合作

功能合作包括部门务实合作和内部机制建设两个层面。新功能主义强调部门合作从局部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经济到政治的“外溢”过程，最终促使国家之间建立超国家性质的共同体或其他形式的合作机制。^①值得注意的是，功能合作中的“外溢”过程并不是单向的、线性的，而是曲折的、可逆的，因此从部门合作到共同体机制的演进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在多数国际合作中，新功能主义理论追求构建共同体机制的最高目标很难实现，功能合作议程被界定为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开展的部门合作，以及部门合作推动参与国机制化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

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包含广泛内容，目前已形成了经济、政治和人文三轮驱动的格局。金砖国家每年由成员国轮流举办首脑峰会，还定期举行外交、安全、贸易、工商、统计、农业、卫生等部长级会议。此外，五国首脑及部长级官员、协调人和驻外使节，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

^① Ernst Haas, “Turbulent Fields and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6, Vol.30, No.2, p.175; Ernst Haas, “Does Constructivism Subsume Neofunctionalism?” in Thomas Christiansen, Knud Erik Jorgensen and Antje Wien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London: Sage, 2000, pp.22-31.

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场合也不定期举行会晤。金砖国家注重搭建民间交往平台，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文化理事会、体育理事会、大学联盟、图书馆联盟、博物馆联盟、美术馆联盟、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疫苗研究中心等，金砖人文交流的机制化程度逐步提高。^①在首脑峰会期间，金砖国家的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还会举办企业家论坛、金融论坛、地方政府论坛、工商论坛以及艺术节、体育节等配套活动，从而形成多部门、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嵌套机制。

俄罗斯将功能合作作为本国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议程。为了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双边和多边的机制建设，夯实五国之间的团结纽带，俄罗斯提出了金砖国家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五国非正式协调工作网络；引入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制度；制定长期的金砖国家发展战略；启动“有关金砖国家机制化方式、速度和具体形式的对话”；设立金砖国家常设秘书处等。^②这些倡议多数已经付诸实施。2015年，在俄方的倡议下，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乌法峰会上通过并实施了《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规划了2020年前金砖国家经贸投资合作的路线图。2020年，俄罗斯作为轮值主席国主持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会上通过了《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规划了后疫情时代五国加强卫生健康、数字经济等部门的合作议程。

（三）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排序

在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中，对冲策略优先于功能合作。在金砖国家合作的初始阶段，俄罗斯在拥有G8成员资格的情况下发起金砖国家合作，其本身体现了强烈的对冲色彩。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没有打算放弃G8成员的身份，也没有计划与其他金砖国家结成任何形式的同盟，而是将自身定位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桥梁。^③面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力，俄罗斯试图借助金砖国家恢复和巩固自沙皇俄国、苏联时期以来的地缘影响，构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球大国集体领导的国际秩序。俄罗斯相信，金

① 沈陈：“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进展、功能与挑战”，《世界知识》，2018年第16期，第46-47页。

② Концепция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ъединении БРИКС.

③ Stephen Fortescue, “The BRICS and Russia”, in Vai Io Lo and Mary Hiscock, eds., *The Rise of the BRIC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nging Paradigm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pp.228-240.

砖国家的合作越推进，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会“越客气”。^①

不过，由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远远超过俄罗斯关注的外交和安全领域，全球治理改革和内部功能合作逐渐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内容。早在 2008 年叶卡捷琳堡外长会上，金砖国家外长就国际经济和金融状况、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问题、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组织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在 2009 年金砖国家首次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重点就落实二十国集团（G20）共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全球经济治理议题进行讨论，多极化、反恐等俄罗斯关注的议题则被放到相对靠后的位置。在 2011 年金砖国家三亚峰会上，金砖国家内部功能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并着手制定经贸、金融、科技、卫生、智库等部门的行动计划，作为下一阶段五国合作的基础。

在金砖国家合作初期，全球治理改革议程的推进速度总体快于五国内部合作议程。尽管俄罗斯在国际组织中一般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其遵循的国际规则与发达国家相似，但在全球治理规则和制度改革问题上，俄罗斯为了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又常常与金砖国家形成战略协作。例如，在贸易领域，俄罗斯一方面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 WTO，另一方面又支持巴西候选人罗伯特·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当选 WTO 总干事，此举被视为“金砖国家的胜利”。^②又如，在气候领域，俄罗斯以发达国家身份接受减排义务，但在哥本哈根等全球气候缔约方会议上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协调立场。上述案例表明，即便俄罗斯在身份上与发达国家接近，但仍优先选择与金砖国家协调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经济利益，而是通过在贸易、气候等领域与西方国家展开规则博弈，试图在全球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代表权。此时，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是外交对冲，其与五国间的功能合作不存在直接联系。

随着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深入，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歧也在不断增

① Zaki Laïdi, “The BRICS against the West?” *CERI Strategy Papers*, 2011, Vol.11, No.2, pp.1-12.

② Kristen Hopewell, “The BRICS-Merely a Fable? Emerging Power Alliances i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93, No.6, pp.1377-1396.

加，改革开始遇到较大阻碍。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选择构建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机构，降低对传统全球治理机构的经济依赖，从而倒逼和撬动传统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例如，在金融领域，2010年IMF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规定IMF份额扩大一倍，其中约6%的份额向更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IMF还致力于促成一个更具代表性、全部由选举产生的执行董事会，具体由欧洲国家让出两个席位，以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根据该方案，中国通过注资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俄罗斯、印度、巴西的份额也都跻身前十。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IMF拥有否决权，美国国会迟迟不就2010年改革方案进行表决，欧洲国家也不愿让出两个IMF执行董事会的席位，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无法得到相应的提升。为了表达对IMF改革进度的失望，中国、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商议筹建替代性国际金融机构。2014年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正式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在功能上分别与IMF和世界银行对应。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既有利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降低对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也成为目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程度最高的功能领域。此时，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是经济对冲，并与五国间的功能合作明显重叠。

不难看出，随着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入，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排序也处于变化之中（见表1）。当俄罗斯把外交对冲作为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时，其外部议程聚焦于改革传统的全球治理机构，与五国内部合作议程存在明显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俄罗斯也致力于密切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但其参与功能合作的内容与外交对冲的议程差异较大。当俄罗斯把经济对冲作为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时，其外部议程聚焦于创设新型全球治理机构，与五国内部的功能合作议程在内容上较为一致。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改革传统全球治理机构的进程陷入僵局。金砖国家通过创设新型全球治理机构进行经济对冲，既可降低对传统全球治理机构的依赖，又能提升五国间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参与功能合作的内容与经济对冲的议程差异较小，功能合作服务于经济对冲的实现。

表 1 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排序

优先合作议程	外部议程	内部议程	议程间差异
外交对冲	改革传统全球治理机构	五国内部的功能合作	差异大
经济对冲	创设新型全球治理机构		差异小

作者自制。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对冲议程与功能合作议程在内容上存在重叠，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仍以金融领域为例，从议程内容来看，金砖国家合作主要是为了改革 IMF、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改革诉求迟迟未能满足的情况下，五国开始着手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加快改革传统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组建替代性国际金融机构的进程不会如此迅速。并且，即使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建成以后，俄罗斯或其他金砖国家也从未因此考虑退出 IMF 和世界银行。当然，也正是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的顺利组建，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 IMF、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可见，虽然经济对冲与功能合作在议程内容上存在重叠，但经济对冲在议程排序上仍优先于功能合作：经济对冲的需求决定了功能合作的水平，功能合作的水平则影响经济对冲的效果。

三、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议程调整

克里米亚事件是俄罗斯外交的分水岭，也对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产生重大影响。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前，俄罗斯的外交议程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在搭建桥梁与改革体系之间摇摆不定；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变为战略冲突和对抗，外交对冲的空间不复存在。俄罗斯有意识地减少对美欧市场的经济依赖，^①转而将金砖国家定位为抵御西方经济制裁的重要堡垒。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进行经济对冲的需求上升，更加重视金砖国家内部的功能合作。

^① Richard Connolly, *Russia's Response to Sanctions: How Western Economic Statecraft Is Reshap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一）外交对冲空间消失，经济对冲需求上升

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原有的外交对冲空间基本消失。随着西方国家取消俄罗斯的 G8 资格，俄罗斯失去了作为发达国家的身份标志以及与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政策对话的平台。西方国家在联大上策动批评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公投的决议案，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否决，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在内的 54 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对于澳大利亚放出“禁止俄罗斯参加 G20 峰会”的风声，金砖国家则发表联合声明予以回应，指出 G20 的“管理权平等地属于所有成员国，任何成员国都不能单方面决定它的性质与特征，敌对言论、制裁与反制裁以及武力的升级，均无助于按国际法达成持续和平的解决方案”。^①

金砖国家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基于维护联合国、G20 等国际机制，尊重国际法及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西方国家垄断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和价值观判断的话语权，客观上避免了俄罗斯陷于外交孤立的局面。由于金砖国家在克里米亚事件上的态度本质仍是外交对冲而非战略对抗，^②因此其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并不意味着五国之间结成反西方联盟体系，也不能构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外交工具。如果说过去俄罗斯发起金砖国家，是为了制衡美国霸权、改革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通过外交对冲塑造自身的全球大国形象，那么在与西方国家关系走向对抗的情况下，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外交意义，已缩减为给俄罗斯带来急需的政治支持和国际合法性。^③

与此同时，经济对冲成为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优先议程。克里米亚事件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降至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的最低点。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不得不降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2015 年，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通过了《金砖国家的经济伙伴战略》，提出金砖国家应建立更密切的经贸联系，并首次提议将能源和矿产资源开采等俄罗斯主要经济部门，作为五国合作的

① Zachary Keck, “Why Did BRICS Back Russia on Crimea?” *The Diplomat*, April 1,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3/why-did-brics-back-russia-on-crimea/>

② 冯绍雷：“从乌克兰危机看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相互关系的前景”，《国际观察》，2014 年第 3 期，第 30-43 页。

③ Rachel Salzman, “From Bridge to Bulwark: The Evolution of BRICS in Russian Grand Strategy”, *Comilla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5, No.3, pp.1-12.

新重点。俄罗斯还提出打造金砖国家结算支付系统的倡议，鼓励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使用本币结算，以对冲本国被美国主导的国际结算支付体系排除在外的风险。

（二）经济对冲与功能合作：俄罗斯的去美元化政策

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前，金砖国家就已经开始筹划应急储备安排，作为对冲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工具。直到 2014 年 7 月，金砖国家福塔莱萨峰会终于通过了《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条约规定，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致力于缓解成员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短期国际收支压力，总额为 1000 亿美元，具体包括两种货币互换工具：一是流动性工具，用于应对当前出现的国际收支缺口；二是预防性工具，用于缓冲未来可能存在的国际收支缺口。条约还规定，成员国只可按需获得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资金中的 30%，剩下的 70% 则与 IMF 协议挂钩。

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美元结算成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之一。当前，国际结算交易主要以美元结算方式进行，而美元兑换需要通过美国控制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因此美国可以利用 SWIFT 将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和企业排除在全球金融和贸易结算之外。尽管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已经建立，但由于其以美元作为互换货币，且很大程度上与 IMF 挂钩，按需获得资金的规模有限，因此无法满足俄罗斯对冲西方经济制裁的需要。为了防范美国可能采取的结算制裁措施，俄罗斯于 2017 年 12 月率先启动了一种替代 SWIFT 的结算工具，即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在 SPFS 系统的基础上，俄罗斯还试图推动建立金砖国家的贸易融资内部结算系统，从而将五国国内支付系统连接起来。

为实现经济对冲、强化结算功能合作，俄罗斯提出了一系列与去美元化政策相关的金砖国家合作议程，包括：（1）建立金砖国家大宗商品交易所，扩大本币交易；（2）推动债券多元化与本币国际化相结合，由新开发银行发行金砖国家本币债券；（3）取消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与 IMF 挂钩的部分，扩大直接货币互换和按需获得资金的比例。^①对此，金砖国家开始在某

^① Parv Aggarwal, “Barriers to de-Dollarization Within BRICS”, February 1, 2021,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barriers-to-de-dollarization-within-brics/>

些方面回应俄罗斯的诉求。例如，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宣言提出，五国将“通过货币互换、本币结算、本币直接投资等适当方式，就加强货币合作保持密切沟通，并探索更多货币合作方式……鼓励金砖国家银行间合作机制继续在支持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①时任新开发银行行长昆达普尔·卡马特（Kundapur Kamath）在出席“2017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也表示，新开发银行将拿出50亿美元的项目资金，鼓励金砖国家使用本币融资。^②目前，新开发银行已发行数次人民币债券，未来还计划发行卢布债券和其他金砖国家的本币债券。

自2017年实施去美元化政策以来，俄罗斯同时推动增加欧元结算和金砖国家本币结算等多种路径。俄罗斯对金砖国家出口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从2018年第一季度占比80%以上的峰值，下降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33.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出口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去美元化，但取代美元的更多是欧元，作为本币的卢布仅占出口结算的13%。^③由此可见，俄罗斯去美元化政策首先是为了应对SWIFT风险的经济对冲，其次才是推动金砖国家相关部门的务实合作和内部机制建设。由于俄罗斯通过欧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去美元化政策的目标，且其他金砖国家不存在对冲美元的动机，因此，随着俄罗斯通过构建金砖国家本币结算机制实现经济对冲的需求下降，五国的结算功能合作也转而放慢。

四、俄罗斯对金砖国家功能合作议程的拓展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西方经济制裁和低油价等因素叠加影响，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低迷，功能合作已不仅是经济对冲的附属议程，其在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议程中的位置愈发凸显。俄罗斯主办的2020年金砖国家峰会将主题定为“全球稳定、共同安全和创新增长”，反映出俄罗斯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对经贸、卫生、科技等部门合作的关注。

①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人民日报》，2017年9月5日，第3版。

② “金砖银行行长：鼓励金砖国家用本币融资”，2017年6月2日，<https://finance.caixin.com/2017-06-02/101097209.html>

③ Parv Aggarwal, “Barriers to de-Dollarization Within BRICS”, February 1, 2021.

在经贸领域，推动部门务实合作，争取尽早摆脱经济困境。俄罗斯是一个“不那么像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其经济结构更加传统，以能源等大宗商品出口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俄罗斯寻求与金砖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建立能源联盟，鼓励贸易伙伴以本国货币结算，防范美元结算的风险。在担任2020年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俄罗斯积极扩大与金砖国家在贸易、农业、基础设施、中小企业等部门的务实合作。为了降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可能造成的溢出效应，俄罗斯倡导金砖国家协调运用财政、货币等结构性政策，共同创造强劲、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在卫生领域，倡导抗疫集体行动，夯实金砖国家疫苗研发机制。早在2015年俄罗斯举办金砖国家乌法峰会时，五国就提出了联合开发疫苗的任务。这一任务在2018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得到进一步细化，达成建立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的协议。新冠肺炎疫情使卫生合作在金砖国家合作议程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在2020年金砖国家第十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根据俄罗斯制定的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框架计划，金砖国家举办了20多项与卫生领域相关的科技创新活动，涉及疫苗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生产、智慧医疗等。金砖国家还根据已采取的防治措施，编制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佳实践手册，提供给五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使用。在2021年金砖国家峰会上，普京再次强调金砖国家集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性。^①目前，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Russian Direct Investment Fund）已与印度和中国的制药公司达成疫苗试验和生产协议。

在科技领域，加快数字经济转型，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后疫情时代要求金砖国家加快产业升级，把握以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2020年以来，俄罗斯多次组织或参与金砖国家财政、经贸、统计、税务、科技等部门的视频会议，就信息产业、数字贸易等问题展开政策沟通。^②俄罗斯推动制定的《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提出了“无障碍和无制裁的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惠民”等新议程，体现了其在远程

① “Putin Touts Russian Virus Vaccines at BRICS Summit”, November 17, 2020,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putin-touts-russian-virus-vaccines-181557013.html>

② 沈陈、徐秀军：“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金砖国家合作：挑战、机遇与应对”，《当代世界》，2020年第12期，第65-72页。

办公、在线教育、在线消费等数字产业发展方面的诉求。

新冠肺炎疫情拓展了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功能合作方面的议程，提升了金砖国家部门务实合作和内部机制建设的总体水平。不过，受俄罗斯本身发展和金砖国家合作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拓展金砖国家功能合作议程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局限性。

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俄罗斯缺乏足够的经济和财政基础，无法有效引领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时至今日，俄罗斯经济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局面。金砖国家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表示：“除俄罗斯外，金砖国家的相对和绝对地位接近我在 2001 年的设想。”^①其次，快速的经济增长曾是金砖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基础，但这一基础近年来发生较大改变，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制约了俄罗斯参与部门合作的收益。最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开发银行不足以替代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其他金砖国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与俄进行金融结算和技术转让，^②无法有效对冲俄罗斯因西方制裁带来的损失。

从政治层面来看，一方面，金砖国家内部的地缘竞争影响了五国加强机制建设的前景。由于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地缘竞争关系。在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中印边界争议持续背景下，俄罗斯担忧印度可能与美、日等西方国家不断走近，引发中俄印乃至金砖国家合作的“内部分裂”。^③此外，俄罗斯曾因委内瑞拉问题与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出现分歧。另一方面，随着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俄罗斯短期内已不存在与美国和欧盟达成和解的可能。在此问题上，中国、印度等国仍坚持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立场。^④但

① “Has BRICS Lived up to Expectations?” *The Economist*, July 27, 2018.

② Alexei Miller, Fyodor Lukyanov, “Detachment instead of Confrontation: Post-European Russian Search of Self-sufficienc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19, 2016.

③ Nivedita Kapoor, “RIC, BRICS and SCO: The Pandemic and Its Consequences”, Valdai Discussion Club, July 29, 2020,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ic-brics-and-sco-the-pandemic-and-its-consequence/>

④ 参见“外交部发言人就乌克兰局势等回答记者提问”，2022年2月25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02/25/c_1128414012.htm；“Russia-Ukraine War: India Calls for Immediate De-escalation”，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businesstoday.in/latest/world/story/russia-ukraine-war-india-calls-for-immediate-de-escalation-323742-2022-02-24>

也要看到，由于西方国家的外交和舆论压力不断增强，部分金砖国家的政策可能出现调整，^①进而对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五、结论与展望

作为曾经的 G8 成员，俄罗斯并没有被平等地接纳为“西方一员”，促使其将金砖国家合作作为抵制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的外交工具。由于金砖国家之间存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身份等差异，金砖国家合作缺乏足够的内部议程。^②因此，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合作初始阶段将对冲作为其参与金砖国家的优先议程。在外交上，金砖国家合作使俄罗斯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桥梁，有利于提升俄罗斯的战略地位；在经济上，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造成严重打击，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降低对美欧市场依赖的决心。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不那么像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成为金砖国家合作发起和推进的重要驱动力。

从外交对冲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合作对俄罗斯来说，既不是“波将金村”，也没有达到普京所期待的战略协调程度。在金砖国家合作第一个“黄金十年”中，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推动了金融、贸易、气候等多个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俄罗斯在此过程中维护了自身的大国地位，彰显了金砖国家战略合作关系的价值。克里米亚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长期制裁，导致后者的外交对冲空间几乎丧失。金砖国家则在联合国、G20 等国际场合抵制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企图，给予后者宝贵的政治支持。这表明金砖国家的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俄罗斯的外交对冲策略在此时产生了回报。面对俄乌局势不断升级，尽管巴西、南非等国的外交立场出现某些动摇和调整，但与西

① 例如，博索纳罗顶住西方压力在 2022 年 2 月 16 日访俄后，又于一周后起草谴责俄罗斯的声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娜莱迪·潘多尔（Naledi Pandor）指出，南非和俄罗斯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盟友，但“俄罗斯的行动将南非置于一个困难和不受欢迎的位置”。参见“Brazil to condemn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February 24, 2022, <http://brazilian.report/liveblog/2022/02/24/condemn-russia-ukraine/>；“South Africa ‘Concerned’ About Russia’s Actions in Ukraine”，February 24, 2022, <https://africa.cgtn.com/2022/02/24/south-africa-concerned-about-russias-actions-in-ukraine/>

② Никонов В.А., Толорай Г.Д. (ред.)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в БРИКС: цели и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2013. С.2.

方国家的孤立和制裁政策仍有很大不同。

由于担心美国可能进一步实施制裁，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都是为了使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减少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努力抵消西方国家制裁的负面影响。尽管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在议程内容上存在一致性，但前者在议程排序中仍优先于后者，这一点在欧元取代美元成为俄罗斯主要结算货币后体现明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俄罗斯为了扭转经济颓势，积极拓展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议程。受制于俄罗斯本身发展和金砖国家合作特点等诸多因素，五国功能合作的议程设置存在一定局限性。与外交对冲相比，金砖国家合作在经济对冲和功能合作方面尚未达到俄罗斯预期的水平，这也是对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评价出现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随着 2022 年俄乌局势升级，俄罗斯的外交对冲空间完全丧失，经济对冲需求则进一步上升。在此背景下，积极拓展金砖国家的功能合作议程将成为俄罗斯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优先选项。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合作作为案例，并不说明本文的框架和结论仅适用于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冲策略与功能合作并存的情形，其参与金砖国家合作也面临议程的设置和排序问题。受西方民粹主义兴起、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局势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金砖国家推进外部议程的进度放缓，金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也面临某些挑战。对此，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从俄罗斯的案例来看，金砖国家合作议程在对冲策略和功能合作两方面始终具有其特殊价值。中国是 2022 年金砖国家的主席国，我们可以从金砖国家各自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加强对金砖国家对冲策略议程的区分和追踪，努力协调五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议程中的立场；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完善金砖国家部门务实合作和内部机制建设，发掘五国在卫生健康、数字经济等功能合作议程上的需求和潜力，为打造金砖国家第二个“黄金十年”做出中国贡献。

【Abstract】 As a BRICS country which is “not so like an emerging economy”, Russi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itiator of the BRICS cooperation. Since then, the evaluation of Russ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BRICS cooperation has

also been polarized.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holds that it is a result of Russia's emphasis and sorting of various agendas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BRICS cooper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hedging strategy and functional cooperation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this article traces changes in agendas of Russ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BRICS cooperat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such as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Crimean crisis,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escalation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t the initial stage, Russia made diplomatic hedging a priority in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BRICS cooperation and maintained its great power status according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Russia's original diplomatic room for hedging almost disappeared. The focus of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BRICS cooperation has shifted to economic hedging and func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has been strengthened by the Russia-Ukraine escalation in 2022. On the whole, the BRICS cooperation is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the diplomatic isolation which Russia encounters, but in terms of functional cooperation, it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level expected by Russia.

【Key Words】 Russian Diplomacy, Russia's Hedging Strategy, the BRICS, the Crimean Crisis, Russia-Ukraine Escalation

【Аннотация】Как страна БРИКС, которая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похожа на развивающуюся экономику»,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важным инициатор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с тех пор оценка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и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была поляризованной. В данной связи автор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поскольку участие России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включает несколько повесток,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и упорядочение этих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весток Россией привело к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ым спорам. Интегрируя стратегии хеджирования 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ожно отследить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вестке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и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в разли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таких к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2008 года, события в Крыму и пандемия COVID-19,

обострение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е. Россия сдел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хеджирование приоритетом своего участия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и сохранила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свой статус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После событий в Крыму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хеджирования у Росс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исчезло, а фокус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и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БРИКС сместился в сторон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хеджирования 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е в 2022 году ещё больше усилит эту тенденцию. В цел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БРИКС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смягчени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золяции, с которой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Россия, н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ещё не достигло ожидаемого Россией уровн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е хеджирование, БРИКС, события в Крыму,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е

(责任编辑 宋羽竹)

2021年俄罗斯经济与外交述评**经济增长恢复、刺激模式退出、气候行动开启
——2021 俄罗斯经济述评***

曲文轶**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的2021年，俄罗斯经济已经超越了疫前水平，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相比多数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要到2024年后才能恢复至疫前水平，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仍然维持高负债、负利率的刺激政策，俄罗斯在保持财政稳健并收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恢复了增长，这一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另一方面，俄罗斯率先退出经济刺激模式也引发了争议。在世界输入性通胀的背景下，央行的加息被认为无助于抑制通胀，僵化的财政规则也无法适应疫情期间逆周期调节的需要，因此有学者主张维持宽松的宏观政策，通过扩大政府债务，甚至是由央行购买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加速经济增长。2021年俄罗斯的低碳转型也迈出了实质步伐。俄政府批准了2050年前低碳发展战略，明确了2060年碳中和目标，积极开展气候外交，为本国争取有利的低碳发展条件。在实践层面，选择萨哈林州进行区域脱碳试验。俄政府还利用国有企业推进低碳转型进程，要求它们制定自己的气候目标。作为传统能源企业的典型，俄罗斯石油公司在时代挑战面前锐意进取，积极投资绿色技术，在气候治理方面成为国际领先的行业公司。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货币政策 俄罗斯气候外交 俄罗斯低碳转型

【中图分类号】F1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143(2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4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 曲文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第二年，俄罗斯经济上半年已恢复至疫前水平，全年 GDP 增长率达到 4.5%，并且避免了财政货币政策过度“注水”，为俄罗斯政府在新毒株奥密克戎快速扩散、世界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后续施策保留了更多回旋余地。总统普京也对俄政府和央行的反危机举措表示满意。^①另一方面，在主要国家仍然广泛采用大水漫灌方式对抗疫情影响的背景下，俄罗斯精英们对于本国经济政策较早退出刺激模式也多有质疑。此外，2021 年全球气候议程提速，相应地，俄罗斯也加快了自身的低碳转型步伐。

一、2021 年俄罗斯经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2021 年 12 月 23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 2021 年俄罗斯主要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4.5%，其中工业生产增长 5%，加工工业增长 5.2%。实际工资增长 3.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在建筑领域，俄罗斯实现了历史上住房交付的最高纪录——9000 万平方米。由于受天气影响，2021 年的谷物产量比上年的 1.34 亿吨略有下降，为 1.23 亿吨，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不仅能够确保国内供应，而且可以保持出口潜力。此外，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达到了 6255 亿美元。普京对过去一年的俄罗斯经济表现相当满意，认为俄罗斯经济在面对新冠病毒感染挑战时，展现了更强的适应性，“与世界上许多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对这种冲击做了更好的准备”。^②

俄罗斯经济早在 2021 年 6 月便已恢复至 2019 年水平，截至年底，GDP 比 2019 年增长 1.4%，已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如果跟此前的危机比较，疫情期间俄罗斯经济表现有了很大进步。例如，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俄罗斯 GDP 下降了 7.9%，是当年 G20 国家中表现最差的一个。2020 年俄罗斯经济下降 3%，在 G20 国家中表现仅次于中国、土耳其、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尼。按照世界银行 2022 年 1 月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

① 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утин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оценил работ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ЦБ в 2021 году. 23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3280247>

② Путин подвел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тоги года для России// РИА Новости. 23 декабря 2021 г.

据，俄罗斯 2021 年 GDP 增长率尽管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5.5%）以及发达经济体（美欧日，5%）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EMDEs，6.3%）的平均增长率，但如果考虑到两年疫情期间的总体表现，特别是不包括中国的 EMDEs 预计要到 2024 年后才能达到疫情前水平，^①俄罗斯应对疫情冲击的整体表现可圈可点。

俄罗斯经济在疫情期间表现出较强韧性，结构性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全球来看，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多为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而俄罗斯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数量与规模相对较小。^②其次，大流行期间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遭到重创，全球供应链受损严重，而俄罗斯在疫情之前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较低，^③这也决定了其遭受的损失相对较轻。疫情前俄罗斯宏观经济稳健，特别是政府债务负担轻（12%）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实证分析显示，拥有稳健宏观经济指标的国家在危机期间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偿还国债的支出规模对 GDP 增长率的变化有着显著影响。国债支出每增加一个标准差，GDP 增长率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④2021 年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特别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疯涨，俄罗斯大宗出口商品价格更是暴涨，^⑤也使俄收获了额外的经济红利，出口收入大涨 42.8%，^⑥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35%，^⑦这为经济提供了强大支持。此外，疫情期间俄罗斯限制措施相对较弱，特别是当

①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4.

② 关于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参见郭连成：“俄罗斯中小企业改革发展历程与政府扶持政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97-115 页。

③ 关于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问题的研究参见张志明、曲文轶、郭一文：“俄罗斯在亚太价值链中的角色及其演变态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56-78 页；余南平、夏菁：“俄罗斯经济：结构现状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21-48 页。

④ Шохин А.Н, Акиндинова Н.В, Астров В.Ю и др.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эффекты пандем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21. No.7. С.21.

⑤ 2021 年 1-11 月乌拉尔石油的平均价格上涨至每桶 69 美元，是上年价格的 1.5 倍多。2021 年的世界钢铁价格比上年高出 40%，煤炭价格上涨一倍，小麦价格上涨 1.5 倍。参见 На Россию снова пролился нефтяной дождь. Бюджет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инвестиций на 15 крымских мосто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4 декабря 2021 г.

⑥ 2021 年 1-10 月俄罗斯最重要商品出口额为 3884 亿美元，比 2020 年同期增长近 43%。数据来自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и важнейших товаров за январь-октябрь 2021 год. <https://customs.gov.ru/folder/513>

⑦ На Россию снова пролился нефтяной дождь. Бюджет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инвестиций на 15 крымских мостов.

出现第二波大流行时，俄罗斯的社会限制非常少。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电力消耗下降幅度较小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①

当然，俄罗斯经济表现并非完美无缺。首先，2021年俄罗斯出现了价格快速上涨。据官方统计，全年物价上涨8.4%，远超过央行设定的4%目标值。居民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甚至比官方统计数据更为强烈——据公共舆论基金会（ФОМ）在12月份所做的调查，有一半的居民认为全年物价上涨接近18%。^②全俄舆情中心的调查显示，2021年俄民众频繁使用的年度热词中，第一位是“新冠疫情”（38%），第二位就是“价格上涨”（34%）。^③其次，尽管在俄罗斯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居民的实际收入上升，但这是在长期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实现的（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居民的收入已经下降了10%），这意味着居民实际收入的绝对水平仍然很低，成为制约俄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最后是人口减少。在大流行的第二年，俄罗斯发生了灾难性的人口下降。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1-10月全国死亡人数已接近200万，比2020年同期高出约20%，比2019年同期高出30%以上。由于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2021年前10个月人口减少超过80万人，这一数字是2020年同期的1.7倍，是2019年同期的3倍。^④长期以来，人口因素一直被认为是阻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俄罗斯政府为此推行各种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的措施。但自2019年起，出生率开始低于死亡率，人口再次出现绝对减少，2021年人口减少幅度进一步扩大，无疑将对长期增长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二、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的激烈争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世界各国为缓解危机，普遍采取了经济

① Шохин А.Н., Акиндинова Н.В., Астров В.Ю и др.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эффекты пандем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25.

② Ошибки в прогнозе инфляции выявят по чекам.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2022-го Росстат научит, как лучше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цены//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9 декабря 2021 г.

③ Итоги 2021 года и ожидания от 2022-го. 24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wciom.ru/analytical-reviews/analiticheskii-obzor/itogi-2021-goda-i-ozhidaniya-ot-2022-go>

④ В России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рекордное за новейшую историю сокращ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4 декабря 2021 г.

扶持措施。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俄罗斯政府尽管也推出了经济救助和刺激政策，但总体规模相对不大。

普京在 2021 年 9 月上合组织国家元首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支持居民和企业的一揽子措施总计约合 3 万亿卢布，约占 GDP 的 4.5%。而据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专家估计，美国的反危机措施的成本为 2.6 万亿美元，占到该国 GDP 的 12.4%；英国的反危机支出估计为 4390 亿美元，占该国 GDP 的 16%。另外，俄经济发展部部长表示，俄罗斯为企业提供直接财务援助和降低成本 350 亿美元，而盖达尔研究所创新经济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泽姆佐夫（С. Земцов）指出，发达国家对于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要比俄罗斯高 2-3 倍。因此，有俄罗斯专家抱怨俄罗斯政府对于本国居民的社会支付水平过低。当然，经济支持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总体规模，还取决于提供的形式。与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政府通过许多互补渠道对经济支持进行分配，包括对企业的金融税收优惠以及对居民的经济救济。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区别，主要在于拒绝无条件向全民发放救济，而社会扶持重点面向儿童。俄罗斯劳动部部长 2021 年 12 月 7 日在议会作证时也指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俄罗斯政府把对民众社会支持的重点放到了儿童身上，其中包括数百万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过去两年，俄罗斯政府一次性支付 1.1 万亿卢布用于支持有孩子的家庭，俄罗斯 1/4 的儿童获得了额外的国家援助。2020 年政府向有孩家庭（共养育 2800 万儿童）拨款超过了 8500 亿卢布，2021 年近 2100 万学龄儿童的父母获得了 2100 亿卢布的一次性援助。^①

2021 年俄罗斯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改变。由于过去 30 年俄罗斯长期处于高通胀之中，在危机爆发期间，俄货币当局通常会收紧货币政策。但 2020 年反危机政策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俄罗斯央行首次转向逆周期政策，即在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开始降低利率，并在全年保持了低利率，这成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重要指标。^②进入 2021 年，在新冠疫情尚未结束、多数

①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 Антикризисн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обогатила миллиардеров и разогнала инфляцию//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7 декабря 2021 г.

② Мау В.А.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и тренд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21. No.3. С.5-30.

国家仍在维持“大水漫灌”刺激政策的背景下，^①俄罗斯货币政策却转向了紧缩模式。2021年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宣布降息周期（2020年俄央行四次降息）结束，并表示将上调基准利率。4月将基准利率从4.25%恢复到5%，此后又连续加息，到12月17日，俄罗斯央行连续第七次提高基准利率，将其上调至年率8.5%，达到了2017年秋季以来的最高点。^②在财政政策领域也观察到类似的收缩动向。俄财政部部长西卢阿诺夫在2021年年初就表示，俄财政政策将在2022年前回归正常。^③俄罗斯政府通过的预算方案也要求从2021年开始降低预算支出（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21.1%下调至18.6%，赤字从4.4%下调至2.4%）。^④事实上，2021年前三个季度预算收入总体增加了4.7万亿卢布，同时联邦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不到1.5万亿卢布，国家支出（包括社会政策、医疗保健和预算间转移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3%。^⑤

尽管俄罗斯总统对2021年政府和央行政策的效果表示满意，但学者们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刺激政策较早进入退出模式却产生了激烈争论。

（一）平衡预算 vs. 逆周期调节

俄罗斯长期坚持平衡预算原则，并且为降低对油价的依赖，还设立国民福利基金对石油收入进行调节，以避免油价波动冲击国内经济稳定。^⑥新冠危机表明，财政政策机制对于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和适应外部冲击具有特殊价

① 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用了8年才达到这一增幅。美联储在缩减购债前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央行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年3月（2021年7月购债870亿欧元）。美欧日三方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此外，主要央行均执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参见张宇燕：“疫情应对政策的多重效用——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上）”，《经济日报》，2022年1月3日。

② 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утин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оценил работ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ЦБ в 2021 году.

③ “俄财政政策将在2022年前回归正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1年2月1日。

④ Что нужно знать о бюджете на 2021 год. Разбираемся в цифрах// Tass. 9 декабря 2020 г.

⑤ На Россию снова пролился нефтяной дождь. Бюджет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инвестиций на 15 крымских мостов.

⑥ 丁超：“制裁背景下俄罗斯财政政策的演化逻辑与未来方向：以预算规则为线索”，《欧亚经济》，2020年第3期；殷红：“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的建立及意义”，《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3期。

值。其实早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发达国家的利率触底却不见成效，世界各国就开始转向把预算政策作为主要的反危机工具。过去 10 年，欧元区与美国都奉行超软货币政策，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接催生了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膨胀，实体部门却未见显著增长。2020 年疫情初期，俄罗斯央行大幅降低再融资利率也导致了相似的结果。对于俄罗斯而言，这场疫情危机揭示出传统的平衡预算规则并不完全符合当前面临的威胁结构，因此在疫情危机的严重阶段，俄政府不得不放弃财政限制而使用一次性的收入补偿。而传统的财政原则尽管能使俄罗斯免受油价飙升的影响，但却无法像 2020 年那样有效地应对危机。因此，有俄罗斯学者提出，应该考虑加强财政规则的反周期性，不仅要考虑油价，还要考虑经济活动的其他因素。例如，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奥地利维也纳）高级经济学家阿斯特罗夫（В.Ю. Астров）提出，可以在财政中包含一个额外的组成部分，规定在总体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动用，而在良好状态下则被动持有；或者，制定范围广泛的具有资金限制的反危机措施，政府可以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迅速采取这些措施。俄罗斯储蓄银行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扎穆林（О.А. Замулин）也认为，应预先规定在危机时期增加预算支出作为一种反周期工具的可能性，其次应该使预算政策更具可操作性，提前预备项目包，以使反危机政策与长期发展政策相结合（例如，将未来几年的项目提前至当下实施）。^①

（二）控制通胀 vs. 加速增长

俄罗斯央行从 2016 年起将通胀率 4% 确定为货币政策目标。2020 年年底，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就提及上调利率的可能性，主要理由就是当时通胀加速，以及与央行预期相比，2020 年 GDP 下降幅度较小。^②进入 2021 年，伴随经济逐渐恢复以及国内通胀加速，俄罗斯央行七次上调了基准利率。纳比乌琳娜在 2021 年 11 月 18 日的议会演讲中表示，提高利率就是为了控制通胀。“现在的挑战是从复苏转向可持续增长。为此，有必要抑制疫情流行

① Шохин А.Н., Акиндинова Н.В., Астров В.Ю. и др.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эффекты пандем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5-30.

② Екатерина Шохина. Денежно-кредит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будет мягкой. По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тся, процентные ставки останутся низкими, обещает Банк России. 26 ноября 2020. <https://www.vedomosti.ru/finance/articles/2020/11/25/848292-denezhno-kreditnaya-politika-budet-myagkoi>

造成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应对通货膨胀的飙升。这就是我们现在政策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提高利率的原因。”^①加息的根本理由，是低利率政策存在风险，即形成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泡沫。一些专家也认为，低利率的风险已经超过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好处。例如，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科甘（Е. Коган）认为，利率低于通胀率后，资本会大量外流，黄金和外汇储备枯竭，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土耳其的悲惨经历证明，玩弄利率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俄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主席阿克萨科夫（А. Аксаков）指出，低利率导致银行储户流失已成为银行的一大难题。尽管低利率会使资本市场获得不错的资源，包括经济发展的长期资源，但另一方面，信贷机构的资源基础正在减弱，而这会减少贷款，资金外流的后果是亏损银行的数量增加乃至部分可能会被迫退出市场。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ЦСР）副主任卡普林斯卡娅（Д. Каплинская）则指出，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是因为存在制度性因素（高水平的投资者权利保护，保证法律框架和税收政策的不变性等）的支持，因此，即使不谈论风险，软货币政策本身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投资需求增长的驱动力与其说是经济中的利率水平，不如说是透明和可预测的制度环境，以及市场参与者对未来商业环境稳定性的信心。”^②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对央行加息以及过早退出刺激政策提出了质疑。第一，俄国内通货膨胀是世界价格上涨的结果，通胀前景更多地取决于限制价格和食品出口增长的行政措施，而不是货币监管机构。如果通过加息来对抗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则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第二，2021 年货币政策收紧将叠加紧缩税收政策，从而使经济增长环境恶化。俄罗斯与许多国家情况根本不同，财政政策已经趋紧，表现为提高个人税收（引入累进利润税、对存款收入征税）和企业部门税收（冶金公司税收负担的增加）。即使由于抗议活动激增，政府扩大了社会援助计划，但政府的长期优先事项仍然是确保低油价下的预算平衡，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因此，与通过财政政策刺激复苏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俄罗斯不仅在 2021 年而且在随后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Лосев. Монет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ли фискальная рефляция. 30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097906>

② Екатерина Шохина. Денежно-кредит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будет мягкой. По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тся, процентные ставки останутся низкими, обещает Банк России.

几年都将面临紧缩的财政政策，在此情况下，加息将抑制经济增长。^①第三，维持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加速增长的需要。俄罗斯财政部金融研究所、经济专家组负责人古尔维奇（Е. Гурвич）认为，单单摆脱危机并稳定经济是不够的，对于俄罗斯而言，更为关键的是如何确保长期、高质量的增长。而在现有保守的平衡预算规则之下，即便使用国家福利基金，也不可能取得显著效果。在现行规则框架内，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可能维持在 2% 左右，中期来看，俄罗斯经济增速将落后于全球。为使俄罗斯经济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率，必须通过实施国家项目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些项目和目标的落实需要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②

（三）政府债务的市场发行 vs. 央行购买

支持增长优先的专家们尽管普遍反对过早退出刺激政策（尤其是提高利率），主张扩大政府开支，但对于如何进行政府融资却存在分歧。一派支持政府举债，但反对央行购买。著名经济学家、联邦总统下属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马乌（В.А. Мау）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为了加速经济增长，政府投资进而增加政府债务是必要的，但他反对通过央行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弥补预算赤字，因为“预算赤字货币化”会导致通货膨胀。^③实践中，俄罗斯政府遵循的也是这一派的观点。例如，2020 年政府的反危机支出主要是通过增加国债来筹集资金，因此，2020 年联邦债券的净发行量比 2019 年增加了两倍多。但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政府债券数量在 2020 年甚至有所下降，不到俄罗斯联邦国内政府债务总额的 2%。^④

另一派则主张由央行来购买政府债务。首先，疫情期间全球债务规模显著增长，甚至超过了二战时期的巅峰水平。在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实际上成

① Монет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Ф - Ориентируясь на прошлое, упуская будущее? 19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www.finam.ru/analysis/forecasts/monetarnaya-politika-rf-orientiruyas-na-proshloe-upuskaya-budushee-20210219-180644/>

② Шохин А.Н, Акиндинова Н.В, Астров В.Ю и др.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эффекты пандем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5-30.

③ Мау В.А.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и тренд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21. No.3. С.5-30.

④ Ершов М.В. Мир 2021: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острота пандем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21. No.12. С.5-20.

了最后贷款人，央行不仅购买国家政府证券，还包括其他资产，甚至是低质量的公司证券。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在没有造成不稳定影响的情况下重振了金融市场。在经济活动低迷的背景下，拒绝使用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采用的重要机制，将限制预算支出、内需和经济增长的融资，使国内公司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影响它们的竞争机会。俄罗斯政府下属财政金融大学教授、能源与金融研究所主任叶尔绍夫（М. Ершов）因此主张，“重要的是不要削减成本，也不要硬化经营条件，而是要像我们的竞争对手一样，利用预算和货币政策的潜力，以便更有效地化解风险并扩大经济增长的机会”。其次，俄罗斯的做法，即主要面向国内银行的政府证券发行机制，实际上是从私营部门吸取资金，对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再次，俄罗斯经济目前急需投资来刺激增长。随着央行关键利率的提高，借入资金的价格将上涨。因此，俄罗斯央行购买联邦债券可以释放私营部门的资金，并有助于降低非金融公司的利率。^①最后，紧缩政策的隐含前提并不存在。俄罗斯较早退出刺激模式，是担心陷入外债泥潭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②这种恐惧与历史有关，是1998年危机的后遗症。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就是国家短期债券的买家，这被认为是导致199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叶尔绍夫认为，现在和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形势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1998年危机之前，非居民在政府短期债券市场的份额总计约占50%。同时，整个短期债券市场的规模不过600亿美元，由于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化程度低，短期债券市场的主要支撑是国外资源，再加上市场高度自由化，几乎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限制资金从国家流出，而国际储备也只有100亿美元，这使得金融市场极不稳定，相对较少的资金流动就可能对其造成极大的破坏。但目前的俄罗斯经济情况显然要好得多，尤其是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数量几乎是最低要求的七倍（按照国际标准应该涵盖该国三个月的进口量），整个金融市场的深度也提高了很多，而且非居民在联邦债券市场的份额只有20%-30%。总而言之，借助领先经济体多年来积极运用的机制，可以有效解

① Ершов М.В. Мир 2021: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острота пандем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② Макаров И.А., Простаков И.В., Белоусов Д.Р., Григорьев Л.М., Синявская О.В. Уроки выхода из кризисов последнего столети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21. No.8. С.70.

决公共债务融资问题。各国央行正在积极购买公共债务，俄罗斯银行也可以成为俄罗斯政府债务的买家。^①

三、气候行动迈出实质步伐

俄罗斯于 2016 年 4 月签署并于 2019 年 9 月批准了《巴黎协定》。疫情期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于 2020 年 3 月制定了 2050 年前长期发展战略，提出了俄罗斯低碳发展目标。基准目标是到 2030 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降低三分之一（与 1990 年相比），高目标则是在 21 世纪末达到碳中和。俄罗斯的气候行动并不算积极，在经济发展部提出气候政策目标前，已有 14 个国家和欧盟制定了长期低碳发展战略，而且横向比较，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提出的气候目标比较保守。美国的气候战略要求到 2050 年（与 2005 年相比）减少 80% 或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日本提出到 2050 年比 1990 年减少 80% 的排放，欧盟的目标则是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气候与能源计划负责人科科林（А. Кокорин）认为，俄罗斯在基准情景下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前景相当渺茫，并认为俄提出的 2030 年和 2050 年减排目标可能会招致环保组织的批评。事实上，2020 年年初绿色和平组织就曾呼吁俄罗斯联邦实施“1.5 度”方案，即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②

经济发展部提出的减排目标尽管看起来并不那么“野心勃勃”，但考虑到俄罗斯是世界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能源燃料产业在其总产值中的占比达到了 25%，在出口中占到了 50%，减排承诺还是给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施加了强力约束。2021 年，伴随全球气候议程加速，俄罗斯的低碳转型也迈出了实质步伐。

（一）发布减排承诺，明确碳中和目标

2021 年 7 月，俄首部气候领域的专门法律《2050 年前限制温室气体排

① Ершов М.В. Мир 2021: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острота пандем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С.17.

② России прописали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е будущее. Минэкономики разработало стратегию развития РФ с низкими парниковыми выбросами. 23 марта 2020 г. <https://www.kommer sant.ru/doc/4299377>

放法》终于在将近三年的酝酿后签署生效。该法确立了俄罗斯主要的减排目标，其中设定的基准情景规定，2030年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降至1990年水平的2/3，比之前降至3/4的目标更进一步。^①

2021年10月29日俄联邦政府正式批准了经济发展部牵头制定的《2050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低碳发展战略》（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до 2050 года，以下简称《战略》）。与2020年3月经济发展部提出的四种发展情形不同，该文件只给出了两种情形的评估。第一种是惯性方案，保持现有的经济模式，包括保持现有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战略》认为此种发展模式下无法达到碳中和目标。第二种是集约发展模式，也是俄罗斯政府的目标方案，其主要任务是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条件下，确保俄罗斯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增长；确保将国际气候减排目标，与国家向低碳技术转型的经济机遇以及国家社会经济利益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战略》中提出的2024-2026年基础设施更新的主要参数，已经确定并被列入国家纲要和国家项目。目标方案所规定的额外减排措施，是根据投资回报原则做出的选择。具体而言，俄罗斯的减排目标是：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30%，并且不晚于2060年实现人为排放与吸收的中和；具体指标是2030年净排放16.73亿吨碳当量（排放22.12亿吨，吸收5.39亿吨），2050年净排放则下降为6.3亿吨（排放18.3亿吨，吸收12亿吨）。

除了提出减排目标，《战略》还对集约方案下的技术发展、结构转变、吸收能力、降低能耗、实施措施、监控机制和实现指标等方面做出了评估。据估算，2022-2030年为降低净排放的总投资平均将占到GDP的1%，2031-2050年则提升至1.5%-2%，而通过乘数效应，这些投资将刺激俄罗斯经济在低碳轨道上保持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增长。

《战略》包括针对能源、工业、住宅和公共服务、运输、建筑、废物处理、农业和林业等部门的具体措施。俄罗斯政府承诺将支持低碳和零碳技术的采用、复制和推广，刺激二次能源的使用，调整税收、关税以及预算政策，

^① 尚月、韩奕琛：“应对迈向碳中和时代的挑战：俄罗斯的绿色新政”，《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0期。

发展绿色金融，保护、增加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碳吸收能力，支持温室气体捕获利用技术。总理米舒斯京在签发的批准文件中，还要求国有企业根据国家低碳战略制定自己的低碳发展目标。^①

（二）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取得有利的低碳发展条件

2021年11月11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在出席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届缔约方会议期间发表讲话，提出俄方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主要诉求：（1）技术中立原则，反对歧视核电和水电技术。（2）碳单位的互认和自由流通。（3）反对对气候项目施加单边限制。（4）形成森林项目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机制。按照列舍特尼科夫的说法，俄罗斯始终对气候议程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并乐意接受任何建设性的建议。

普京总统对于格拉斯哥气候会议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与会者为进一步推进气候日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说：“格拉斯哥会议的目标已经实现，成功协调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重要的是，这些决定是平衡的和可执行的，并且正在实施。”俄罗斯对于这次气候会议持肯定态度，与其提出的气候诉求得到正面回应有关。首先，格拉斯哥会议就实施《巴黎协定》的具体机制达成了一致——各国之间碳交易的市场机制正在启动，并且已经商定了对该国有利的条件，例如，森林项目实施的最长期限延长了30年（从15年延长到45年）。鉴于俄罗斯拥有全世界20%的林业资源，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项重大利好。其次，就煤炭问题达成了平衡的决定。此前，多国呼吁尽早淘汰燃煤发电，而会议的结果是同意减少煤炭发电，且前提是生产设施未安装减排技术。由于俄罗斯富产煤炭，这对于俄罗斯企业和地区而言，是实现煤炭产能现代化和煤炭依赖地区经济多元化的时间储备。再次，在最终决议中保留了更有利可图的化石燃料解决方案，这将降低限制石油和天然气部门投资的威胁，并使得出口市场开放。^②最后，这次会议在核能是实现

① 参见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9 октября 2021 г. № 3052-р.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до 2050 года.

② Максим Решетников: итог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Глазго - выгодные для России. 24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maksim_reshetnikov_i_togi_klimaticheskoy_konferencii_v_glazgo_vygodnye_dlya_rossii.html

全球碳中和的重要工具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①从而为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俄罗斯核电出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总而言之，按照列舍特尼科夫的说法，经过这次气候峰会，俄罗斯成功避免了世界气候日程对自身发展的威胁，确保了俄罗斯的经济、出口、投资，以及工作安全。^②

（三）政策方面，推出气候治理工具，开始低碳转型的地区试点

除了战略和外交层面，俄罗斯在政策实践层面也已着手建立国家气候监管体系，2021年启动了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地区试验。

2021年1月，萨哈林州被选为试点地区，以创建碳交易系统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系统，并将创建支持气候项目的必要基础设施。作为试验的结果，该地区应在2025年年底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俄罗斯当局对萨哈林州的温室气体进行了清查：二氧化碳(CO₂)排放量为1230万吨，吸收量为1110万吨。排放量和吸收量之差约为10%，即120万吨。需要减少这一数量以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目标，俄当局计划到2025年，将当地的145座锅炉房由煤改气，并将使用燃气和电力的运输份额提高到50%。还计划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并启动氢生产集群。碳配额的交易将根据欧洲贸易体系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平均成本和配额的平均价格来计算。此外，该试验还规定此地区被监管组织要向授权机构提交碳报告，并遵守排放配额的强制要求。为了对碳报告和气候项目文件进行验证，将成立专门机构来处理对验证者资质的审定。此外，该试验还将创建独立确定温室气体吸收的机制，并阐明国家清单中使用的方法。萨哈林州碳试验最重要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区域性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并在外交部的协助下将其与国际贸易体系整合起来。萨哈林州试验成功后，俄罗斯政府计划将其扩展到其他地区。截至2021年年底，另外四个地区——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和加里宁格勒州也表示对创建碳交易市场感兴趣。^③

① Делегация Росатома приняла участие в 26-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ООН по изменению климата в Глазго. 12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rosatom.ru/journalist/news/delegatsiya-gos-atoma-prinyala-uchastie-v-26-y-konferentsii-oon-po-izmeneniyu-klimata-v-glazgo/>

② Максим Решетников: итог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Глазго - выгодные для России.

③ РБК: Четыре региона стали претендентами на торговлю парниковыми квотами. 7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www.rbc.ru/rbcfreeneews/61aeea2d9a7947a1d8a9738a>

（四）企业层面，“俄罗斯石油公司”成为绿色发展的先锋样板

为实现低碳转型目标，俄罗斯政府要求国有企业率先承担起减排任务。作为俄罗斯战略产业领袖企业、同时又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典型代表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以下简称“俄油”公司）成为积极迎接挑战、紧跟低碳转型步伐的典型代表。

俄油公司是俄罗斯第一家制定碳中和长期目标的企业。为了在能源转型时代保持自己作为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有效引擎”，该公司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环境战略。其基础是到 2035 年的碳管理计划，涵盖可持续发展、减排和废物管理、能源效率、低碳项目的实施、复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司的碳管理计划目标，是将勘探和开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0%，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000 万吨。还设定了伴生气零燃烧并减少甲烷排放的目标。^①该公司过去 3 年的“绿色”投资已达到约 1200 亿卢布。未来 5 年，计划在环保项目上投资 3000 亿卢布。这些资金中约有 30% 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前，绿色投资约占总投资计划的 5%（远远高于俄政府气候战略中提出的 1%-2% 的指标），并且预计这一份额在未来还会增长。

该公司已经为**森林**对温室气体的自然利用过程做出了贡献，每年在其活动区域种植幼树。在过去 3 年中，俄罗斯石油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俄罗斯各地种植了约 350 万棵树，还设定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到 2035 年释放俄罗斯森林的吸收能力并制定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和森林生态系统维护计划，以抵消碳排放。**节能**计划包括提高电力、热力和燃料生产效率、设备优化和现代化等目标，为减少俄罗斯石油企业的碳足迹做出了贡献。自 2014 年以来，其实施的经济效应达 390 亿卢布，节省了超过 640 万吨燃料当量。2021-2025 年节能计划规定节约标准燃料 260 万吨，按货币计算将达到 374 亿卢布。为了**减少排放**，俄油公司正在引入可再生能源的解决方案。太阳能用于为石油生产的通信基础设施供电。在下游领域，该公司正在试验为俄罗斯南部地区的零售点供应太阳能电池板，并在印度的一家炼油厂生产可再生电力。俄油公司正在改变生产结构，以支持**更环保的产品**，增加天然气产量

^① Игорь Сечин.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оставок нефти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угрозой из-за недостатка инвестиц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21. No.6. С.96-103

及其份额。2013-2020年，天然气产量增长了1.6倍，达到628亿立方米/年。2020年年底，天然气占比超过20%，计划到2022年年底将天然气在公司总投资组合中的份额提高到25%。作为其天然气计划的一部分，俄油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伴生石油气的利用率提高到95%。同时，在碳管理计划的框架内，计划实现伴生气的零常规燃烧。在下游部门，正在开发低碳解决方案，包括开发具有改善环境性能的**改进燃料**。公司正在系统地增加更为环保的Euro-6汽油的产量。到2020年年底，Euro-6汽油在俄罗斯11个地区的750多个加油站销售。该公司的一家子公司每年在德国各地的炼油厂和众多终端混合超过50万吨生物燃料，为德国、波兰和奥地利的客户提供含有生物成分的燃料。2021年，俄油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BP）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将两家公司多年合作的经验应用于可持续发展领域。正在联手制定行业特定的碳管理方法和标准，包括减少和防止甲烷排放以及应用能效技术的举措。与BP互动的最重要方面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计划将在2028年左右试点实施CCUS技术解决方案。

俄油公司大规模低碳项目的一个样本是“东方石油”。该项目的碳足迹是大型新矿床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公司领导人谢钦认为，该项目符合绿色标准，生产的石油是真正的“绿桶”。^①俄油公司的环境努力得到了世界经济界的高度赞赏。该公司继续巩固其在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中作为俄罗斯最佳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的地位。尤其是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将该公司的评级上调至3.9分（满分5分），在行业分类指数（ICB）中领先于国际油气行业84%的参与者。公司在气候和水资源类别的国际CDP评级^②中名列前茅，甚至在全球企业CHRB评级中占据较高地位，是俄罗斯企业中保护人权指数最高的公司。^③随着评级指标的上调，俄油公司对投资

① Игорь Сечин.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оставок нефти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угрозой из-за недостатка инвестиций.

② 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前身为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简称CDP）。CDP已发展为碳排放披露方法论和企业流程的经典标准。参见“2021年CDP气候变化成绩：中国企业热情高涨，领导力不足”，<https://new.qq.com/omn/20211230/20211230A0C2FI00.html>

③ Наше дело правое. «Роснефть» стала лучш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е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рейтинге CHRB в области соблюдения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23 декабря 2019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205663>

者的吸引力增长，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俄油公司的资本金首次达到 820 亿美元，公司股票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价值再次突破历史最高水平。^①

国际上，截至 2021 年 12 月，超过 60 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 80% 以上）表达了在未来几十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望，其中包括加拿大、日本、韩国、欧盟、新西兰和英国在内的近 2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将其承诺写入法律，另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40 多个国家已将其碳中和计划纳入官方政策和战略文件中。^②这表明，在多年旁观和迟疑之后，^③在气候政策的全球覆盖面和雄心不断扩大的 2021 年，俄罗斯终于下定决心加入低碳转型的大潮，成为全球领先团队中的一员。当然，俄罗斯远非气候议程的领导者，其低碳政策行动（无论是减排雄心还是具体政策工具的实施）相比欧盟仍相距甚远，就算与中国相比，也被拉下了好几个身位。以最核心的政策工具碳定价为例，2021 年俄罗斯刚刚启动了在萨哈林州一地的试验，而我国已经在七地 8 年的试验后启动了全国的碳交易市场。

四、结语

在新冠疫情仍然肆虐的 2021 年，俄罗斯经济已经超越了疫前水平，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相比多数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要到 2024 年后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仍旧维持高负债、负利率的刺激政策，俄罗斯在保持财政稳健（前三个季度财政盈余占 GDP 的 1.7%）并收紧货币政策（七次加息）的条件下恢复了增长，这一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另一方面，俄罗斯较早退出经济刺激模式^④也引发了争议。在世界输入性通胀的背景下，央行的加息被认为无助于抑制通胀（事实上通胀也远超过央行设定的

① «Роснефть» презентовала концепцию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21. No.3. С.72-75.

② “Russia Economic Report”, World Bank, December 2021, www.worldbank.org

③ 徐博、仲芮：“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东北亚论坛》，2022 年第 1 期，第 36-48 页。

④ 2021 年，主要国家中多数央行均执行超级宽松的 low 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只有少数国家，如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为控制通胀采取了加息行动。参见张宇燕：“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下）”，《经济日报》，2022 年 1 月 5 日。

目标），僵化的财政规则也无法适应疫情期间逆周期调节的需要。因此，有学者主张维持宽松的宏观政策，通过扩大政府债务，甚至是由央行购买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加速经济增长。此外，在全球气候议程加速的背景下，2021年俄罗斯的低碳转型也迈出了实质步伐。俄政府批准了2050年前低碳发展战略，明确了2060年碳中和目标，还积极开展气候外交，为本国争取有利的低碳发展条件。实践层面，选择萨哈林州进行区域脱碳试验，启动了碳交易市场，以及其他气候治理的基础设施。俄政府还利用国有企业推进低碳转型进程，要求它们制定自己的气候目标。作为传统能源企业的典型，俄罗斯石油公司在时代挑战面前锐意进取，积极投资绿色技术，在气候治理方面成为国际领先的行业公司。

过去一年（2021）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整体实力一落千丈，20世纪90年代深陷转型危机，又先后三次因外部冲击而陷入危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4年以来的制裁危机），疫情前（2014-2019年）经济已经陷入停滞（年均增长不足1%），暴露出俄罗斯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发展动力不足。但这次疫情危机表明，转型30年后，特别是在长期受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已经适应了新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对外依赖性下降，在更接近于战争而非经济周期冲击的瘟疫面前，显示了较高的动员能力和抗冲击能力。^①当然，这种较强韧性因其开放程度较低，并不利于创新和发展，因此可以说，俄罗斯经济具有“稳定有余、发展不足”的鲜明特性。

此外，俄罗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疫情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其次，如前所述，通胀高企、居民收入仍旧很低以及人口危机，均为中长期发展蒙上了阴影。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发挥着制约作用。一是低碳转型的挑战。世界银行在2021年12月1日发布的报告估计，全球“绿色”转型确定无疑会降低化石燃料资源的价值，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到2050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价值可能会下降4000亿美元（以2018年的价格计算）。^②二是地缘政治因素。自乌克兰危机以来，

① Май В.А.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и тренд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С.5-30.

② РБК: Всемирный банк разработал 4 сценария потерь России от «зеле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1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www.rbc.ru/economics/01/12/2021/61a6502d9a79471618b9b6c3>

俄罗斯与欧美关系紧张以及制裁战，恶化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近期，因乌克兰东部局势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对峙再度升级。此外，2022年初集安组织出兵哈萨克斯坦帮助恢复哈国内政局，在提升俄罗斯影响力的同时，西方对于普京试图“恢复苏联”的担忧也随之增加。在新技术浪潮汹涌、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上述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俄罗斯经济尽管能够维持一定水平的稳定和增长，但对于高质量发展而言，仍前路漫漫。

【Abstract】 In 2021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was still raging, Russian economy has surpassed its pre-pandemic level and returned to the normal orbit. Compared with most emerging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will not be able to resume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until after 2024, and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still adhere to high-debt and negative interest rate stimulus policies, Russia is recovering its economic growth while maintaining fiscal stability and tightening monetary policies. It is not easy to achieve this achie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Russia took the lead in exiting from the economic stimulus mode which has also caused controversy. In the context of imported inflation in the world, the central bank's raising interest rates is considered unhelpful to curb inflation, and rigid fiscal rules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counter-cyclical adjustment during the pandemic either. Therefore, some scholars advocate maintaining loose macro policies and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creasing government debts or even financing by central bank purchases. In 2021 Russia has also taken substantial steps in low-carbon transiti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s approved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strategy before 2050, clarified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in 2060,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climate diplomacy to strive for favorable low-carbo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Practically, the Sakhalin region was selected for regional decarbonization experiment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s also taken advantag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advance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process, requiring them to set their own climate goals.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raditional energy companies, Rosneft has forged ahead against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actively invested in green technologies, and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eading industry company in clim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Russian Economy, Russian Monetary Policy, Russian Climate Diplomacy, Russian Low Carbon Transi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21 году, когда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ещё бушевал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еодолела доэпидем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и вернулась в русло норм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большинством стран с формирующейся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и развивающимися страна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вернутся к доэпидемическому уровню до 2024 года, а развитые страны Запада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водят политику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с высоким уровнем долга 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ми процентными ставками, Россия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при условии сохранения фиск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ужесточения денежно-креди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Так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доби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первый выход России из режи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вызвал споры. В условиях импортируемой инфляции в мире повышение процентных ставок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банком считается бесполезным для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инфляции, а жёсткие фискальные правила не могут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ь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 антициклической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е во время эпидемии, поэтому некоторые учёные выступают за сохранение мягкой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за счёт увелич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долга или даже покупок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банком для ускор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 переходе России к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в 2021 году также были предприняты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шаг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утвердило стратегию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о 2050 года, уточнило цель достижения углеродной нейтральности к 2060 году и активно проводило климатическ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стремясь создать для страны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по декарбонизации была выбрана

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также использовал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процесса перехода к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ым технологиям, требуя от них постановки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целей в сфере климата. Являясь типичным примером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Роснефть» вырвалась вперёд перед лицом вызовов времени, активно инвестировала в «зелё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ста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ведущей отраслевой компанией в област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лимат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денежно-кредит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лима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ереход на низкоуглерод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2021年的俄罗斯外交：再平衡中的新调适*

万青松**

【内容提要】2021年是俄罗斯外交识变、应变、求变的关键一年，既要为国内进入新发展阶段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应对世纪疫情与全球变局叠加背景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两者的相互交织，使得俄罗斯外交更加主动地寻求多维度的“再平衡”，主要包括：在对西方外交向度，重点寻求“破与立”的再平衡；在对东方外交向度，重点寻求“软与硬”的再平衡；在扩充外交工具方面，重点寻求“新与旧”的再平衡。整体而言，俄罗斯这种因应国内外形势发展而进行的“再平衡”调适还在不断摸索之中，没有最后定型，其发展方向、内容和策略将会根据形势发展而有所调整。展望未来，俄罗斯外交还将继续践行“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危与机”辩证法。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再平衡 俄美关系 俄欧关系 俄罗斯外交新工具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1-0164(29)

2021年既是苏联解体30周年，也是俄罗斯经过30年转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局之年。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敏锐地捕捉到世界政治进程正

*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专项课题《“一带一路”与欧亚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构建》（项目编号：ECNU-BRGD-2021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许佳晖同学提供部分英文参考材料。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万青松，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市高校智库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在发生的新的历史大变局；身处新发展阶段的俄罗斯执政精英也在生逢历史巨变之际，努力寻求本国在新历史中的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2021 年可以被视为俄罗斯外交识变、应变、求变的关键一年。

一、正在成形中的俄罗斯外交“再平衡”新构想

2021 年，俄罗斯外交继续让世界印象深刻：不仅勾勒出本国对外政策的最新主张，^①向世界发出新的信号，也从过去相对被动地应对变局，转向更加主动地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形势，更好地服务于国内新发展阶段的需要。俄罗斯外交的这些变化，与其逐渐成形的“再平衡”新构想有密切关联。

（一）理解“再平衡”与调适“几何学”

“平衡”是一个频繁使用在国际关系语境中的术语。需要指出的是，在英文中，常用 balance 与 equilibrium 来表示“平衡”的意思，balance 更多强调使用力量去平衡，equilibrium 则强调平衡的状态或体系。^②两个词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也被频繁使用，比如，使用 balance 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包

① 2021 年有关俄罗斯外交方针比较重要的官方公开阐述包括：4 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中关于外交方针的阐述；6 月，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7 月，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10 月，俄总统普京在第 18 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长篇讲话；11 月，普京在俄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相关内容参见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и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21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6794>;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О праве, правах и правилах//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1. Т.19. №.4. С.7-20;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 июля 2021 г. №.400). <http://static.kremlin.ru/media/events/files/ru/QZw6hSk5z9gWq0plD1ZzmR5cER0g5tZC.pdf>;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VIII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1 октября 2021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communi-ty_meetings/66975;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коллег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18 ноября 2021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123>. 有俄罗斯专家分析指出，这些阐述将构成即将发布的新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的主要内容。Сергей Жильцов. Как Росси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 ответит на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ый курс Запад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1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ng.ru/kart-blansh/2021-11-21/38306kb.html>

② balance 和 quilibrium 的具体含义参考新牛津英汉双解词典（app）；剑桥词典：<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s>；朗文当代英英词典：<https://www.ldoceonline.com>

括：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的“权力平衡论”（balance of power）^①；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提出的“威胁平衡论”（balance of threat）^②；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提出的“利益平衡论”（balance of interest）^③。

而均势战略大师基辛格在《论世界秩序》一书中表达“平衡”的含义时，多使用 equilibrium 一词。^④基辛格的表达显示出一个原则：平衡（也有译为“均衡”）的使用，还包含伦理道德要求的基准，这意味着平衡并不是无原则无底线的妥协。^⑤在 2021 年 4 月出版的专著《新的均势：寻求对外政策平衡的俄罗斯》中，作者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也像基辛格一样，对表达“平衡”的两个俄语词 равновесие（equilibrium）和 баланс（balance）进行了内涵界定。在描述 21 世纪俄罗斯的“平衡”战略构想时，特列宁也更倾向于用 равновесие 一词。^⑥

基于上述界定，本文的“平衡”（equilibrium）不仅仅是指简单的数量关系和力量格局的平衡，而是包含复杂动态变化、具有更高层次要求、更为讲究内在质量、更注重内涵、更富有伦理道德等多重含义的“均衡”。“再平衡”进而可以理解为数量与质量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能力与意愿之间、近期与远期之间、发展与安全之间等多维度的均衡。

“调适”可以理解为“调整使适应”，而调适之所以被需要，借用著名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加迪斯的话说，是由于“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② 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美]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译，刘丰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③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 Vol.19, No.1, pp.72-107.

④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美]亨利·基辛格：《论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⑤ 冯绍雷：“‘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学术与理论构建”，载冯绍雷主编：《让梦想照进现实：“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⑥ Тренин Д. Новый баланс сил: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вновесия. М.: Альпина Паблицер, 2021.

而应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互相适应和配合，尤其要防止两者脱节”^①。

“再平衡”需要理性策略、及时高超的灵活度和不断“手动治理”的应对能力，“调适”不仅可以是一个持续且不断纠偏的进程，而且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②综上所述，“再平衡”调适是摆在各国外交面前的一门更加复杂的“几何学”。

（二）逐渐成形的俄罗斯外交“再平衡”新构想

俄罗斯，作为地缘政治平衡的“老手”，其平衡战略在世界政治历史长河中屡试不爽。19 世纪初，沙皇俄国参与构建的欧洲国际均势体系（维也纳体系），使得 1814 年之后的欧洲维持了未发生全面战争的百年和平；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构建起来的以美苏两极格局为主的雅尔塔体系，其所创导的国际体制迄今依然是国际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虽然苏联解体这样的“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使俄罗斯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其平衡的外交战略依然运用在国际舞台，并有力地维护着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从时任俄外长的普里马科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多极世界”全球战略平衡构想，到普京上台后推行的务实主义多方位大国外交，实际上也都运用了平衡策略，普京也被公认为大师级的地缘政治“平衡手”。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正在成形的俄罗斯外交“再平衡”新构想。之所以被称为“新构想”，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正在进行新的外交布局，进入新发展阶段。^③按照俄罗斯知名战略家卡拉加诺夫的划分，1991 年以来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理想天真的亲西方路线、“跪着也要站起来”、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大国。2018 年前后，这一演变轨迹达到了“顶峰”，

① 傅莹：“是狐狸还是刺猬？——从加迪斯《论大战略》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得失”，《世界知识》，2018 年第 22 期，第 39-42 页。

② 2018 年 4 月，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在其著作《论大战略》中指出，人的思维常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如果能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追求目标与能力的一致性，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也即目标与能力的平衡。[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论大战略》，臧博、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

③ 冯绍雷：“大国俄罗斯的世界构想”，《文化纵横》，2021 年第 6 期，第 104-116 页；冯绍雷：“普京执政 20 年与俄罗斯对外战略新动向”，《当代世界》，2020 年第 9 期，第 4-10 页。

并伴随有衰退迹象。^①为此，俄罗斯需要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呼声越来越多。

实际上，卡拉加诺夫的观察与近两年俄罗斯政策研究界围绕外交新定位的激烈讨论不谋而合。仅 2020 年以来，具有半官方背景的多家俄罗斯智库、科研机构 and 精英高校，如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陆续发布多份重量级研究报告，提出了关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些“新构想”，如俄罗斯要力争成为“和平的捍卫者、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担保者、新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中美‘霸权’之间的平衡者、地球环境的维护者”^②等。在这些关于“新构想”的讨论中，越来越成为俄罗斯政策研究界共识的是，把俄罗斯定位为 21 世纪的“主要平衡强国”，讨论重点进而转向更加深入、全面地阐述“再平衡”的内涵，主要包括：

第一，“再平衡”强调要兼顾全球与地区向度。“再平衡”新构想的提出，意味着俄罗斯外交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这一重要阶段的结束，^③并将开启一个新阶段。当然，这个新阶段并不是俄罗斯完全“脱欧入亚”，而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再平衡，并合理分配重视和投入资源的程度。新阶段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将以全球平衡为基点构建。^④

第二，“再平衡”强调要兼顾历史与未来。相较于平衡战略而言，“再平衡”既要充分吸取历史教训，也要不断巩固当下具备的多重优势：战略优

① Sergei Karaganov,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and Two Future Scenarios”, *Russian Politics*, 2021, Vol.6, No.4, pp.416-434.

② Учаев Е.И. Сохранит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в эпоху Антропоцен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2. Т.20. No.1. С.35-50; Караганов С.А, Суслов Д.В. и др.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М.: Изд. дом ВШЭ, 2020; Караганов С.А. О третье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1. Т.19. No.4. С.21-34; Лукин В.П.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ый мир и плоскост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1. Т.19. No.4. С.84-97; [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德米特里·苏斯洛夫、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伊戈尔·马卡罗夫、拉里莎·波波维奇：“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89-117 页。

③ 指的是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初期主要以欧洲/西方平衡为出发点的俄罗斯对外政策。

④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Запад: оптимизация усилий.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будут налаживаться, но не сейчас//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0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rg.ru/2020/12/10/lukianov-otnosheniia-rossii-i-zapada-budut-nalazhivatsia-no-ne-sejchas.html>;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Несколько непрошенных соображений о кита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Клуб «Валдай». 4 августа 2020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eskolko-neproshenykh-soobrazheniy/>

势，俄中关系是俄最大的战略资源；道义优势，国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相信真理在自己这边；实力优势，西方实力下降，衰落趋势凸显；发展优势，不再像苏联那样消耗宝贵的国家资源去援助第三世界，而是专注自己的内外发展。历史教训和当下优势既是构成“再平衡”的重要基础，也是俄罗斯在大国竞争新时代寻求新定位和构建新世界秩序的主要抓手。^①

第三，“再平衡”强调要兼顾多元与多样性。其多元对象包括俄、美、中“三角”关系以及与英、法、德、印、日、土耳其等国关系。多样性不仅要涵盖军事、政治领域，还包括道德、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再平衡。^②

第四，“再平衡”强调要兼顾灵活性与自主性。俄罗斯专家特别指出，“再平衡”不意味“等距离”，要发挥类似于“黄金股”的作用。俄罗斯必须具备保持全球和地区“再平衡”的能力，重点是立足于自身在 2010 年代通过外交、军事和政治成就获得的战略储备。^③

上述归纳是现阶段俄罗斯外交“再平衡”新构想的主要内涵，俄罗斯还会根据当前和未来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不断调适的实践经验，去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完善，故称之为“正在成形中”的“再平衡”新构想。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Шанс, который нельзя упустить. России надо думать, как победить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 июня 2021 г.; Виталий Цепляев. Сатанизации вопреки.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о нов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и русской идее. 21 июля 2021 г. https://aif.ru/politics/world/satanizacii_vopreki_sergey_karaganov_o_novoy_ho_lodnoy_voynе_i_russkoy_idee; Караганов С.А. О третье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1. Т.19. №.4. С.21-34; Тренин Д.В. Новый баланс сил: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вновесия. М.: Альпина Паблшер, 2021; Томас Грэм. Россия и мир: как сохранить статус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Клуб «Валдай». 23 ноября 2020 г.

② [俄]谢尔盖·拉夫罗夫：“病毒大流行留给人类的结论与任务”，《环球时报》，2020年5月28日，第14版；Ольга Филина. Исчезает атмосфера, в которой возмо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гонёк. №.7. 25 февраля 2019 г.; Thomas Graham, Dmitri Trenin, “Towards a New Model for US-Russian Relations”, *Survival*, 2020, Vol.62, No.4, pp.119-134;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Весь этот мировой джаз. Ялтинский мир в XXI веке невозможе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5 мая 2015 г. <https://rg.ru/2015/05/06/lukjanov.html>

③ Глава ИМЭМО РАН: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США и Китая станет главным в постпандемическом мире. 10 июля 2020 г. <https://tass.ru/interviews/8936527>;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 России удержать равновесие в 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м биполярном мире.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15 апреля 2020 г.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541>; [俄]德米特里·特列宁：“世界会出现全新‘两极格局’吗”，《环球时报》，2020年7月24日，第14版；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Будущее большого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8 июня 2020 г.; Неуравновешенны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Огонёк. №.47. 10 декабря 2018 г. С.20.

二、俄罗斯外交“再平衡”调适的两大出发点

当前，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叠加，许多国家都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国家安全、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增长、发展的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之间寻求“再平衡”，且这种“再平衡”还面临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①这需要决策者就内政外交的发展方向做出合理的选择。与此同时，当前的巨大风险在于国内进程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相互交织，使得内部进程受到外部的影响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政局的不稳与脆弱，这是大国比较担心的。因此，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寻求“再平衡”显得尤为重要，且要在完全不一样的内外形势之下进行常态化的调适。

俄罗斯面临的两项重大任务是对内谋求复兴，对外防止卷入战争。^②具体而言，对内重点在经济与意识形态领域，既要聚焦内政与发展，又要对民众的诉求给予积极回应。因为，维护国内稳定与发展也是一种对世界负责的体现；而疫情导致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暴露，有民调显示，厌倦观看外交游戏的民众，越来越多地希望政府解决社会民生问题。^③对外要保持定力，冷静评估，特别是防止被拖入冲突或战争，浪费宝贵的国家资源。^④这是提出俄罗斯外交“再平衡”新构想的两大主要出发点。

（一）新发展阶段的俄罗斯：内政优先

始于2020年年初的“闪电般”替换新政府，随后是推进宪法改革并顺利完成修宪公投和发布《2030年前国家发展目标》战略文件，以及2021年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⑤，保障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的顺利举行以及加快规划出台《203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巩固政权和国家发展

① Кортунов А. Между пленумом ЦК КПК и «саммитом демократий». 22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mezhdue-ple-numom-tsk-kpk-i-sammitom-demokratii/>

②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Мы наконец признали, что идет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перестали сглаживать и улыбаться». 6 июня 2021 г. <https://www.business-gazeta.ru/article/511895>

③ Выборы закончились-забудьте о политике//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6 сентября 2021 г. https://www.ng.ru/editorial/2021-09-16/2_8254_editorial.html

④ Sergei Karaganov,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and Two Future Scenarios”, *Russian Politics*, 2021, Vol.6, No.4, pp.416-434.

⑤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 г. №.400.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

基础的重大“组合拳”，既表明俄罗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普京施政的着力点正在发生变化。不少俄罗斯专家也指出，普京 20 年前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已经完成：俄罗斯不仅巩固了其顶级玩家的国际地位，而且有力地确保了自身安全。这个方向的相关工作仍将继续，但只是例行的常规工作。接下来，有必要用双倍的精力来处理本国事务——国内发展问题。^①

2021 年 7 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和规划中的《2030 年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都提出以“本国发展与稳定”为重中之重，聚焦俄罗斯内部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关乎民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问题。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列出的 8 项要维护的国家利益^②和 9 项优先任务^③都贯穿了“内政优先”的理念。

此外，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的《2030 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也初步提出 5 大重点发展方向，包括高科技经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新社会契约、服务导向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④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为落实这些战略目标，2021 年俄罗斯政府还出台了《2030 年前社会经济发展倡议目录》^⑤，提出了涵盖上述发展方向的 42 个战略项目。

① Тренин Д. Новый баланс сил: Россия в поисках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вновесия. М.: Альпина Паблишер, 2021; Лукьянов Ф. Почему 2020 год стал рубежным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22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profile.ru/politics/pochemu-2020-god-stal-rubezhnym-dlya-rossijskoj-vneshnej-politiki-462783/>; Баунов А. Женевская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Старые президенты о главном. 16 июня 2021 г.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4786>

② 保护人民；维护宪法、主权和独立；维持民众团结与和睦、巩固法制和消除腐败；发展安全的信息空间，确保俄罗斯社会免遭信息心理破坏性活动的影响；基于新的技术基础的经济稳定发展；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巩固传统价值、维护文化与历史遗产；维护战略稳定。

③ 保护人民和发展人力资源、国防、国家与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合理利用、科技发展、生态安全、传统价值、文化、历史记忆的维护、战略稳定与互利国际合作。

④ Бутрин Д. Плановый выход из эпидемии. До ма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будет занят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м изменений до 2030 год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1. 8 февраля 2021 г. С.1; Кошкина А, Максим Рубченк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отовит нов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2 февраля 2021 г.<http://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21/02/02/856382-pravitelstvo-gotovit-novuyu-strategiyu-sotsialno-ekonomicheskogo-razvitiya>

⑤ Перечень инициати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30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Ф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6 октября 2021 г. №2816-р. <http://static.government.ru/media/files/jwsYsyJKWGQQAaCSMGrd7q82RQ5xECo3.pdf>

至此，俄罗斯政府已经初步构建起“国家规划-战略倡议-国家项目-国家纲要”的治理体系，并进行集中领导和分工落实。

整体而言，2021年，俄罗斯政府的工作继续重点关注国内稳定与发展，推行契合大众需要和适应深层次社会意识结构新变化的政策，这是俄罗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

（二）全球转型背景下的未知新世界

“本国优先”是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应对2021年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写照。在全球疫情这种巨大威胁和危机面前，多数大国更倾向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面临的问题与危机。这与当下世界发展的最大特征——不确定性——存在关联。并且，这种“不确定性”也进入了新阶段：虽然世界依然是相互联系的，但并非是一个整体，而是变得越发复杂，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灰色”发展期，实际上面临两难境地：既不能回到过去，又对未来不清楚。缺少透明的游戏规则和构建国际体系的共同原则，各方之间的冲突、矛盾将会越来越多，会强化国际体系的碎片化趋势。^①由此，世界开启了全球转型新阶段，^②未来到底会转向什么样的新世界，以及这种转型将在何时结束，目前还很难下定论。

有专家预测，全球转型要持续到21世纪中叶，^③未来世界可能的演变形态主要包括四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多极世界、两极世界和新的无政府状态。有人认为，新的世界未必是多极的。当今世界的等级体系并不像19、20世纪那么森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因素卷入这一进程，导致等级模糊不定，从而衡量大国的指标也是流动的。因此，未来的世界将比20年前更加复杂和矛盾化，“单极世界”的落幕意味着其对立面——“多极世界”——也将退出历史舞台。^④也有人说，世界将会走向中美“两极”，指出未来国

① Jozef Hrabina, “The Year of Crises: How 2021 Will Reshape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1, No.1, pp.174-199.

② 冯绍雷：“从全球转型看中美俄关系与欧亚秩序构建”，《当代世界》，2021年第9期，第39-45页。

③ Andrei P.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n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Vol.17, No.1, pp.52-70.

④ Кортунов А. Почему мир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м. 26 июня 2018 г. <http://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pochemu-mir-ne-stanovitsya-mno-gopolyarnym/>

际体系的原则和开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①还有人说，世界秩序将会回归原始状态——无政府性，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会在对主权的尊重和势力范围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构建，不大可能由单一国家或集团来统治，而是走向多中心结构的国际体系，其中既有美苏冷战时期的两极残余，也有新的重量级“选手”——中国和其他区域大国。这是一个既复杂又自由的国际秩序，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抗。^②

不管世界的轮廓将怎样演变，对俄罗斯而言，当下更大的现实挑战是如何使其新阶段的国内变革更好地适应全球转型的新形势。2021 年俄罗斯外交密切关注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拜登加速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型。从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一年来所实施的政策看，依然在特朗普的“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的轨道上，但更多地补充了意识形态成分。^③美国最终结束了 21 世纪以来的两场对外战争（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美国政治和世界政治一个时代的结束，尤其是以武力的方式去推进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④虽然拜登频繁谈及“民主”与“自由”，但是他非常清楚，如今美国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因此有必要做选择，确立优先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整合“自由世界”，对抗中俄两个世界大国。

第二，美欧跨大西洋关系的转型。一方面，拜登时期的美欧盟友关系状态不可能恢复到奥巴马和之前的时期：双方对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存在不同的认知，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多，跨大西洋共识越来越脆弱……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裂痕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拜登试图采取“交易策略”团结大西洋共同体，以便更好地解决其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尤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与中俄之间的对

① Цыганков А. Почему в США все хуже относятся к Китаю и китайцам. 28 мая 2020 г. <http://profile.ru/abroad/pochemu-v-ssha-vse-xuzhe-otnosyatsya-k-kitayu-i-kitajcam-322188/>

② Крамаренко А. О «новой биполярности» и месте России в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8 ноября 2018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novoy-bipol-yarnosti-i-meste-rossii-v-postmodernistskoj-konfrontatsii/>

③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具有“去意识形态化”的特征。

④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Нетерпеливая Америка. Уход из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 Ирака подводит черту под эпох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7 июля 2021 г. <https://rg.ru/2021/07/27/lukianov-uhod-iz-afganistana-i-iraka-podvodit-chertu-pod-epohoj-politiki-ssha.html>

抗。这种策略的核心就是打造“协议型西方”。拜登与英国签署新版《大西洋宪章》，首次与德国就“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签署双边协议，与英国、澳大利亚签署军事国防领域的多边协议，组建新的联盟——奥库斯等，都是其“交易策略”的具体体现。这种基于协议来巩固的“21世纪西方”，其稳定性显然会低于20世纪基于意识形态的西方“团结”，因为协议随时都是可以修订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拜登能否赋予“协议型西方”更多的意识形态元素。2021年12月9日至10日，拜登以视频会议形式召集的“全球民主峰会”，可以视为其推动国际关系“再意识形态化”的最新尝试。

第三，大国有序竞争的结构化转型。区别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无序大国竞争”，拜登上任一年来的大国竞争显示出一定的“有序性”。他不仅对冷战时期的对抗路线更加青睐，更何况美国自认为是冷战“赢家”，还试图纠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恢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抗图景。为此，拜登需要非常强大的对手来团结“小伙伴”。但是，俄罗斯或中国都不能单独支撑起这个对手角色，需要将中俄等一些国家捆绑在一起，如当下美国试图以自由世界对抗非自由世界，以过去的集体西方（政治层面）对抗新的集体东方（有针对性地建构）。^①同时，拜登也清楚这种策略并非只是为了使美国更强大，而是尽可能地消除因盟友采取单边行动可能给美国造成的阻碍。不管拜登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与策略来对国际关系的权力等级进行结构化，其结果无疑会使大国关系越发紧张。如果美国将结构化的对抗作为解决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的出路，那么对抗还会继续恶化；更何况美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内部问题，将会更加频繁地将这种对抗当作国内问题的“替罪羊”。

第四，传统多边主义的转型。当下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侧重于价值观的传统多边主义很难再发挥更大效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认为，拜登时代的多边主义会显著区别于奥巴马时期的多边主义，因为特朗普的“革命”已经改变了世界及其对美国霸权的认识。因此，他建议有必要推进新的多边主义，亦即没有霸权的多边主义，这更多是一种项目设计与

^①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Диалектика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Байдена хочет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нархию//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9 июня 2021 г. <https://rg.ru/2021/06/29/professor-niu-administraciia-bajdena-hochet-sistematizirovat-mezhdunarodnuiu-anarhiuu.html>

共同利益导向的新型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的出现有助于看见一种可能的新的世界秩序图景，即美国不一定非要成为新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建造者，新秩序也不一定非要由霸权国主导，更不用要求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是西方民主国家，而是可以包含不同类型政体的国家。^①拜登能否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适应这种新型多边主义的转型，暂时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

三、俄罗斯外交“再平衡”的着力点

基于上述既要为国家进入新发展阶段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未知新世界的相互交织的多重艰巨任务，2021年的俄罗斯外交更加主动地寻求多维度的“再平衡”。主要着力点包括：在对西方外交向度，重点寻求“破与立”的再平衡；在对东方外交向度，重点寻求“软与硬”的再平衡；在扩充外交工具方面，重点寻求“新与旧”的再平衡。

（一）对西方外交：寻求“破与立”的再平衡

2021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破与立”的双重进程中开启痛苦调整，双方既重新确立打交道的“双轨”方针，凸显“破”的困境与危机；也有试图通过举行多次对话，尤其是俄美元首会晤，来“冲破”惯性，建构“新图景”，开启“破而后立”的初步憧憬。这种“破与立”主要体现为俄罗斯的西方外交努力在强硬与建设性之间寻求再平衡，俄罗斯希望与西方发展正常关系，因为这关系到俄罗斯国内的发展与稳定。与西方的常态化对抗，实际上让俄罗斯很难发挥自己本可用于本国发展的客观性优势，在国际舞台的施展空间也被压缩，技术与资本的获得也受到限制，还难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军备竞赛。因此，俄罗斯与西方到底是合作还是继续对抗，取决于双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具体而言，俄罗斯对西方外交的再平衡主要在俄美关系与俄欧关系两个向度展开。

1. 俄美之间的“破与立”再平衡

2021年，俄美之间的“破与立”再平衡博弈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①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й миропорядок без доброго гегемона. 28 января 2021 г.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gegemon-rukovodstvo-k-dejstviyu/>

阶段是在上半年，以第一次“普拜会”的顺利举行而收场。在这一阶段，俄美之间“大尺度”的相互试探展开了第一回合博弈，以各方相互克制、俄接受美对俄的“双轨”方针收尾。

自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上台执政以来，俄美之间不断上演相互试探与博弈的“戏码”，都在探索与对方打交道的新方式。一方面，俄美之间的动作显示出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态势。美国就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被投毒”事件对俄强烈施压；俄美之间展开了两轮制裁战，其中，美国的对俄制裁首次触及了俄联邦的国债；俄美大使分别“被召回国”，商议对策；俄宣布制定“不友好国家”名单；俄美开展大规模军演炫耀武力。北约在靠近俄边境举行有4万军人参加的“欧洲防卫者2021”军演，这是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直持续到6月底；俄罗斯也部署了10余万军队在俄乌边境，还与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等等。

另一方面，俄美之间也没有停止正面交流。2021年上半年，拜登两次给普京打电话。在1月26日的通话中，双方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透明且持续”的沟通。1月27日，俄议会仅用2小时就完成了延长该条约所需的必要法律程序。在4月13日的通话中，拜登主动提议6月举行俄美元首峰会。随后，普京出席了拜登召集的全球气候峰会视频会议。此外，4月2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没有凸显近期与美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军事、地缘政治的对抗气氛，甚至提到的“红线”也是模糊的，并表示将与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同时，俄国防部部长下令从俄乌边境“撤军”，普京回应乌克兰总统提出的会面建议，在监狱服刑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被俄当局允许送到民营医院治病。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当天，俄当局也没有在莫斯科大规模拘捕游行示威者和国内外记者，这与当日圣彼得堡的大规模拘捕形成鲜明对比。随后，俄白总统会面也没有爆出轰动性新闻，针对捷克再次驱逐18名俄外交官，俄方的回应也显得相对“冷静”。

以上俄罗斯的这些“反常”行为，实际上也是缓和与西方对抗的新姿态。西方显然接收到了俄方举动所传递的信号，也对其做出积极回应：不仅美国“同意”俄方关于驻俄大使沙利文返回华盛顿就美俄关系进行磋商的建议，而且西方也没有启动将俄罗斯剔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程

序。欧盟第一时间表态，欧洲议会决议不代表欧盟官方立场，也没有禁止投资俄罗斯国债的第二市场。可见，俄罗斯与西方通过上述“玩双簧”的多次博弈，逐渐确立并接受了打交道的互动模式：选择性协作与相互遏制相结合。

6月16日，俄美总统在瑞士如期举行首脑峰会。虽然双方并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但符合“维系现有纽带，延缓创伤恶化，争取新的突破”的普遍预期，^①收获了初步的积极成效。第一次“普拜会”就三大合作领域达成共识，包括战略稳定、网络安全与人道主义合作（涉及叙利亚和阿富汗问题），两国元首重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理念——“核战争没有赢家”，还同意开启新的战略稳定谈判，并制定了行动计划。美国也不再制裁“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2021年上半年美俄贸易额与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50%。俄罗斯专家认为，“普拜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双方以相互尊重的态度确立了可以推进的共同利益领域和可能协作的方向。^②

第二阶段是2021年下半年，以俄美确定“安全保障”谈判收尾。这个阶段，俄美继续保持高密度的高层接触，同时俄罗斯展开了更加积极的对美外交攻势，旨在“迫使”拜登将安全保障议题列入俄美对话的优先事项清单。

一方面，第一次“普拜会”之后，俄美实务部门高层展开了密集接触，几乎每月都有一场或多场高层会谈。第二次“普拜会”之前，有四位美国高官访问俄罗斯。7月12日至15日，拜登气候特使克里到访莫斯科；9月7日至9日，拜登伊朗问题特别代表到访莫斯科；10月13日至14日，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到访莫斯科；11月2日至3日，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受拜登直接派遣，突访莫斯科。俄罗斯方面，10月16日至17日，俄副总理奥维尔丘克访问美国，会见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及商界人士，磋商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此外，俄美分别于7月和9月进行了战略稳定谈判，并成立两个工作组。这也一定程度上符合拜登政府多次表示要与俄罗斯构建稳定、可预测的双边关系的公开表态。不过，在俄美互动过

① 万青松：“‘拜普会’能否让转入‘新’阶段的美俄关系‘行稳致远’？”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项目，2021年6月15日，<https://fddi.fudan.edu.cn/53/d3/c21253a349139/page.htm>

②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Путину и Байдену стало все понятно. 17 июня 2021 г. <https://vz.ru/opinions/2021/6/17/1104485.html>

程中也能观察到，美国对俄依然采取强硬与温和两条路线，前者以国务院副国务卿纽兰为代表，通过外交渠道与俄接触；后者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为代表，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俄接触。这也是俄罗斯考虑对美关系再平衡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拜登曾表示，希望半年后“检查”第一次“普拜会”所达成共识的落实进度，俄罗斯以此为契机，对美国打“安全保障牌”。^①12月7日，普京与拜登在以视频形式举行的第二次“普拜会”上，就推进“安全保障”问题对话，达成共识。12月15日，俄罗斯向美方提交了《俄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议》两份草案，两天后即对外公开发布了文本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俄方要求北约停止进一步东扩、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特殊利益区，北约承诺不吸纳乌克兰为成员国，北约从中东欧地区撤军并停止部署进攻性武器，等等。12月30日，俄美元首通电话，继续探讨此前在视频会晤中谈及的重点问题，主要涉及俄罗斯与美国、北约和欧安组织于2022年1月启动的安全保障议题。由此可见，俄罗斯主要通过倡议“安全保障”，促使陷入僵局的俄美战略稳定谈判有机会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进而防止出现特朗普时期俄美安全议程上的“脱钩”。这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俄罗斯对美关系再平衡的一种策略。

2. 俄欧之间的“破与立”再平衡

2021年，俄欧之间也上演了类似俄美之间的“破与立”的戏法。一方面，俄欧出现新一轮的“疏离”，主要表现包括：政治上，拒绝互相“划红线”，欧对俄推行“三板斧”，导致俄欧政治博弈越来越激烈。俄欧之间不但没有妥善解决过去的问题，如选举、人权、俄反对派被捕、地区（乌克兰）危机等，而且负面清单还在继续扩大，延伸至网络袭击、不友好国家名单（捷克），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等地区危机与热点问题。以纳瓦利内事件为例，与以往外交表现完全不同的是，俄罗斯拒绝向欧盟解释其被捕的合理性，有时更加强硬地回击，有时嘲笑欧洲的行为。欧盟则依然按照惯性处理对俄关系，被俄罗斯视为政治施压的表现，双方更难以

^① 万青松：“俄罗斯对美西方打出的‘安全保障牌’，胜算几何”，2022年1月9日，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2_01_09_621563.shtml

达成共识。因此，俄罗斯驱逐欧盟外交官就是向其传递明确信号：俄罗斯完全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内政行为。俄罗斯还拒绝与欧盟就内政开展任何对话，也标志着俄欧关系过去的模式逐渐丧失效力。

在此情况下，德、法试图效仿 6 月的“普拜会”，主动提议举行俄欧峰会，划定各自的“红线”，但遭到欧盟十余国的反对，尤其是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不得不表示，欧盟成员国将继续讨论与俄罗斯开展对话和举行高层论坛的可能形式与条件。^①实际上，俄方对举办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中断的俄欧峰会抱有一定期待，认为通过高层会面划定“红线”，可以确立双方可能合作的优先方向。俄欧之间累积的问题尤其需要领导人会晤打开“绿色通道”，而世界形势的变化也需要俄欧对话。^②然而，最终欧盟没有效仿“普拜会”面对面“划红线”的做法，而是推出了欧洲版的“三板斧”对俄方针——对抗、遏制、参与。^③

俄欧峰会提议的失败，导致双方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欧洲议会的行为最具代表性：欧洲议会通过了把俄罗斯剔除出 SWIFT 的议案；提议欧盟需要与美国结盟，以抵制俄中“削弱世界民主”的行为；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正式投票之前，通过了“反俄”报告，不仅质疑其选举的合法性，还公开呼吁俄民众不要投票；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主要安全威胁，为此呼吁制裁俄罗斯军队、情报部门、石油产业等。对此，俄罗斯做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回击：在 2021 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删除与欧盟“巩固互利合作”的条款；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指责欧洲议会干涉内政；俄罗斯司法部以接受欧盟 13 万欧元资金和外国代理人机构信息、材料为依据，将电台“雨”（Телеканал Дождь）列为外国媒体代理人；^④将捷克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等。

① “德国总理：欧盟国家将继续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形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1 年 6 月 25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10625/1033960967.html>

②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Линии на полях. Гендиректор РСМД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о том,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союзу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ужен саммит// Известия. 28 июня 2021 г. <https://iz.ru/1184336/andrei-kortunov/linii-na-poliakh>

③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宣布对俄关系‘三原则’，俄方回应”，《环球时报》，2021 年 6 月 18 日，<https://m.gmw.cn/baijia/2021-06/18/1302364144.html>

④ Произвол ничем не лучше беззакония. Реестр СМИ-иноагентов как игра без правил//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5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www.ng.ru/editorial/2021-08-25/2_8234_editorial.html

在经济方面，虽然目前欧盟在俄对外贸易总额上的占比下降到 38%，但俄官员指出，这与俄和东方国家之间贸易额持平。欧盟继续延长已进行了 7 年的对俄制裁，俄罗斯也继续针对欧盟单边制裁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欧盟还提出将会对俄征收碳税。俄经济发展部预测，如果欧盟对俄罗斯的出口产品征收碳税，俄罗斯每年将不得不支付至少 11 亿欧元的碳税。对此，俄罗斯打算以 WTO 的规则与欧盟进行斗争，或者对欧盟征收“木材税”来回击欧盟。^①人文交流方面，2021 年 5 月最新民调显示，欧洲社会对俄看法比较负面，其中对俄持负面看法的英国受访者占比 73%，法国受访者占比 58%。^②

上述动向表明，俄欧之间的疏离，短期内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拉近，而双方积累的诸多问题也难以很快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2019 年，俄外长拉夫罗夫曾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新的世界现实要求俄欧协力修整“共同的欧洲大厦”，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共同的欧洲大厦”的出发点是俄欧共同制定“居住规则”，而不是欧盟单方面制定规则。^③但这样的表态并不被欧盟所接受。有俄罗斯专家指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实质性意义，反而完全符合俄罗斯的期许，清楚地表明双方都承认过去的俄欧关系模式面临危机，因为欧盟非常清楚不可能通过制裁使俄罗斯屈服、甚至就俄内政问题进行交涉，正如基辛格在 2014 年指出的那样，制裁不是政策，而是缺少政策的借口。^④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专家指出，俄欧关系的旧框架不仅已经过时，甚至被证明是有害的。双方关系不仅缺少互动的共同框架，而且其行为逻辑和相互认知都是分裂的。^⑤从长远来看，找到双方相处的新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接下来还会出现更多的摩擦。

① Москва придумала для Брюсселя лесной налог//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5 июля 2021 г. https://www.ng.ru/economics/2021-07-25/4_8207_tax.html

② Джонсон и Байден пошли по пути Черчилля и Рузвельт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0 июня 2021 г. https://www.ng.ru/world/2021-06-10/1_8171_usa.html

③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6 февраля 2019 г. https://www.mid.ru/press_service/minister_speeches/-/asset_publisher/7OvQR5KJWVmR/content/id/3520272

④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Санкции как благо. Санкции - это не политика, а алиби на случай ее отсутств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3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rg.ru/2021/02/23/lukianov-sankcii-eto-ne-politika-a-alibi-na-sluchaj-ee-otsutstviia.html>

⑤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Разрыв» как благо.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союзу сейчас нечего терять.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872>

另一方面，俄欧之间不可能完全断绝关系，双方之间也保持着有限的互动，更多是双边层面的，尤其是维持大国之间的互动与协调。2021年6月22日，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80周年之际，普京在德国《时代周刊》发表关于二战爆发80周年的署名文章《回顾过去，面向未来》^①。他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主张恢复与欧盟的全面伙伴关系。普京表示，俄对与欧洲的创造性协作持开放态度，再次提到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同安全与合作空间，就是这样的出发点。普京呼吁欧洲与俄罗斯应当开展合作，指出双方实际上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合作议题，包括安全与战略稳定、卫生、教育、数字化、能源、文化、科技、气候与生态问题等。这也表明，俄罗斯对同欧盟的关系也是在强硬与建设性之间寻求再平衡。

整体而言，2021年俄罗斯与西方的互动，旨在使各方关系更加有序化，既期待搁置冲突，又致力于将竞争结构化和稳定化：各方都清楚意识到需要在有分歧的情况下，重新排布分歧的先后次序，制定竞合的新游戏规则。虽然俄罗斯试图通过外交“再平衡”开启其与西方关系的“机会之窗”^②，但双方关系的新模式难以短期内确立，“破与立”的斗争将会愈演愈烈。

（二）对东方外交：寻求“软与硬”的再平衡

俄罗斯对“东方”的理解包含多个层面，既有地理层面的东方，涵盖中东到亚太的广大区域；也有政治层面的东方，即非西方；还有文化层面的东方，指波斯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下文探讨的俄罗斯东方外交是地理、政治、文化几个层面相结合的东方，涵盖后苏联空间、中东和亚太地区的国家。

从外交政策实践来看，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作为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回应，俄罗斯先后提出“转向东方”和“大欧亚伙伴关系”两大战略东移倡议，前者希望通过战略东移让自身从西方的围困中解套，在东方获得发展空间，并联合中国约束美国的行为；后者延续战略东移的思路，

^① Vladimir Putin, “Being Open, Despite the Past”, June 22, 2021,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5899>

^② Сергей Рогов. В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открылась “форточка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2 декабря 2021 г. https://www.ng.ru/dipkurer/2021-12-12/9_8324_negotiation.html

体现的是提升俄罗斯与东方国家关系的战略价值。^①当下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进一步为俄罗斯东方外交提供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操作的巨大空间。与此同时，虽然持续的疫情危机进一步强化全球中心转向东方的大趋势，但在俄罗斯看来，“转向东方”越来越需要明确一个原则性问题，即，远离西方并不意味着自动“转向东方”，是非线性地，而且也相当克制。^②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的。

近年来，有俄罗斯专家提出，独联体所在地区已经不能再称之为后苏联空间，^③因为经过 30 年的发展，后苏联空间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俄罗斯“转向东方”进程也已经结束，^④尽管还面临不少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例如，俄罗斯还不清楚到底从亚洲获得什么；该项政策获得政治与社会的认同度较低；该项政策更多是联邦层面的政策，不是面向本地的政策，等等。^⑤与此相伴的是，俄罗斯也需要调整其东方外交，以便更好地适应内外发展的新变化。2021 年 2 月 10 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宣布，综合构建“欧亚大厦”（Евразийский дом）、协调欧亚大陆空间发展中的一体化进程，是本国外交的优先任务之一。^⑥俄罗斯官方层面首次提出“欧亚大厦”的概念，难免使人想起戈尔巴乔夫时期主动倡议过的“共同的欧洲大厦”。对此，俄罗斯专家无奈地指出，30 年前，俄罗斯还认为可以与欧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欧洲大厦”里面，15 年前已经感觉到需要在更加严格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加入欧盟的通行证，10 年前则被从可能的房客中“赶出来”，而现在完

① 2020 年 2 月，“大欧亚”构想的提出者、俄罗斯知名战略家卡拉加诺夫接受采访时指出，“大欧亚”也可以称为“转向东方”。参见 Россия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домой. РСМД. 21 февраля 2020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rossiya-vozvraschaetsya-domoy/>; Pepe Escobar, “Russia Aiming to Realize Greater Eurasia Dream”, June 13, 2020, <https://asiatimes.com/2020/06/russia-aiming-to-realize-greater-eurasia-dream/>

②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Почему 2020 год стал рубежным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офиль. 24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profile.ru/politics/pochemu-2020-god-stal-rubezhnym-dlya-rossijskoj-vneshnej-politiki-462783/>

③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СНГ перестало быть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м. 25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vz.ru/opinions/2020/12/25/1076920.html>

④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 завершен. 14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vz.ru/opinions/2020/12/14/1075356.html>

⑤ Анастасия Лихачева. Чего хочет Россия от Аз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Дипкурьер. 27 декабря 2020 г. https://www.ng.ru/dipkurer/2020-12-27/9_8950_asia.html

⑥ Лавров обозначил ключевые задач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лужбы. 10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ria.ru/20210210/lavrov-1596751212.html>

全不明白，这座大厦能否挺住。^①这种并不乐观的看法，不仅表明俄罗斯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当下如果只是对摇摇欲坠的“共同的欧洲大厦”进行修修补补，似乎已经无济于事，因为世界、欧亚和俄罗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俄罗斯不得不思考如何在新的“未知”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②因此，俄外长首提“欧亚大厦”，也传递出强化东方外交的新动向。

其实，俄罗斯战略与政策研究界早已对构建“欧亚大厦”展开过详细的战略研究与规划构想，并提出，俄罗斯与欧洲构建“共同的欧洲大厦”的时代已经结束，构建“共同的欧亚大厦”的时代正在到来，具体内容包括：

政治上，尊重欧亚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尊重政治多元主义和各国人民对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干涉内政；经济上，秉承开放性，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反对经济关系政治化，经济合作奉行互利共赢原则，以贯通南北的欧亚交通物流运输、多边金融、贸易、技术、网络合作等为基础；安全上，反对构建军事联盟和现有联盟的扩大，支持中立与不结盟原则，构建法治、合作与安全的欧亚大陆安全体系；文化上，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提倡通过文明对话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③

基于上述新背景，2021年的俄罗斯东方外交也在多个具体向度进行再平衡，既有对中东地区外交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有对周边外交的最新反思，还有对亚太地区外交的新布局。

第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多元平衡经验正在东方外交中推广。2021年正值阿拉伯之春10周年和俄罗斯正式出兵叙利亚6周年。俄罗斯专家发现，阿拉伯之春与俄罗斯回归世界舞台不谋而合。这与2008年、2014年俄罗斯以武力应对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危机的“硬性”方式完全不同：这两次危机更多是被动型应对，而针对叙利亚等中东地区的危机则是积极进取型的

①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За пять лет стал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Евромайдан завершил европейскую либеральную революцию. 22 февраля 2019 г. <https://profile.ru/abroad/za-pyat-let-stalo-ponyatno-chto-evromajdan-zavershil-evropejskuyu-liberalnuyu-revoljuciyu-68415/>

② Barry Buzan, “Russia in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d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1, Vol.19, No.4, pp.22-35.

③ Лукина А.В., Новикова Д.П.(ред.) Нов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в меняющейс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инамик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9.

策略。^①可以把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采取的策略归纳为：借助政治上的随机应变、外交艺术与灵活性、军事实力后盾几个方面的组合拳，进行多元平衡，利用机遇，以寻求最优的相互协作模式，最终以较少的资源投入，为自己创造更多与其他大国周旋的空间。这既能进一步巩固国内发展议程，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同时也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维护本国利益和安全。近几年中东地区的外交实践表明，阿拉伯之春对俄罗斯而言更多是正面意义的，既弥补了克里米亚危机的外交失败，也确立了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尤其是中东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也与 10 年前完全不一样，更希望与俄罗斯打交道。在政治收益方面，俄罗斯不仅与西方大国，还与地区大国建立起伙伴关系，虽然与这些伙伴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有些甚至是对立的，但这并没有成为与各方建立工作关系的障碍。在经济收益方面，如果不是俄罗斯在地区提升影响力，那么沙特很可能在“欧佩克+”协议方面，对俄罗斯的态度更加强硬。^②俄罗斯这种全新“组合拳”尝试不仅取得较好成效，而且在中东地区获得的宝贵经验，使其在处理周边危机与冲突时更加自信。这一经验也逐步运用到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军事力量在当今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善于以军事力量应对局势变化的艺术也更加重要。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正是在“软与硬”之间寻求再平衡。

第二，在应对周边危机与冲突方面，俄罗斯也有意识地寻求再平衡。基于历史教训和新的形势变化，俄罗斯也更倾向于采取相对柔软的方式处理周边危机与冲突，其中与大国和邻国之间的紧密协作是重中之重。美国知名俄苏问题专家曼可夫（Jeffrey Mankoff）观察到，近两年俄罗斯对周边国家危机和事件的态度与 2008 年、2014 年相比都有较大区别。他不同意过早地断言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下降。他认为，俄罗斯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采取一种新的“软性”方式，相对比较成功地利用这些危机来进一步巩固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这种能力的运用还展现出，俄罗斯仍然

①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Россия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десять лет после «арабской весны». 1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desyat-let-posle-arabskoy-vesny/>

② Ekaterina Stepanova, “Russia’s reg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Benefits, risks and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Orient*, 2021, Vol.62, No.4. pp.45-58.

拥有影响邻国的潜能。^①

第三，针对白俄罗斯政治危机与边境难民危机，俄罗斯拒绝直接干涉这些危机，更多是对白提供政治层面的支持。比如，围绕白政治危机，普京公开表示，俄方已组建一支后备警察部队，待命派往白俄罗斯。如果白出现类似于乌克兰那样的暴力“国家政变”，俄方将会向白俄罗斯部署军队。2021年4月21日，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也指责西方意图对白俄罗斯搞国家政变，表示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这种“软与硬”兼具的政治层面支持，既向白俄罗斯国内反对派、也向西方发出了严重警告信号。与此同时，俄又以“软性”的方式深化与白俄罗斯的一体化进程，把握涉及主权敏感问题的平衡度。2021年9月，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就深化一体化合作达成共识，双方签署了28个经济项目合作协议，并建立了石油与天然气统一市场。双方还选择在11月4日——俄罗斯人民团结日——的当天宣布签署联盟国家一体化法令。这不仅表达了进一步推进双方一体化进程的决心，也传递出两国将团结应对困难与挑战的信号。不过，在涉及实行共同货币、白境内建立俄罗斯军事基地等事关主权的敏感问题时，双方暂时持回避的态度。

第四，针对周边地区冲突，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区的军事冲突以及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境冲突，俄罗斯都采取更加“软性”的方式处理，不允许冲突各方用武力方式解决争端，而是充分发挥俄罗斯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在构建稳定平衡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解决。^②比如，在维持俄罗斯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就纳卡地区停火构建起来的对话机制基础上，俄罗斯倾向于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保持中立的政策。如果纳卡地区脱离阿塞拜疆，那么阿将会完全倒向西方，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亚美尼亚身上。与此同时，土耳其对南高加索地区局势的介入，也让俄罗斯不得不考虑在调解纳卡冲突的方式上，还有必要加入新的地区平衡元素。

第五，在阿富汗问题上，俄罗斯也趋向于使用类似再平衡的方式来应对。俄专家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经验，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俄罗斯和其

^① Jeffrey Mankoff, “A Kinder, Gentler Bear? Why Rumors of Russia’s Post-Soviet Retreat Are Prematur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7, 2020.

^② 万青松：“‘玩战争’的乌克兰，恐怕只会将欧美俄拖入更深的‘人质困境’”，2021年4月22日，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1_04_22_588341_1.shtml

他“大玩家”有能力处理好阿富汗事务的可靠保障，毕竟世界力量对比和地区局势都发生了变化，阿富汗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种不断变化的新环境，也对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利益构成新的挑战。俄罗斯已经充分吸取历史教训，受制于“阿富汗综合症”，不再寻求以军事介入的“硬性”方式对邻国实行“绝对”控制，而是采取更加“软性”的应对方式，也即为阿富汗创造良好的周边和平环境。当然，这需要主要大国之间开展谈判，而不是指望阿富汗新政府、卡塔尔和伊朗的单方面行动。^①尤其是，大国之间围绕如何援助阿富汗的谈判，将会成为影响阿富汗局势走向的有力工具，这需要诸大国协调立场与行动。国际联军撤出后，“集体西方”在阿富汗事务中的作用必然会下降。阿富汗日益成为新欧亚政策的对象和主体，对欧亚地区国家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在俄罗斯看来，防止阿富汗再次陷入内战，甚至变成“失败国家”，将是阿富汗周边邻国的共同诉求，为此，俄罗斯需要就阿富汗问题与中国、印度、伊朗、中亚国家等开展更加积极的相互协作。^②

第六，在处理与东方大国关系方面，俄罗斯实际上也有意识地在中印之间保持关系的平衡度，而不是做二选一的选择。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如中印边境冲突，俄罗斯更加倾向于保持“善意的中立”^③。在与中印关系定位方面，2021年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既突出与中国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价值，也重视与印度构建“特殊特惠战略伙伴关系”（особо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其中особо为2021年7月新添加），目的是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以不结盟为基础的地区稳定与安全保障的可靠机制，^④进而寻求与东方大国关系的平衡。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尤其是在出售先进武器问题上，俄罗斯也有平衡的考

① Бордачёв Т. В какой соблазн вводит Россию фиаско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19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profile.ru/columnist/ne-vernutsya-v-afgan-911117/>

②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Сосед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ендиректор РСМД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о том, кто станет бенефициаром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или пострадает от новой волны агрессии// Известия. 17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iz.ru/1208456/andrei-kortunov/postoi-anno-s-granatoi>

③ 万青松：“如何对待中美印？俄罗斯自我定位‘善意中立’”，2020年9月19日，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0_09_19_565659.shtml

④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 г. №.400.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

虑；而在多边平台互动方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中俄印外长对话，甚至在远东开发方面，俄罗斯都在充分考虑平衡因素。正如俄罗斯专家所言，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中印之间做选择，这是因为：（1）中印两国都在世界和欧亚大陆发挥巨大作用，俄罗斯必须与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2）地区事务的“玩家”增多，有利于促进地区架构稳定；（3）俄与中印存在利益契合的地方，也有差别。^①

（三）扩充外交工具：寻求“新与旧”的再平衡

对俄罗斯而言，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包括支撑其传统外交的资源正面临进一步“贬值”，如俄罗斯的军事潜力、在国际组织的特权（联合国安理会）以及资源和能源潜力等。这些都迫使俄罗斯加速推进传统外交转型，并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充外交工具箱。

1. 推进数字外交、绿色外交等新型外交

在数字外交方面，俄罗斯看到当前信息技术领域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对抗的主要场域。攻击信息基础设施所造成的损害，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核武器攻击。数字空间也成为混合战的区域。^②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遭受内外信息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的数字主权变得越来越迫切，成为国家内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2021年2月24日，普京在联邦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全球数字空间已经成为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场域，俄罗斯需要制定维护数字领域国家利益的长期行动战略。俄罗斯这一战略新动向与世界大国纷纷抢占数字技术制高点有关，如2016年欧盟通过数据政策，规定必须将个人数据储存在成员国内；2018年修订了《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2020年通过数字发展战略。2021年4月，俄罗斯正式通过《国际信息安全的国家政策基础》文件，^③对相关内涵、举措等做了非常详细的战略规划。

①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без паники. Россия не должна делать выбор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Индией//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6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rg.ru/2021/03/16/luki-anov-rossiia-ne-dolzha-delat-vybor-mezhdu-kitaem-i-indiej.html>

②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енко. Цифрово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оказался важен в условиях нов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www.ng.ru/vision/2021-08-01/8_8213_confrontation.html

③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2.04.2021. №.213.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2104120050>

俄罗斯的举动还与国际数字规则的竞争相关，尤其是中美科技竞争实际上也是围绕数字技术和规则展开的。2021年1月，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研究报告《国际竞争与数字领域领导权》，^①提出21世纪的超级大国，不仅需要掌控地理空间，也需要掌控数字空间，数字主权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因素。虽然俄罗斯有多个IT平台，但缺乏世界级的超大型平台（美国太多，中国有TikTok），很难说在这一领域掌握着绝对主权。不过，报告指出俄罗斯具备获得这类主权的优势，也有机会领导“数字不结盟运动”，以抵抗西方的“数字殖民主义”（цифровой колониализм）。为此，俄罗斯外交也将重点之一放在构建国际信息安全体系方面。

在绿色外交方面，当下绿色转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讨论的重点议题，作为矿物资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不可能回避。有俄罗斯专家建议，政府需要改变对绿色政治的“沉默”，更多发展绿色技术，改变俄罗斯的原料产业结构。^②这一建议在2021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到了体现，俄罗斯官方有史以来第一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俄罗斯确实为本国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向”做准备。^③由此，绿色议程开始成为俄罗斯推进外交转型所践行的新理念。

2. 进一步扩充外交工具库

俄罗斯首次制定“不友好国家名单”。虽然“不友好国家”这一名称来自2021年4月23日普京总统签署的《关于应对外国不友好行为的影响举措法令》^④，但俄罗斯媒体指出，它更多还是政治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⑤该项总统令对不友好国家在俄罗斯的外交使团、领事机构及国家机构代表处与

①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и лидерство в цифровой среде. <https://ru.valdai-club.com/files/36581/>

② 万青松：“全球‘链式经济’重构中的俄罗斯选择与中俄合作空间”，《欧亚经济》，2022年第1期，第27-43页。

③ Jason Bordoff, Meghan L. O'Sullivan, “Green Upheaval: The New Geopolitics of Energ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30,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11-30/geopolitics-energy-green-upheaval>

④ Указ о применении мер воздействия(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на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23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5437>

⑤ Список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х стран» станет началом большого пути. 29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vz.ru/world/2021/4/29/1096922.html>

俄境内个人签订劳务合同、雇佣协议、签证发放等方面做出明确限制。虽然这项举措的对抗性并不显著，却是一种“伤害性不大而侮辱性极强”的方式，也会影响到这些机构的日常运作，包括收集情报的能力，还会在心理上构成影响，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代表出现在公开场合时。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借此构建起了一种抵御外部影响的新工具，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之前更多的是盟友与伙伴，现在增加了“不友好国家”的类别。此外，俄罗斯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采取更加有力的应对手段。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官员认为，此举有助于打击国外（如波兰、捷克、波罗的海三国、英国等）针对俄罗斯的假新闻及其给俄罗斯造成的消极影响，还可以将威胁对俄制裁的国家列入该名单，尤其是一些长期以来实行反俄政策的国家。还有专家提出，有必要设立“退出”机制，一旦被列入名单的国家改变对俄方针，俄罗斯可以考虑将其移除。此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一些国家的对俄不友好举动，使其收敛，并采取克制、理性的举措。^①2021年5月14日，俄罗斯政府仅宣布将美国和捷克两国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其中允许捷克雇佣俄罗斯雇员的人数上限为19人，美国为0人。

俄罗斯给西方“划红线”。2021年，普京至少两次在重要公开场合谈及“红线”问题。第一次是在4月21日发表国情咨文时，普京表示，“近来西方对俄不友好的举动持续不断，在面对众多毫无根据的指责时，俄罗斯已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如果一些势力在对俄关系中将俄方的克制当成软弱，跨越俄罗斯的‘红线’，俄方将采取迅速而坚决的回应措施。俄罗斯有足够的耐心和专业精神采取反制措施，对于那些不愿对话且姿态傲慢的国家，俄罗斯永远能够找到捍卫自己立场的方法”^②。理论上，俄罗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划红线”，但在当前形势下，显然不是对东方而是对西方设置“红线”。正如俄专家指出的那样，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到的“红线”，是为俄罗斯在试图与美国缓和对抗和创造建设性对话氛围不成功的情况下所准备

① Депутаты и сенаторы поделились своими прогнозами по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 страна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8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2021/04/28_a_13575704.shtml

② “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强调对俄交往勿越‘红线’”，光明网，2021年4月22日，<https://m.gmw.cn/baijia/2021-04/22/1302246669.html>

的储备工具，尤其是在无法与美国达成所希望目标的情况下，这条“红线”就用上了，且更多地取决于俄罗斯如何确定，采取怎样的非对称手段。^①这一判断在普京第二次公开谈及“红线”时得到了印证。11月18日，普京在俄罗斯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表示，要通过“反遏制+接触”的混合方式让西方对俄罗斯划的“红线”“入脑入心”。这主要针对的是近一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无视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划出的“红线”。此外，有俄罗斯专家指出，“划红线”也是俄罗斯制定应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出发点，因为俄罗斯经济受外部环境的严重影响，包括能源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和西方的多轮制裁。^②

四、结语

整体而言，2021 年度俄罗斯这种因应国内外形势发展而进行的“再平衡”调适还在不断摸索之中，没有最后定型，其发展方向、内容和策略还会根据形势发展而有所调整。

在对西方外交方向，过去 300 年来，俄罗斯一直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也习惯于以西方视角看待国际事务，西方一直是俄罗斯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出发点。苏联解体之后，俄对外政策的争论常常围绕东方与西方、可控性与灵活性、地缘政治与经济、大国地位与民众福祉、本土特色与世界主义展开，但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更没有获得争论的具体结果。^③普京执政 20 年来的大多数时间推行的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外交，且更多是建立在与西方争论“孰是孰非”的出发点上。^④克里米亚危机后，这种外交在俄罗斯国内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Баунов. Русские качели. Куда ведет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цикл эскалация-разрядка. 26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4400>

② Татьяна Становая. Предвыборное послание. Почему Путин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 о чем говорить с общество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21 апреля 2021 г.

③ Лукьянов Ф. Точно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9. Том.17. №.6. С.5-7.

④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Каким будет мир? Мир, несмотря на его хаотичность, вполне предсказуе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4 февраля 2019 г.; Денисов И.Е. Подъем поворотом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Развитие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усиления азиатского вектор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2016. Т.11. №.2. С.160-165.

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很大，立即与其一刀两断并不现实。当下俄罗斯正在经历与西方关系“破与立”的痛苦调整，并与当下世界变局交织叠加，决定了这一“破立”进程的持久性和不确定性。

在对东方外交方面，东升西降不仅再次激化了俄罗斯国内围绕往何处去的二元争论，也成为影响俄罗斯东方外交调整的重要因素。前者主要表现为俄内部的西方派与非西方派之间的争论，也即关于俄罗斯应该回归西方还是转向东方的新争论。^①这一次争论的起因是当今东方正逐渐成为世界中心，这是俄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外议程和国际影响力面临的新变化。近几年的国际变化现实也让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外交已经越来越与世界变局不相符。因此，俄提出“现在的世界不能划分为西方与余下的世界”^②，进而寻求与自身体量、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国际定位。由此，俄罗斯的“新东方外交”也呼之欲出，其目标是成为“全球东方”的组成部分。^③

【Abstract】 2021 is a crucial year for Russia to recognize, adapt to and seek changes in diplomacy. It needs not only to create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country to enter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deal with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ndemic of the century and global changes. The interweaving of these two changes makes Russia's diplomacy more proactive in seeking multi-dimensional "rebalance". It mainly includes emphasis on seeking rebalance between "breaking and establishing" in terms of diplomacy with the West; between "soft and hard" in terms of diplomacy with the East, and between "new and old" in expanding diplomatic tools. On the whole, Russia's "rebalancing" adjustment in response to domestic and external situation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 exploration and has not been finalize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content and

①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Диалектика граблей.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ША и Китая грозит отвлечь Россию от ее внутренних проблем. 20 мая 2020 г. <https://profile.ru/columnist/dialektika-grablej-315753/>

②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Музейный артефакт//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1 августа 2019 г. <http://rg.ru/2019/08/21/lukianov-g8-artefakt-minuvshej-epohi-tak-k-nej-i-nado-otnositsia.html>

③ Кирилл Рогов. Персонально наш(интервью)// «Эхо Москвы». 31 августа 2021 г. <https://echo.msk.ru/programs/personalnovash/2895436-echo/>

strategy will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evolving situati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guided by Putin's "optimistic conservatism", Russian diplomacy will actively "explore new opportunities and break new ground"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ic of "turning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Key Words】Russian Diplomacy Rebalance,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Russian-European Relations, New Tools of Russian Diplomacy

【Аннотация】2021 год – ключевой год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изменении сво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адаптации и стремлении к изменениям, в этом году не только сложилась благоприятная внешняя среда для выхода страны на новый этап развития, но и для преодоления сложной и постоянно меняющей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а фоне эпидемии столетия и иных глобаль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Их переплетение сделало российск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й в поиске многомерной «ребалансировки», которая в основном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в дипломатии с Западом акцент делается на ре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ии между «разрывом и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м»; в измерении дипломатии с на Востоке упор делается на поиск баланса между «мягким и жёстким»; в расширен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акцент делается на поиске баланса между «новым и старым». В целом «ребалансировка» России в ответ на развитие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ситуации пок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постоянной проработки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не оформле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стратегия её развития будут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ся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развития ситуации. Заглядывая в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будет активно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диалектику «кризиса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ращивая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 кризисе и 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 изменяющихся ситуациях».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ебалансиров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ы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责任编辑 苟利武)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2年第1期(总第233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元